

美国研究

季刊

1988年第1期

AMERICAN STUDIES

第2卷

2月15日出版

略论美国战后外交的若干特点

资中筠(3)

核威慑

吴展(16)

艺术·历史·社会

朱世达(23)

美国人口的分布、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

茅于軾(31)

试析美国加速实现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

樊亢、贺力平(37)

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张小青(47)

八十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发展

孙海顺(56)

美国政党制度缘起

师枫燕(65)

本期责任编辑：金灿荣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1.75 元

国际版 2.5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Spring 1988

Vol. 2, No. 1

CONTENTS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WAR U. S. DIPLOMACY

Zi Zhongyun (3)

A discussion of some salient features of U. S. post-war diplomacy as distinguished from that of other powers as well as pre-war United States. The three parts are: (1) the evolution of U. S. - Soviet rivalry and the Yalta framework; (2)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and (3) special instruments u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dealing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an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the overwhelmingly powerful U. S. economic strength and the possession of huge nuclear arms stockpiles by the two superpowers.

NUCLEAR DETERRENCE

Wu Zhan (16)

A perspective of the U. S. nuclear deterrence policy, Soviet reactions to it and the nuclear policies of other nuclear powers.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thanks to nuclear deterrence, a nuclear war between the two superpowers is unlikely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and that the interdependence among countries will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xchanges, which may eventually help to build a stabilized peace in the world.

ART, HISTORY, SOCIETY -- ON THE ART OF *U. S. A.*

Zhu Shida (23)

This article deals with the pros and cons of the literary experimentation in the trilogy *U. S. A.* by John Dos Passos. One of Dos Passos's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genre i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to pioneer the introduction of journalism into fiction writing, a step that has had great impacts on the writers of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 DISTRIBUTION AND MOVEMENT OF U. S. POPULATION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 A COMMENT ON *REGIONAL DIVERSITY: GROWTH IN THE U. S.*

Mao Yushi (31)

An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movement within the U. S. and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ate. A static model is established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income among regions would diminish, as population moves from low income region to high income region. But historical data shows that such difference continues for decades while the rates of increase in per capita income for different regions tend to be equal. The author then constructs a dynamic model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movement of households is a behavior that has a longterm effect, and that such behavior is directed by expectation.

U. S.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ITS ACCELERATING INDUSTRIALIZATION

PERIOD: A PRELIMINARY STUDY

Fan Kang, He Liping (37)

U. S. economic growth accelerated in the period of 1870-1913. Apart from the economic causes, government policies also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acceleration. This has useful implications for the present reforms in China.

U. S. TRADE PROTECTIONISM: A HISTORICAL ANALYSIS

Zhang Xiaoqing (47)

In a comprehensive survey of U. S. trade protectionism from the period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to the 1980s,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major factors that jointly determined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rade protectionism in the U. S. foreign trade policy.

DEVELOPMEN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 S. IN THE 1980s

Sun Haishun (56)

A noticeable phenomenon in the world economy today is the sharp increas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80. This essay looks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is investment. It is argued that on the whole the inflow of foreign capital is beneficial to the U. S. economy.

ORIGINS OF THE PARTY SYSTEM IN THE U. S.

Shi Fengyan (65)

While nowhere in the Constitution can one find a single reference to party and n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ad any sympathy with it, modern political parties were created in America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the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was established. After examining the reasons why that was so,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the party system was inevitable and indispensable for governing American polity.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略论美国战后外交的若干特点

资中筠

本文谈“战后”“美国”的外交。由于一篇文章篇幅有限,难以求全,这里主要论述其某些特点,一般国家的外交中带有共性的、不言而喻的内容则从略。因此本文对有些问题所用篇

幅并不一定同它在美国外交中所占份量成正比。

战后国际局势以及从而产生的美国外交,有以下特点:

1.美国成为世界头等强国,在外交上摆脱“孤立主义”传统,向全球扩张。这种扩张主要不是谋求领土,而是全面势力扩张。

2.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雄于世,起着左右世界局势的作用。但是几十年来总的发展趋势又在冲淡这一现象。当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世界正在从两极向“多极化”发展。笔者从来认为“多极化”一词很不确切,姑妄用之以说明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力正在减弱。但是迄今为止,美苏争夺仍然是世界格局中的主线。

3.美苏争夺与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对峙互相关联,从而反共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外交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4.核武器的出现,使美苏争夺的手段与以前任何历史时期的大国角逐大不相同。一方面造成激烈的军备竞赛,增加战争危险;一方面又使美苏之间直接发生战争几乎不可能。由此产生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一些独特的手段。

5.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争取并赢得独立,进而谋求发展自己的国家,是战后新现象。这一现象对美国既是机会——取代英、法等老殖民主义者而“填补真空”;又是难题——旧的以公开的种族优越论为基础的帝国主义强权政治遭到强烈抵抗,已为全世界人民所唾弃;同时还有与苏联争夺这广大的中间地带,包括民心的问题。凡此种种,也给美国的外交注入一些新特点。

雅尔塔格局的变与不变

战后美国外交几乎与全世界各个角落都发生关系,表现极为错综复杂,但究其主线,就是与苏联争夺,这是一切考虑的出发点和归宿。所谓“全球战略”,就是对付苏联的战略。当然,在苏联方面也是如此。美苏关系有时紧张,有时缓和,攻守之势也常有变化,但是双方都以对方为主要对手,则是不变的。

这一形势是怎样形成的呢?

更远的历史渊源暂且不提。就近期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反法西斯斗争胜利在望时,从德黑兰到波茨坦的一系列会议上,美英苏三国在讨论战后安排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划分势力范围的讨价还价。其间1945年2月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奠定了战后势力范围的格局,同时也开启了争端。

苏联方面的考虑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在美国方面,战争未结束时,罗斯福政府的主要考虑是争取早日结束战争,同时又尽量减少美国士兵牺牲,因此需要苏联军队多出力。从当时的会议记录可以明显地看出,英、美在战场上有求于苏联,斯大林有很大的发言权。红军向前推进一步,苏联在谈判桌上的筹码就有所增加。雅尔塔格局的形成,是以双方军队所到之处为基础的。战争一结束,共同敌人消失了,战时形成的联盟迅速解体。英国已经一蹶不振,退居为美国的小伙伴,于是剩下美苏两大国对峙争雄。

美国在战争中不但本土未受蹂躏,生产力未遭破坏,而且还发了战争财,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和出口国。在军事上拥有世界最大的海军和空军,第一次在欧亚两大洲都有驻军。在这一切之上,还首先制造并使用了原子弹,而且垄断了四年。所以,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美国拥有“头号破坏武器——原子弹,和头号建设武器——任何一个国家所未曾拥有过的巨大财富”。(1)

另外,美国在经济上对世界市场与原料的需求也远远超过战前。其主要工业如汽车、机床、钢铁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农产品出口已达1/3以上。30年代大萧条的记忆犹新,美国人十分担心在经济转型期中由战争刺激起来的经济繁荣将随战争而结束。同时,美国对进

口原料,诸如锰、钨、铬等稀有金属以及石油的需求日益增加。总之,美国的经济日益与世界经济分不开。

美国领导人和政界、舆论界一些主要人物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和需要,形成向全球扩张的强大动力。而且在一部分人中间还形成了一种美国“无所不能”的狂妄意识。于是以“世界领袖”自命,认为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的“美国世纪”已经到来的思想,逐步克服了传统的“孤立主义”而居统治地位。

苏联尽管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而且在战争中牺牲惨重,元气有待恢复,但它也有自己的优势。作为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幅员极为辽阔的大国,苏联在战争中显示了非凡的韧性和巨大的潜力,发展了强大的军事工业。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使它在世界人民中赢得威望。在与美国争夺中,苏联的社会制度有可以集中使用力量发展军事的优越性。除了它本身的力量外,战后东欧出现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都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亚洲和西欧有些国家的共产党由于在抗战中站在最前线而壮大了力量,赢得了群众;亚洲的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兴起,在不少国家与社会革命结合在一起,自然而然地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些源于各国深刻的内在矛盾,顺乎历史潮流的革命运动,在当时都成为苏联可以借助的力量。苏联根据自己的需要对这些运动采取积极、消极甚或制约的态度。但是在美国看来这都是苏联“扩张”的一部分。

一方面,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如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的,“认为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命令全世界朝着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走去。”(2)

另一方面,苏联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口号下,根据“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最高利益”的逻辑,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革命运动服从苏联当时利益的需要。

这样,美苏争霸就成为不可避免。它既是地缘政治、又是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战后外交的两极思想也由此而来。关于意识形态问题下文还将专门论述。在地缘政治上,美苏实际上还是以雅尔塔格局为基础。双方都想突破,双方也都指责对方破坏雅尔塔协议。但是实际上,几十年来双方基本上还是尊重雅尔塔协议划定的界线。争夺主要是在协议条款模糊的,或未涉及的广大中间地带。例如杜勒斯任国务卿时,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取“心理战”、“宣传战”,提出所谓“解放被奴役国家”口号,实行“推回”政策。但是1956年波兰事件之后,曾有记者问杜勒斯,如果苏联出兵波兰美国如何反应,杜勒斯表示,就纯法律观点而言,苏联出兵不算违反国际法,因为有华沙条约。他还表示美国对波兰可能作出的“贡献”主要是以“自由”的希望来“感染”它,而不是进行干涉。(3)此后不久苏联出兵匈牙利,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美国均未采取行动。反过来,苏联对西欧国家也采取同样态度。战后法、意等国共产党力量极为强大,并拥有自己的武装,苏联当时估计自己的力量达不到西欧,就要求它们放下武装,参加联合政府。对当时已经有希望取得胜利的希腊共产党也不予援助,听凭它为先英国后美国支持的希腊右派政府镇压下去。

纵观战后几十年,美苏争夺的地区实际上都是在雅尔塔格局以外的地区。美苏的战略重点都在欧洲,所以战后初期,美国首先致力于巩固欧洲阵地。“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都是为此。美国海外驻军大部都在西欧。但是西欧局势在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之后,实际上已固定下来,双方经过较量,谁也不能以武力改变现状。1975年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安全”的最后文件,实际上再次肯定了雅尔塔格局关于欧洲的势力划分。而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却是动荡多变。首先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随即成为苏联的盟国,客观上打破了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远东势力范围的划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胜利,不是美苏角逐的结果,是中国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而且在中国问题上,苏联本来是准备遵守雅尔塔协定的。但是美国决策的依据是把中国革命视为苏联“扩张”的一部分。由于美国政策的错误,结果与几亿中国人民为敌达20年之久,这是美国战后外交的一大败绩,而客观上当然是苏联得分。后来,尽管美国历届政府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寄希望于中苏分裂,到60

年代中苏真的公开决裂,却基本上与美国的政策没有多大关系。但这是美国下决心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因素。所以在美国对华政策中,苏联因素占很大的份量。当然美国对华政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且这些因素的份量正在增长,不过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题目。

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的“遏制”政策首先施于中国大陆的周边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而且先朝鲜、后越南,亲自出兵打了两次相当规模的地面战争。同时提出了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对应的“第四点计划”,以经济和军事援助,防止有关国家发生革命,或苏联势力的渗入。1957年中东战争之后,随着英、法势力的退出这一地区,艾森豪威尔的“力量真空”论应运而生,美苏在中东的争夺愈演愈烈,直至今日。

但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毕竟不是美苏平分秋色的世界。最重要的是自50年代后期以来第三世界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崛起。从1946年至1960年,亚、非两大洲共有37个国家摆脱殖民统治宣布独立,其中1960年一年中独立的就有18个。还有无数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这些新兴国家面临着摆脱贫困,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它们一方面迫切需要发达国家的援助,一方面,都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在美苏之中宁愿保持中立。1961年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标志着这种愿望已经体现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对于这种独立和中立的愿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能理解和尊重,它们所想的是把尽可能多的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自50年代末开始美苏在非洲角逐相当激烈,而且主要以“援助”的形式出现。美国需要的是维持现有的秩序,对反对旧秩序的民族民主运动本能地持猜忌和敌视态度。尽管到60年代初,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投资已占其海外投资的1/3,1961年,90%的美援用于第三世界国家,但是多数受援国都拒绝参加“冷战”,站到美国一边,因而不能见容于美国。杜勒斯和约翰逊总统都曾攻击“中立”,认为是有关国家走向“共产主义”的“幌子”。除此之外,美国国内种族歧视仍然十分严重,美国黑人的遭遇自然不会使非洲人民对美国有好感,甚至非洲国家外交官以肤色而在美国受辱的事件时有发生,更加使美国在非洲不得人心。至于拉美,本来是美国的“后院”,是美国牢牢控制的传统势力范围。惟其如此,拉美的民族民主运动必然带有反美色彩。特别是古巴革命胜利,卡斯特罗宣称自己走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把苏联势力引进来,而且一时间在拉美有引起连锁反应之势,这更为美国所不能容忍,于是从“猪湾事件”到出兵多米尼加,以及大力支持亲美独裁的军政权等等,越来越与拉美当时的潮流相对立。这样,整个60年代,面对蓬勃兴起的民族独立潮流,美国从陈旧的“冷战”观点和霸权主义心态出发,处处设防,也就处处树敌,而这“敌人”都与“共产主义”关系不大。这使美国成为“一个革命世界中的反革命力量”,〔4〕越南战争是这种政策的顶峰,也是转折点。

同时,东西方两大集团都出现了变化。西欧国家经济恢复之后,日益对美国表现出独立倾向。1958年法国戴高乐上台后立即向美国闹独立,要求平起平坐,提出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并且主张单独与苏联建立“缓和、谅解和合作关系”。1964年法国不顾美国反对,毅然同中国建交。西德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虽然正式提出是在1969年,实际上自60年代初期已开始酝酿,并“小步子”实施。1957年建立的西欧“经济共同体”尽管内部矛盾重重,还是得到了巩固和发展,成为能向美国争取经济权益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另一方面,60年代中苏公开分裂使“社会主义阵营”实际解体。东欧国家继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反抗苏联严密控制,要求某种程度的独立倾向也日益发展。1968年苏联认为有必要亲自出兵捷克以免失去控制,反过来也证明这种情况的严重性。

在这样多变的世界里,美国那种天下不归于杨即归于墨的观念已经过时。越南战争集中暴露了美国的弱点,证明了美国不是无所不能的。于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尼克松主义”应运而生。尼克松成为战后第一个公开承认美国力不从心,需要收缩战线的总统。“尼克松主义”的实质就是承认美国不是无所不能,要那些指望美国援助和保护的国家首先“自助”;在对世界力量的分析上,尼克松-基辛格提出了五种力量之说:美、苏(加东欧)、西欧、日本和中国(潜在的),而不再是“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两家。美国历届总统所提出的“主义”都

是要求授权总统进行干涉和扩张,而“尼克松主义”相反,其核心是说明美国必须收缩。

以强烈反共著称的尼克松任内,美国的外交政策实践却较多现实主义成分而较少意识形态色彩。同苏联达成第一个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SALT_I)、赫尔辛基“欧安会”通过最后文件、打开同中国关系、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停止越南战争、美军完全撤出越南以及归还日本冲绳,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重要事件。大体说来,整个70年代是美国调整在全世界的力量部署,战线大幅度缩短的时期。不过这一收缩不完全是主动的。1979年初,伊朗霍梅尼上台,与美国交恶,美国失去了一个自1953年推翻摩萨台以来下了很大本钱经营的战略据点。到1980年伊朗扣留几十名美国人质达11个月之久,美国的影响和威望可以说走到了谷底。

苏联自1962年古巴导弹事件受辱之后,在军事上急起直追,到70年代几乎达到同美国势均力敌,并且乘美国收缩之机,从安哥拉到阿富汗,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乃至太平洋,攻势咄咄逼人。于是在卡特政府后期,特别是里根上台初期,美国又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势。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思想又回到两极观念,大规模增加军费,努力恢复对苏军事优势,对第三世界,从“冷战”观点看待这些国家的复杂问题,对人民的要求更少照顾而更多以势压人。

在对外政策的态势上,美国走了一个之字形。但是80年代与50年代形势毕竟已大不相同。一个新的因素是,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改革;而美国独家的威势已今非昔比。因此里根政府不能一味强硬下去,事实上还得采取某些现实的与缓和的政策。不论如何,有一点没有变,就是归根结底,美国外交的主要对手还是苏联,反之亦然。而以欧洲的划分为核心的雅尔塔格局也还是没有起质的变化。

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

自从有民族国家以来,在正常情况下,每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原则上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目的。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就主张根据国家利益来确定外交目标。他和其他一些学者被美国史学界称为“国家利益派”,遭到后来另外一些学派的攻讦。实际上,如果对方今纷纭复杂的国际事务作本质的观察,绝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无不以维护其执政者所认为的国家利益为目的。所不同者,不同的掌权政治集团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各异。另外,国家实力强弱悬殊时,弱国往往无力维护本国利益,有时在外交上不得不作出牺牲性的让步。至于由于统治者的昏庸、腐败而执行违背其国家利益的政策,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

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如何确定其本国利益,往往与本民族的思想意识传统有关;同时,执政者为了动员本国人民支持其实际上是出于现实利益考虑的政策,也必须有一套能诉诸本国人民传统意识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或说词。

战后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一方面,它的“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涉及全球;一方面,它情不自禁地要在全世界推行其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一点非自美国始,马克思就曾指出,19世纪的英国外相帕麦斯顿力图在欧洲大陆上推行“光荣的英国宪制”。(5)只是后来英帝国式微,其外交就日益表现为随机应变的实用主义,而较少“理想主义”高调和意识形态色彩。

战后,在全世界推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使命”就落到美国头上。但是由于美国所遇到的对手是共产党领导的苏联,而且在一个时期内左派革命运动在很多国家蓬勃高涨。美国外交的意识形态特点就集中表现为“反共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或隐、或显,或强、或弱,但始终存在。一度甚至达到狂热程度。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反共主义”与美国实现其国家利益有什么内在的联系?美国与苏联媾和?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作祟?由于苏联恰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二者就合而为一,如果设想在克里姆林宫坐着的不是苏共领导人,而是沙皇,同时仍拥有现在一样强大的力量,同样的扩张势头,美苏对抗的形势是否也同今天一样呢?

19世纪30年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就曾预言,当美国和俄国成熟时,将成为睥睨世界的两大国。1861年,林肯政府的国务卿西华德把托克维尔的预言又加以发挥说:美国和俄国直到各自向相反方向绕完地球半圈,在人类文明发源地相遇并互相致意之前,可以保持友好。(6)这就是说,他已感觉到今后将是美、俄两家瓜分世界,而发生冲突的地点是在亚洲。

又过了30多年,1899年美国提出了主要是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这一原则固然适用于所有参预瓜分中国的列强,而当时现实的矛头却主要是针对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扩张。如果俄国没有在日俄战争中失败,美俄在亚洲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苏联后来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远东的要求,就是恢复日俄战争前俄国在这一地区的特权。这样说,似乎当今的美苏争霸是被两次世界大战中断了的历史发展的继续,是顺理成章的,与主义、制度无关。

然而又不尽然。美国从有外交以来,历来有“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有时二者相结合,有时在具体问题上有矛盾。

试以美国对俄国革命的态度为例。当时的威尔逊总统是以“理想主义”外交著称的,他在全世界推行美国的“民主”制度为己任。同时,威尔逊又是“自决”原则的鼓吹者,根据这一原则,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和政治制度,外国无权干涉。这两点在实践中常常自相矛盾,实际上都是为威尔逊企图领导美国进一步参与世界事务服务。1917年俄国爆发革命,美国朝野舆论起初对俄国推翻沙皇君主专制表示欢迎,威尔逊亲自起草的关于“国际联盟”的十四点宣言中专有一条:“复兴俄国并欢迎它参加国际社会”。但是在布尔什维克推翻克伦斯基之后,西方资产阶级掀起一片“恐赤”浪潮,美国也不例外。在企图软化和“改造”俄国布尔什维克无效之后,终于出兵参加了干涉俄国革命的行列,从而抛弃了“自决”的原则。此后一段时期“恐赤”病在美国国内蔓延,转而危及美国人民自己的信仰自由和公民权利。所以美国从在外国推行“民主”、“自由”始,以损害本国人民的“民主”、“自由”终;而其“理想主义”外交又往往导致干涉别国内政。从那时起“反共主义”已渗入美国外交之中。不过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内,苏联立足未稳,无力参预大国角逐,对美国利益形不成威胁。出于反共、恐共,美国“不承认”苏联达16年之久;而由于双方经济利益的需要,在这段期间美苏贸易和美国对苏联投资却有相当发展。直到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美国多数企业家认为承认苏联有助于改善美苏贸易,缓解经济危机,美国才与苏联建交。假设俄国发生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美国大约不会这样长期坚持不承认,因为看不出美国当时的国家利益有此需要。因此这里意识形态的成分占主要地位,是对整个共产主义思潮的抵制和敌视。当然,再深入一层,美国当时的决策者当然意识到,从长远“国家利益”考虑,共产主义果真在全世界胜利,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美国的消亡。在这一意义上,“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二战之后,美国把反共原则溶于全面与苏联争夺的外交战略之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外交思想。1947年3月正式提出的“杜鲁门主义”就为这一外交思想奠定基础。“杜鲁门主义”实际上是美国战后外交总路线(姑且这样称呼)的开端。它提出了一个“间接侵略”的逻辑,就是把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或者对美国不友好而对苏联友好的民族运动,一律称之为苏联的“间接侵略”,也就是“破坏国际和平的基础”,也就是“危及美国的自由和安全”,因此美国就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人民维护“自由体制”。这样,“维护自由”与“反共”成了同义词,而又把这一点放在其他一切国际准则和美国自己所标榜的“民主”、“自决”等原则之上。杜鲁门的“遏制”政策,杜勒斯的“推回”政策,艾森豪威尔的“力量真空主义”,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在国际上的运用,“东京湾决议”中的约翰逊主义以及美国陷于越战不能自拔,以至里根政府出兵格林纳达、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都贯穿了这一思想。毋庸赘言,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对新中国的长期“不承认”和“遏制”、“孤立”政策也是基于同一思想,或以此为其“合理”根据。

“反共主义”究竟在美国公众中有多大基础?是统治集团为了动员群众支持其对外政策而提出的一种借口,还是美国人固有的意识形态,决策者不过推波助澜,加以利用而已?对这个

问题不能作简单化的回答,需要透过多年来在“冷战”气氛下互相攻击、诬蔑、歪曲真相等等所造成的种种偏见的烟雾,作客观冷静的分析。

这里所说贯穿于外交思想中的意识形态,主要是对外交政策能直接或间接发生作用的那部分人的思想,广大的“沉默的多数”在通常情况下很少了解或关心外交政策。但这并不等于决策者可以完全不考虑本国公民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

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宪法精神,作为200年来把从各大洲投奔新大陆的不同种族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凝成一个民族的共同思想和精神支柱,是以个人主义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同马克思主义是全然两种思想体系,尤其是同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所创立的国家制度及其原理相对立。更重要的是,美国一般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并非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而是来源于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实践,外加西方宣传机器长年累月的夸大渲染。对一般美国人说来,“共产主义”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意味着他们所珍惜的“民主”、“自由”、“人权”的对立面,本能地加以抵制。还由于其他一些美国特有的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不但“共产主义”,就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很难有发展的土壤。总的说来,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美国社会思潮的重心更偏右。同时,苏联在对外政策中继承沙俄传统,表现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和粗暴侵犯别国领土主权、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也使“共产主义”扩张之说容易为美国人所接受。

另外,美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来自得天独厚的处境,又是对自己的信仰、制度的优越感,还有一部分种族优越感。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是自以为应向全世界推行美国制度、美国价值观念,“教育”其他“次等民族”的“使命感”。对于传教士说来,则是“拯救”其他异教徒的“灵魂”。美国早期思想家和开国元勋的著作和演讲中提到美国时,诸如“上帝的宠儿”、“自由的卫士”、甚至“人类前途的监护人”一类的词不胜枚举。

(7) 美国19世纪以来不断向外扩张,直至对外用兵,主要是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而这种思想也是一种动力。威尔逊所谓的“理想主义”外交,也源出于此,从而导致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侵犯别国主权领土,也就不足为奇了。到战后,“杜鲁门主义”把这种思想同反共结合起来,再以实力为后盾,形成一种“超级大国心理状态”,认为美国有权干涉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的发展道路。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杜鲁门主义没有明说的意思,就是相信应由美国革命的原则(或者说洛克的思想观念)来指导那些争取内部自由的外国社会,而不是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思想)。”(8)

但是,消极的不赞成“共产主义”(不论其含义如何),一般的民族或种族优越感(不论是有意识的或下意识的),毕竟同到处用行动去反对“共产主义”是两回事。美国人所信奉的“信仰自由”和“自决”原则,与干涉别国内政本来是相违背的。何况,美国还有“孤立主义”的传统外交思想。二战结束时,美国国内普遍的要求是在自己富足而广阔的国土上安居乐业,不去管别国的事。所以,在政府决策者要贯彻其向全球扩张的外交政策时,必须把前面所说的在美国人思想中存在的,或是潜在的那种思想意识,鼓动为一种积极的、外在的情绪,甚至狂热。要造成一种气氛,使反对的意见很难立足。杜鲁门宣布以他命名的“主义”的那篇演说,就是故意耸人听闻地大谈“共产主义威胁”,以煽起恐共气氛。而当时苏联对波兰的做法以及1948年的捷克娱乐?又助了他一臂之力。杜鲁门是成功了,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国内反共气氛的确十分浓厚,至“麦卡锡主义”出笼而达于白热化。结果,又如飞去来器反过来损害了美国人民自己所信奉的“民主”、“自由”原则。这次造成损害的范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恐赤”病还要深、广、持续。连杜鲁门本人及其政府成员都受到了影响。

像麦卡锡主义时期这样狂热的气氛已经过去,而且也大多数美国人所唾弃。这主要是对国内政治生活而言,因为美国人不能忍受对思想言论的压制,不论来自何方。但是在对外关系中,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存在,只不过时有起伏。当然涉及重大战略问题时,决定因素还是现实

的利害关系。

当然不能说,“反共主义”就是美国与外交政策有关的意识形态的全部内容。在美国思想界和政治界也有一部分人反对把“反共”的原则放在一切之上。他们有的从现实利益考虑,或主张与苏联缓和、共处,或主张对社会主义国家区别对待,集中对付苏联;有的是更为彻底地信奉美国的民主、自由原则,对于美国在反共名义下支持一些真正独裁、反动、腐败的政权感到不安;有的对第三世界人民的民族要求有更多的理解,不同意完全从与苏联争夺出发来考虑对这些国家的政策。但是,占上风的理论是,所谓“专制”(authoritarian)政权优于“极权”(totalitarian)政权之说,其论点是,“专制”制度有接受美国影响而向“民主”过渡的可能,而“极权”制度则不可能,美国应该“二害相权取其轻”。这样,美国扶植不得人心的独裁反动政权就有了“理论”根据。在不同时期,不同问题上,这几种观点互相消长。对外交政策形成综合的压力。

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外交思想格局受到一次空前的冲击。国内思想界对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所奉行的原则和美国称雄世界的力量发生根本怀疑。当时的一部分青年对美国的传统价值观也产生信仰动摇。这个时期美国的社会思潮重心暂时左移。在外交方面,出现了“修正学派”。他们对美国外交史、外交思想,特别是“冷战”的起源重新审议,不同意“冷战”的责任全在苏联的说法,不接受凡是反共的就是合理的这一命题,而更多以批判的眼光来看美国战后外交。除“修正学派”外,一般自由派学术界也都反对美国打越南战争,对美国的外交政策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尽管这一思潮没有进入决策圈子,但是对当时尼克松政府出于现实需要,实行收缩政策不无推动作用。卡特政府实行的“人权”外交,意识形态成分是很浓的,但是他认为越南战争的教训之一是美国不该在反共名义下一味支持在国内极不得人心的反动政权;因此他除了以“人权”名义对苏联施加压力外,同时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民主要求给予某些考虑,对独裁政权的援助有所保留。

80年代,美国保守思潮又起。在国内经济方面的根源和表现非本文议题。在国际方面,苏联70年代的扩张、越南刚刚在全世界人民同情和支援中取得反侵略的胜利却又立即入侵柬埔寨、还有中国在纠正错误过程中揭发出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阴暗面,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建设上普遍遭到挫折,客观上助长了国际保守思潮。更重要的是以伊朗人质为标志所表现出来的美国软弱的形象,对美国人所习惯的优越感是很大的打击,它抵销了被称为“越南战争后遗症”的心理状态。里根正是在这种思潮中,以“重振国威”的口号当选。在外交上,里根政府的两极思想和反共意识较明显。里根本人曾在英国大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进历史垃圾堆”。对第三世界,那种所谓“专制”比“极权”好之说又为“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家们拣起,并重新加以发挥论证。但是,当前形势与“冷战”年代已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共产主义运动显然处于低潮,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美国无论如何无法以笼统反对“共产主义威胁”为号召。所以在实际外交中现实的地缘政治的考虑还是超过意识形态因素。

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的淡化。只不过在美国某些人看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前吸引力减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是美国进一步发挥影响的大好机会。从长远目标说,意识形态仍是重要因素,而短期政策则更多从现实政治考虑。1982年冬,刚卸任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他的母校普林斯顿大学发表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讲中,开头一段话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以一个老头上火车丢了票,而且忘记了目的地为始扔梗?“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有利于以个人自由与尊严为重点的美国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念发展的国际环境”。他说,“如果美国政府专注于现实政治的考虑而忘记了这一最终目标”,就同那个老头一样;“但是如果过分追求国际的虔诚理想,而忽视了国家的权力和利益,那也是对美国人的现实感的冒犯。”他认为美国外交应该在此二者之间找到平衡(9)。这段话也许能概括地说明美国占主流的外交思想中现实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关系。

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

以实力为外交的后盾,这是美国同过去其他列强共同之处。美国所实行的就是强权政治。1945年12月,杜鲁门正式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主题,并确立了“总体安全规划”的观念,明确提出外交与军事力量一致的原则。(10)事实上,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经常使人感到它的军事存在。在政治手段达不到目的时,直接、间接的军事行动,武装干涉和武力威胁屡见不鲜。不过由于本文开始时列举的战后形势和美国本身的特点,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手段也有新的特点。

(一)军备竞赛和裁军谈判相交替

核武器的出现,是否能划为一个历史时期,可能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美苏两个武装到牙齿的核大国都深知它们之间的冲突无论多尖锐,不能轻易诉诸战争。战后尽管美苏之间发生过几次“危机”,最后双方都是及边缘而返。美国几次对外用兵,心目中针对的都是苏联,而直接对象却都是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精心计算,以不发生与苏联迎头相撞为度。苏联也是如此。核军备越是发达,美苏直接开战就越不能想像。所以,核武器与其说是一种作战手段,毋宁说是一种威慑(或称阻吓)手段。通俗地说,就是以毁灭性报复能力吓住对方,使它不敢先动手。对于无核国家,若为友邦,就是使其依附自己的保护伞;若为敌国,则是一种讹诈手段。而唯其如此,美苏双方更要力争优势,唯恐为对方所压倒,造成“引诱”对方先动手的危险形势,或者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中发言权减少。于是,激烈的军备竞赛成了美苏关系中的一大特点。军备竞赛包括常规与核武器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核军备,因为第一比常规军备省钱;第二容易见优劣,谁也不敢落后。根据形势制定“核战略”也就成了历届总统题中之议。

核武库不断扩大,在美苏关系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双方都怕战争危险增加;军费开支对双方都是沉重的负担;全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要求裁军联系在一起,形成不可忽视的压力;双方的盟国都怕被卷入一场核战争。于是通过裁军谈判谋求缓和,又成为美苏外交中一项经常性的内容。美国于1961年专门成立了“美国军备控制与裁军总署”,负责有关军备控制的政策、研究以及宣传事宜。这一事实本身说明控制军备问题在美国外交中的地位。

由于美苏双方深刻的矛盾和互不信任,裁军谈判十分艰苦,旷日持久而难有结果。裁减常规军备必须包括双方的盟国,涉及面广,问题复杂,几乎不可能达成协议。所以裁军也主要在核军备。几十年来达成了某些协议,没有一项是裁减美苏双方现有的军备的。只是对发展势头作某些限制,或者限制扩散到其他地区或国家。往往一次协议条约成为下一轮军备竞赛的喘息机会。最近美苏达成的关于裁减中短程导弹的协议,尽管裁减的数量微乎其微,却是战后第一次双方同意裁减已经部署的核武器,从这一意义上说,不失其为一个突破,究竟如何发展,世人正拭目以待。

(二)援助和借助其他国家

美国人常称美国外交思想中有“单方面主义”(unilateralism)的传统,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被认为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思想。如果这个词解释为一意孤行,更少考虑和尊重其他国家的意愿,或许成立;如果解释为美国单枪匹马行事,则与战后实践不符。事实上,用对盟国或与国的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方式来推行外交政策,维护自己的安全利益,是美国战后外交的一大特点,为其他国家在和平时期所少见,也是违反美国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传统的。1949年通过的“共同防御计划”,确立了这种外援的原则。如一位参议员指出,通过这一计划的第81届国会“美国有史以来第一届国会,承认援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加强其军事力量是符合美国人民利益的。”(11)

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当然首先是为了美国的经济利益。1945年杜鲁门在说服国会给英国以贷款时就指出,没有世界经济的复兴,美国的繁荣即将枯萎(12)。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直到现在,美国也还承认,美国从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中所得的好处至少同受援国一样多。

在战后的两种制度争夺中,美国对外援助的政治作用也同样重要。因为美国历届政府决策者都认为经济萧条和贫困是动乱和革命的根源,也是滋生“共产主义”的土壤,对欧洲、对第三世界都是如此。“马歇尔计划”明确以挽救西欧的资本主义为目标,并且确实成功了。它是“冷战”背景下的产物。如果没有“杜鲁门主义”先作政治上与舆论上的准备,在当时美国财政还不宽裕的情况下,美国国会是很难通过这史无前例的巨额拨款的。此后对亚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第四点计划”,也是出于同样考虑。美国历史学家贝利这样概括杜鲁门的意图:“杜鲁门宁愿花掉几百万来防止人们变成共产党,而省得他们变成共产党之后再花掉几十亿去打死他们”。〔13〕以后艾森豪威尔的“粮食用于和平”,肯尼迪的“和平队”、“进步联盟”都有防止革命的意图,肯尼迪称之为“反暴乱”(counterinsurgency)措施。

这种借助其他国家来为自己的安全和外交服务的做法,一是体现了美苏争夺主要在广大的中间地带;二是避免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三是美国一贯的做法,宁愿出钱、出枪、出顾问,由别国出人打仗,而不愿直接派兵上前线;四是由于美国金元帝国地位的确立,有这种力量和可能。

具体有以下一些途径:

1. 利用国际组织。战后曾经有一个时期,美国在联合国中有压倒影响,能操纵联合国的表决票数,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联合国实际成为美国的重要外交工具。甚至美国出兵干涉朝鲜战争也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动员 16 个国家至少象征性地参加。这种情况随着大批独立国家的加入,以及中立和独立外交的潮流的兴起,60 年代以来逐渐发生变化。目前,美国虽然在联合国内还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也常常遭到反对和挫折。美国对于以平等的一员与各国相处还不习惯,有一些政界人士常常以减少缴纳经费,或退出联合国相要挟。

还有其他一些经济性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美洲开发银行等等都是美国捐献最大的份额,同时也有较大的发言权。

2. 各种军事同盟。美国战后在世界各地建立和参加了一系列军事同盟,并同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先后签订双边军事条约。曾经一度在世界五大洲结成错综复杂的联盟之网,使美国得以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军事设施和驻扎军队。与此同时,美国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世界各地的种种矛盾之中。所有这些条约或双边,或多边,都是以美国为盟主。也就是说,无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由美国承担最大义务,赖美国以存续,当然也以美国意志为主导。在权利和义务两方面,美国同它的盟国远不是平等的。但是有关国家同美国结盟的目的并不一定与美国完全一致。它们不是过分“独立”,不能服从美国需要,就是过分依赖美国,使美国承担远远超出其初衷的义务。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许多多边军事集团日益难以维持,自“尼克松主义”之后,军事集团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更为减退。现在有的已正式解散(如东南亚条约组织),有的名存实亡(如美澳新条约组织),有的美国已不能完全控制(如美洲国家组织),主要还起作用的唯有“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尽管如此,美国通过以军事援助他国来加强其安全的政策没有变。70 年代之后更多通过双边条约,或是没有条约的个案处理来发放军事援助,或缔结军事同盟。

3. 扶植亲美政权和颠覆对美“不友好”的政府。这一政策最早施于拉美,以维持和巩固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到“杜鲁门主义”之后,就变本加厉地在全世界各地推行。著名记者李普曼早就指出,美国单凭自己的军事力量不可能做到在“一切地方”“遏制”共产主义,于是“就只能通过网罗、资助和支持形形色色的卫星、委托人、附庸和傀儡来实施”,这项政策要求美国对这些国家或组织的内部事务“进行持续不断的”“名副其实的干涉”。他还指出这样一项政策将使美国陷于进退维谷不能自拔的处境。〔14〕实践证明李普曼的预言是对的。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在中国援蒋反共的失败和陷入一场灾难性的越南战争。

“扶植”和“颠覆”,是一项政策的两个方面。后者是“中央情报局”的惯伎。在1947年“中央情报局”成立之初就有一项“隐蔽活动”的任务,后来“中央情报局”以此闻名于世。它在“冷战”时期从事破坏和颠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这部分活动并不成功。但是在第三世界从伊朗到危地马拉,从刚果到古巴,从智利到印度支那的活动肆无忌惮。几十年来一些国家政府不正常的更迭,甚至某些政府领导人的消失,很多都与其活动有关。当然“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也不一定完全与美国外交政策配合得那么好,有时行动失控,甚至帮倒忙。不过扶植傀儡政权和颠覆,以至公开推翻不合己意的政权,确实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4. 贸易与技术转让。这同直接援助不同,但是有时也起同样的作用。艾森豪威尔曾说:“没有比贸易更好的外交工具了”。〔15〕美国可以用“最惠国”或“普惠国”待遇作为对待不同关系国家的杠杆。一方面,对敌对国家则以贸易禁运政策作为一种“惩罚”和施加压力的手段。战后美国对苏联、东欧、中国和古巴都施行过不同程度的贸易禁运政策(其中包括禁止和限制技术转让)。另一方面,1956年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给南斯拉夫和波兰以最惠国待遇,以鼓励其与苏联的分离倾向。总的说来,如果说美国正面的对外援助为外交服务不乏成功的例子的话,反面的限制和禁运则率多不成功,反而使自己被动。因为从根本上说,禁止经济来往是违反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的。另外禁运要生效必须主要贸易国家步调一致。这点美国在50年代对盟国最有控制力时都未能做到,以后就更难了。近年来一个例子是里根企图以经济措施禁止西欧在天然气管道问题上与苏联合作,结果与西欧国家发生尖锐矛盾,成为国务卿黑格辞职的导火线。这一措施终未行得通。

贸易问题有它本身的经济规律,美国的贸易政策也不可能专为外交服务。在战后初期,美国凭借经济上的绝对优势较能充裕地运用贸易部分地服从战略和外交的需要。现在美国经济面临严重挑战和激烈竞争,以之作为外交政策的杠杆就更困难些。

美国借助其他国家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不都能如愿以偿,所以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还是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就同过去老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没有什么区别了。另外,一个趋势是,多边国际组织的地位在美国外交中正在降低。美国更重视双边关系。这点在里根政府尤其明显。

(三)文化宣传

文化宣传工作在美国外交中占着重要地位,美国称之为“公众外交”,其首要任务是“支持美国外交政策,换言之,就是政治宣传”。〔16〕一般说来,对外宣传工作为各国所共用,目的是开展文化交流,促进互相了解,改善本国的国际形象,并且必然为本国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辩护。作为美国的特点的,一是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政府与民间相配合,经费、实力雄厚,为他国所望尘莫及;二是自觉地运用它作为外交工具,与政治、经济、军事等其他方面成为一体,为一个总目标服务;三是由于美国外交中意识形态因素较强,文化宣传工作有其特殊意义,“冷战”时期尤其如此。

美国一贯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对内对外均如此。从历史上讲,对外文化教育事业差不多是与美国开始向海外扩张同步进行的。历届美国政府对大批传教士与其他私人在海外办的文教事业基本上都支持、鼓励。对外文化事业方面很广,其目的也不都是直接为美国政策作宣传。但是从长远看,大量的、广义的交流基本上朝着一个总的方向,就是增进对美国的了解和好感,因此作为一项总的政策,是美国政府积极推动的。

战后,随着美国势力在全球扩张,文化宣传工作正式成为经过国会立法的官方政策。1953年,在战时的“作战情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美国新闻总署”(USIA),统一领导驻在各国以及各部门的对外宣传机构,到现在已经在120多个国家设有200多个机构,从事多方面的活动,每年由国会通过一定的拨款。在USIA领导下的工作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之音”电台广播。此外还有各种文字印行的十几种刊物,以及其他各种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USIA受国务院领导,这也说明其主要任务是为外交服务。

由于前面提到的美国战后外交中的反共意识,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政策自40年代末以来,就成为“冷战”的工具。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从“苏联及共产主义世界有一个全面进攻的计划”这样的估计出发,制定了著名的NSC68“安全政策”,包括军事、经济、资源等各方面,文化宣传也是其中之一,其任务是进行全面“心理战”,宣传“苏联共产主义是一切自由国家和人民的共同愿望的死敌”,“发展对克里姆林宫阴谋的反抗”,而且认为“苏联统治下的人民……是潜在的盟友”。〔17〕1956年6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又提出一份“东西方交流”的政策声明,明文规定美国的政策是“促进苏联国内发生朝着放弃掠夺性政策的政府的演变”;对“卫星国”,则是“争取它们朝着对莫斯科独立的演变”。〔18〕50年代对苏联的“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对东欧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以及60年代在“美国之音”下设的专对古巴的“马蒂电台”(Radio Marti),都带有众所周知的煽动叛乱性质。即使在以后的“缓和”时期,敌对的颠覆性质不那么明显,由于美国对自己的人力、物力和思想影响力有充分自信,在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交流上也还是一贯采取积极进攻姿态。因此美国和西方国家所强调的“赫尔辛基精神”主要是文化交流、人员来往自由这一点,这是它们当初所力争,也是至今所竭力维护的。

各国人民之间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并不一定直接为外交服务。本文所涉及的只是美国以文化交流作为外交手段那一部分。如果外交本身的目的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增进与他国友好关系,为此目的服务的文化交流也是受欢迎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对外文化政策对一些国家往往带有强加于人、干涉内政,甚至颠覆性质,因此美国的“文化渗透”有时成为贬义词,不仅引起社会主义国家的抵制,也引起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感。至于正常的文化交流本来就促进各种思想和文化互相渗透,对有关国家的进步发展、对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都有好处,而且为人类进步所必需。

纵观战后40年,世界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有不少变化。如果要分阶段,尼克松时期的收缩可以算一个阶段,到里根上台又可以算一个阶段。但是本文作者认为总的世界政治格局并没有起质的变化。迄今为止,美苏仍然互相以对方为主要对手,美国外交手段的运用虽然侧重点时有变换,但主导思想没有突出的新变化。因而本文在叙述中宁愿不分阶段。

那么今后如何呢?在本世纪剩下的10多年中会发生质的变化吗?美国有的学者已经在谈论“后战后时期”(post postwar period)。这个新时期是否果真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这要取决于诸多因素的发展:

美国的实力是否在衰退中?美国由最大的债权国变为纯债务国、如此惊人的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天文数字的国债,究竟意味着什么?靠寅吃卯粮维持的经济繁荣能维持多久?1987年10月份爆发的股票猛跌是一般现象,还是预示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现存经济机制是否还能发挥调节作用,克服困难,渡过难关?总之,美国的根本经济实力是否会下降到不能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

近年来世界上出现的一个新现象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蔚然成风。美国一向对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摆脱苏联模式,走自己道路的倾向,都欢迎、鼓励,以至给予物质支援。但是现在苏联自己也提出了改革,而且表现出决心很大,来势很猛,甚至有超过某些东欧国家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势。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苏联改革的成、败对苏联维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影响如何?是否可能使苏联外交政策起重大变化?对美国的利弊如何?美国对此作出什么反应?它对美苏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局势会发生什么影响?

当前美苏之间的裁减核军备谈判和达成的协议是双方互有需要。这是否意味着美苏之间真的有可能持久地和缓下来,以对话代替对抗;还是只不过是再一轮新的军备竞赛之前的间歇?

从总的世界潮流来看,在影响国际关系的诸多因素中,经济因素的作用似乎比军事和意识

形态日益重要。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还在进一步降低。近年来种种国际纷争也表明,美苏手中所掌握的压倒一切国家的军备,实际作用极为有限。也就是说,国家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并不与军备成正比。而经济关系,包括合作和摩擦两个方面,却日益占据主要地位。这种情况发展下去,会不会有一天美国同其他某一个或某几个国家的矛盾大于美苏矛盾?这种形势可能产生于美国同另外的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中的激烈竞争,也可能出自第三世界国家不堪忍受贫富过于悬殊的现存经济秩序;在苏联的盟国中是否会出现同西方经济合作关系大于它们之间或同苏联之间的关系,从而使“经互会”作用大大降低?西欧与东欧是否会逐步接近而各自拉开与美苏的距离?

最后,设若美苏仍维持超级大国地位,有没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由于互相的需要和对某个地区的利益一致,重施雅尔塔故伎,达成牺牲他国利益的协议?或者,在新的形势下,竟出现美苏利用各自的影响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的局面?

以上问题,有的是已经出现的一些苗头,有的纯属推理设想。目前得出结论尚为时过早。只能说,目前还看不出根本性的变化,有些设想还是相当遥远的事。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美苏之间发生尖锐对抗,以至直接动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再回到50年代那种“冷战”也已不可能。

就美国本身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而言,如50年代那种能够操纵联合国的局面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世界力量重心正在逐渐分散。不过两个超级大国的地位目前还没有其他力量能够取代。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国外交的主线还会继续下去。

注释:

(1) 转引自 Thomas G. Pater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History Since 1900*, D. C. Heath and Company, 1983, p. 435.

(2) Stephene Ambrose, *Rise to Globalism: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8-1980*, George Banta Company Inc., 1980, p. 105.

(3) John Foster Dulles, “Face the Nation” on CBS, October 21, 1956, *Dulles Papers*, Box 113, Mudd Library, Princeton University.

(4) 同(1), 第506页。

(5) 《帕麦斯顿勋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97页。

(6) Seaward to Clay, May 6, 1861, FRUS, 1861, p. 277. 转引自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Ed.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Vol. II, Introduction by Walter LaFeber.

(7) 详见 Michael Hunt, *Ideolog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2. Visions of National Great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9-45.

(8) 转引自 Cecil Crabb, *The Doctrin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Louis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 384.

(9) 黑格1982年10月14日在普林斯顿大学演讲,根据作者本人记录。

(10) 杜鲁门讲话全文见 *Public Papers of the U. S. Presidents, Harry Truman, 1945*, pp. 547-560.

(11) *Executive Sessions of the U. S.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Historical Series), 81st Congress, 1st and 2nd Sessions, 1949-1950*, Vol. II, Published in 1976, Preface by John Sparkmann, p. iii.

(12) Thomas A. Bailey,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Meredith Publishing Company, 1964, p. 792.

(13) 同上, 第804页。

(14)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 S. Foreign Policy*, Harper Torchbooks, 1947, p. 14-16.

(15) 转引自 Thomas G. Paterson, 第 482 页。

(16) Allen C. Hansen, *USIA,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mputer Age*, Praeger, 1983, Preface, p. ix.

(17) NSC 68/3,《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目的与计划》,Annex 5, FRUS, 1950, Vol. I, pp. 452-461.

(18) Yale Richmond, *U. S. -Soviet Cultural Exchanges, 1958-1986: Who Wins?* Westview Press, 1987, Appendix A, p. 135.

核 威 慑

吴 展

核武器,特别是热核武器即氢弹,具有空前巨大的破坏力。据说,只要爆炸几个氢弹即可基本消灭一个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而对于装在弹道导弹上的核弹头,至今还找不到有效的防御办法。现在美苏两个核超级大国都已积累了大大小小的核武器二万多个,因此只要核战争打起来,双方都会经受亿万人民的死伤,不计其数的财产损失,其严重程度将远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谁愿意遭受这样的灾难?人们害怕核战争,故而核武器起到了威慑作用,使有核武器的国家不敢发动核战争。

威慑的概念自古有之。三国时代曹操之子曹植就有这样的诗句:“威慑万乘,华夏称雄。”更早几百年,我国春秋时代的伟大军事战略家孙武在所著《孙子十三篇》的《谋攻篇》中提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其中包含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外交途径使敌人屈服的意思。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他?的著作《西方的战略》中还说:“威慑这一原则根本不是 20 世纪的发明。希腊人和罗马人早已懂得用灾难超过可能得到的好处的恐吓使潜在的进攻者慑服。”

一、美国的核威慑政策

核武器出现以后,威慑这个词在美国以至于西方就用得很广泛了。核威慑就是以敌方难以忍受的强大核报复来使其不敢发动进攻。当然核武器的作用不止于威慑,例如它可以用来给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在核威慑失灵时也可以用于作战,但威慑是主要作用则是毫无疑问的。核保护伞的概念是从威慑派生出来的,其用意是保障盟国免遭进攻。但是,假如苏联以其强大的常规兵力进攻西欧,甚至于使用了核武器,但没有直接打美国,此时美国是否真会冒自己遭受核报复的危险以核武器来打击苏联,是很成问题的。至于在核威慑失灵时使用核武器作战的问题,则不过是一种推测。目前还没有失灵的迹象。筹划使用核武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增强核威慑的效果,给人一种失灵时真的要打的印象。

在美国看来,核威慑取决于:

1. 拥有实在的强大核力量,

- 2.有使用这种力量的决心,
- 3.双方都认识到所争夺的问题涉及国家的重大利益。

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有作战能力的核武器,那么空空洞洞地进行恫吓是不起作用的。有了核武器而没有诉诸核武力的决心,威慑也不会产生效果。这就涉及到可信度。如果人家不信,那就威慑不成。美国认为核武器必须有足够的数量和良好的性能,并且把有关的数据公开宣扬出去。美国还认为核武器应有生存能力,即使遭到突然攻击,也还能保存下足够的数量以实施报复性反击。为此美国建立了放在坚固的地下井中的洲际弹道导弹、放在核潜艇中的潜射弹道导弹和装备远程巡航导弹的战略轰炸机。这种三合一的战略力量不可能在一次攻击中被全部摧毁。在发生国际危机时,美国常常用调动其核武装部队、提高军事戒备等级、声称或暗示要使用核武器等办法来表示其诉诸核武力的决心。

核威慑有点像双人舞,对方不配合是跳不成的。核武器的威力那样大,影响那样大,如果争端不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利益,无论怎样摆弄姿态,人家都不会相信你真的要使用。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和适当的问题上表露这种决心,并千方百计使对方相信。在朝鲜战争中据说美国以核武器威胁过中国。如真有一事,中国人连死都不怕,怎么会吃他这一套!实际上当时美国拥有的原子弹并不多,不足以制服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如果都打到中国,美国将用什么来对付苏联呢?一些小国更不会被核武器吓住,因为它们不会相信一个超级大国将用核武器来对付小国。

二、美国核战略的沿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50年代初期,美国垄断着核武器,同苏联相比占有明显的优势。1954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一篇演说中宣布了“大规模报复”的核政策。那就是说,美国将以大规模核轰炸来对共产主义国家进行报复。这种报复是全面的,既针对军事目标,也针对非军事目标;既针对工厂,也针对城市。

到了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当政时,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确保摧毁”(Assured Destruction)、“限制损害”(Damage Limitation)和“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的核战略概念。美国在当时之所以要改变政策,是因为苏联的核军备已有较大的发展,而美国已无绝对优势。如果还要动不动就实行“大规模报复”,必然会反过来招致对美国的核报复。

“确保摧毁”是在敌方进行第一次打击后(为免遭报复,必然首先打击战略进攻力量),美国必须能保存下足够的核武器以对敌城市和工业区实施摧毁性的报复(第二次打击)。麦克纳马拉认为三合一的战略进攻力量极不可能在遭到第一次打击时被全部摧毁,至少,战略导弹核潜艇的生存能力是很强的。核潜艇能长期潜伏水中,很难被发现并被击中。潜射导弹的命中精度虽较低,但能打击城市。由于苏联也装备了与美国类似的核力量,所以“确保摧毁”对美国也同样适用,于是成了“相互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结果,威慑别人起了威慑自己的作用。

“限制损害”是尽量减少核战争的破坏。麦克纳马拉最初设想以核进攻来消灭?敌大部分核武器,并以防御来增强自身安全。但是核进攻等于发动核战争,所?以不可取。防御办法之一是积极防御,即用反导弹系统击落导弹的核弹头(技术上一直未过关),并用防空系统来拦截入侵的轰炸机。另一种办法是消极防御,即建造大批民防掩蔽所,但因造价太高推行不下去。

“灵活反应”是把核反击分为四级。最低一级仅打击军事目标(Counterforce)。最高一级是全面核打击。把反击分出层次是为了让美国总统能根据情况选择作战方案。为此,美国国防部相应地修改了“单一综合作战计划”(Single Integrated Operational Plan, SIOP),其中包含预先计划好的各级打击目标和作战方案。

麦克纳马拉为美国的核战略奠定了基础。除了“限制损害”因不现实而不提了之外,整个战略思想被各届美国政府继承至今。美国核战略思想大体分两派:一是威慑派,靠核威慑来避免战争;二是作战派,认为核战争有可能打,故要做好打的计划。官方核战略兼有两者。公开宣布的政策侧重威慑,但作战思想也有所透露。可以说,“确保摧毁”是美国核威慑的核心,没有这一着就吓不住人,而“灵活反应”及SIOP则是具体作战方案。美国不能把别人摧毁,自己也被摧毁。自杀方案不能令人信服。只有先小反击一下,如不行再升级,这才比较可信,才能加强威慑效果。以后的“灵活反应”都是这一方案的发展和改进,大方针未变。

到了70年代,苏联的战略力量水平已与美国大致相等。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多数是陆基的洲际弹道导弹,其弹头大,数量多,对美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当时的两任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在前,布朗在后,都修改了SIOP,把“灵活反应”搞得更细致,层次更多。这时,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也大为发展,不但有了多弹头分导技术,而且命中精度也显著提高,于是打击军事目标就发展到了包含打击导弹地下井(Countersilo)的内容。由于弹头数量增多了,打击的目标数量就可以增加,“灵活反应”的层次自然也就划分得更细。同时,美国也改善了核武器的通信、指挥、控制(Communication, Command and Control)系统,增强了其生存能力及更改打击目标的灵活性。布朗更提出了所谓的“抵销战略”(Countervailing Strategy),就是根据苏联核进攻的程度相应地作出反应,可以打单个目标,打几个目标,打多个目标,直至大规模的打击,从打击军事目标直到全面打击。

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后也对SIOP进行了进一步修改。随着反弹道导弹技术的进展,他在1983年提出了“战略防御倡议”即SDI,就是要建立庞大的反导弹战略防御系统,以消灭绝大部分进攻弹头。他甚至满怀信心地提出将来要把“确保摧毁”变为“确保生存”,因为SDI既然有如此大的功效,就不必用“相互确保摧毁”来保证和平了,人们也无须生活在“恐怖的平衡”之中了。他的倡议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许多人担心会引起更大的核军备竞赛。西欧怕美国解决了自身防御后会撤回核保护伞,置西欧防御于不顾。苏联则由于高技术落后,怕在战略防御竞赛中失利,如不参加竞赛又怕将来处于劣势。里根的乐观估计未免为时过早。几年来SDI研究的实践证明,许多关键技术不易过关。如要在近期部署一个不成熟的初步SDI系统,不但将花费大量军费,而且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于是美国政府又宣布,在可预见的未来“确保摧毁”仍是主要的战略,SDI则起增强威慑的作用。

三、苏联的反应

既然美国的核威慑政策主要起心理上的吓唬作用,那么苏联是否持相似看法?如苏联不吃这一套,核威慑就不起作用了。

苏联的核武器是跟着美国走的。据说苏联在试验原子弹之前还偷了美国的技术。苏联核战略也基本上是美国核战略的反应。

在美国的核力量占绝对优势时,苏联是很担心遭到核打击的,因此苏联加紧研制和部署核武器。尽管赫鲁晓夫在1956年说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壮大起来,但是他们一直认为如果发生战争,就一定会是核战争,而且认为那种情况下最好实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以减少苏联的损失。

后来苏联迅速发展了核武器。1957年苏联用拼凑的办法抢在美国之前试验了洲际弹道导弹,并在1959年组建了战略火箭军。于是,赫鲁晓夫于1960年1月在向最高苏维埃的报告中说:“假定某个国家或国家集团企图对掌握了核和火箭武器的一个强国实施突然袭击,……它能否立刻使受攻击强国领土上的所有核武器储备和所有火箭装备失效呢?当然不能。如果所说的受攻击国家是一个足够大的国家的话,它总是能对侵略者给予适当回击的。”赫鲁晓夫不无得意地阐述了他对核威慑的看法,因为苏联先掌握了洲际弹道导弹,但实际上当时仅部

署了几个设计粗糙的这种导弹,技术性能不成熟。当时苏联所部署的主要是中程导弹,其射程达不到美国。美国真的以为自己落后了,出现了“导弹差距”的说法,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事。1957年后美国很快超过了苏联。赫鲁晓夫在1962年采取冒险主义的做法,把中程导弹运到古巴,想威胁美国,结果在美国强大兵力的压力下只好灰溜溜地撤走。

1966年以后,由于苏联在核武器上有了较大发展,增强了信心,或者是由于美国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觉得美国也怕核战争,苏联倾向认为将来不一定打核战争,先发制人的说法也不太提了。

1969年11月在赫尔辛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苏联代表团声明,“即使在一方首先遭到攻击的情况下,它无疑仍会保有发动摧毁性报复的能力,因此我们都同意,两国之间的战争对双方都将是灾难性的。对决定发动战争的一方来说,这就等于自杀。”

苏联海军元帅戈尔什科夫1973年在《海军文集》第2期中写道:“水下火箭运载工具的生存能力比陆基发射器高得多,是更有效的威慑手段。它对侵略者是一种经常的威胁。当侵略者明白来自海洋的核报复不可避免时,他可能被迫停止发动核战争。”

上述引文都表明苏联对核威慑的看法同美国差不多。70年代苏联在核力量上达到同美国的均势后,就不断强调它不谋求优势。勃列日涅夫1981年在苏共26大上说:“试图在军备竞赛中超过对方,或指望在核战争中取胜,那是危险的发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也说过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的话。他深感苏联的经济问题严重,要改变局面就必须改革。而这需要减轻沉重的军费负担和安定的国际环境。为此苏联积极促进核武器的裁减,主张减缓核军备竞赛。

美国许多人怀疑苏联在为打核战争做准备。的确苏联的许多核战略的著作都谈到了苏联可以打核战争并必将胜利的问题。例如60年代索科洛夫斯基元帅所著《军事战略》一书中就有打核战争的论述。笔者认为这不值得大惊小怪。苏联讨论核战略的基本是军人,而文人,除了最高党政领导人外,既不了解军事,更视核战略为禁区,所以一向不触及这个领域。既然是军人在论核战略,他们当然会研究如何打核战争,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美国情况不同。美国的核战略是文人带头讨论起来的。最初,美国军人不碰这个问题。当国防部的麦克纳马拉就是一个文职人员,他的核战略是依靠兰德公司的一些研究人员搞起来的。美国的大学里、研究单位里研究核战略的也不在少数。美国历来有文人论军的传统,军人直到最近才比较注意研究战略。你说苏联在为核战争预做准备。美国国防部不是也编制了核战争计划SIOP吗?世界各国没有哪个国家的国防部不考虑打仗的问题,因为这是他们的职责,至于实际上打不打,则是最高当局来决定的。

四、中等核国家的核政策

中等核国家是综合国力中等而拥有核武器的一些国家。它们的核力量很小,比如说只有超级大国核力量的1/10或1/20,但是也起着威慑作用。所不同的是,中等核国家的核力量具有明显的自卫性质,而不带胁迫性质。由于力量悬殊,它们不可能对超级核大国发动第一次核打击,如这样做,必然是自己彻底毁灭。

中等核国家的核武器只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并有一定的隐蔽和保护措施,在超级大国进行核打击时一次打不光,能生存下来数十个,甚至仅十余个,那么把剩下的用于反击,虽不足以毁灭对手,但在大城市上爆炸,却可以给予相当严重的破坏。所以尽管数量不多,命中精度也不高(反正不是用来攻击坚固的地下井,用不着高精度),这些武器仍能起不小的威慑作用。特别是在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对峙的局面下,它们都不能使用相当大的一部分核武器来对付中等核国家,而不造成自己在主要对手面前成为弱者的后果,所以这种局面实际上扩大了中等核国家的威慑作用。

中等核国家具体指的是英、法和中国。现在先谈谈英法的问题。它们是北约的成员国,同美国有针对苏联的军事同盟关系,但是两国都不愿完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而要拥有独立的核力量。英国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第一,核武器可以增强英国的政治和军事地位;第二是感到美国核保护伞不可靠,一旦苏联以优势的常规兵力进攻,美国未必会冒自己毁灭的危险以核武器反击苏联。美国兵力迟早会从西欧撤走,在这种情况下,掌握一点核武器总算是一种安全保障。英国的核武器主要是核潜艇中的潜射弹道导弹(购自美国)。其生存能力很强。法国更不信任美国,它虽仍是北约成员国,却退出了军事一体化机构,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它认为对美国核保护伞的依赖,将产生政治上的依附关系。这种关系将使西欧易于受到美苏关系的影响。若美苏间发生核战争,即使不是因欧洲问题引起的,也可能把欧洲卷入。所以法国每年抽出约 1/3 的军费用于核武器。法国的核力量包括陆基中程导弹,潜射导弹和核轰炸机,都是自己研制和生产的。

在美苏中程导弹谈判中,苏联先是坚持英法也拆除其中程导弹,否则它也要保留同等数量的这类武器。由于英法坚持其中程导弹的独立性,苏联终于同意美苏谈判不涉及英法。

笔者认为英法虽是北约成员,但其核武器与苏联核武器不可同等看待。第一,英法中程导弹量少质差,在可见的将来,其威力不能与苏联相比,要削减,首先是美苏的事。第二,英法核力量是防御性的,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它们会用核武器首先进攻苏联,从而招致自身毁灭。只有在苏联进攻西欧的情况下,英法才有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所以应当把英法核武器同美苏核竞赛区分开。

五、中国的核武器

中国也有一支小小的核力量,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核讹诈,保卫自身的独立和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经过 30 年的努力建成的。对此,笔者仅就个人见解稍加阐述。

中国的核力量与英法核力量有相似之处。第一,都是为了防御,而不是为了进攻。第二,都是量少质差,中国的恐怕更差。

中国核力量也有不同之处。

1. 英法是北约的成员,在遭到苏联进攻时,它们的核力量可以与美国核力量合起来计算。中国则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未参加任何军事同盟,战时只能依靠自己独立作战。

2. 中国在全世界带头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英法则不肯这样宣布。它们要保留在抵挡不住苏联常规进攻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权利。中国之宣布不仅是由于不愿引起核战争,而且还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兵员众多,不那么害怕常规进攻。

3. 北约不断扩军备战,英法的核武器也在逐步扩大和更新。中国则执行了裁军政策,减少了兵员 100 万,把军工企业转向民用生产。例如核工业已把重点从核武器转为核能的和平利用;导弹工业也把重点从导弹转向航天。这并不意味着核武器不搞了,而是重点变了。近几年中国核试验次数极少就是明证。

中国的核战略虽然可以说是一种威慑,但它是针对霸权主义的胁迫性威慑的,自身不具有胁迫性,因此又可以说是反威慑。

中国的核力量是有限的。它虽不能给予敌人以超级大国所说的无法忍受的反击,但也能造成相当大的损失。

中国有限的核力量对敌人来说存在着不确定性。就是说,即使进行第一次打击,也不能肯定全部消灭中国的核武器;即使有反导弹系统(尚未过关),也不能保证全部拦截住进攻弹头,何况建立全面的反导弹系统不是近期内所能办到的。如果漏过一些核弹头,对敌人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因此在进攻效果难以确定,并有可能引起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要作出进攻的决定是不

容易的。

美苏核力量彼此对峙而且处于均势的情况对中国比对英法更为有利,因为中国很大,都市化的程度也不很高,即使用很大的气力也难于征服中国。耗费的力量愈大,就愈影响超级大国的均势,因此中国有限核力量的作用就愈加显著。

六、核战争会打起来吗?

所谓核战争指的是美苏之间的核战争,至于其他国家之间则不存在核战争的问题。二次大战以来 40 多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核威慑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们害怕常规战争引发核战争。美苏间核力量的“恐怖的平衡”能维持多久呢?人们就好像坐在用细头发丝悬挂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下面,时刻提心吊胆,生怕剑掉下来。人们推测有三种打核战争的可能性。

1.一个超级大国发动先发制人的第一次核打击,把对方的战略武器基本消灭。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1982 年美国委托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美国的战略武器问题。委员会的结论是,三合一的战略力量仍然有生存能力,因而不会被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大部分摧毁。同理,美国也无法对苏联发动成功的第一次打击。有人说,由于苏联的战略武器数量多于美国,所以苏联发动第一次打击后,若美国以第二次打击报复,则苏联可发动第三次打击将美国毁灭,结果美国可能会因此不敢进行第二次打击,而让苏联取胜。出现这一情况的可能性极小。苏联怎么能确定美国不敢报复而冒然发动进攻呢?

2.常规战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小规模核交火可升级为核大战。先谈常规战争问题。小国间的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常规战争常年不断,但它不足以引起美苏间的战争。在欧洲和东北亚,美苏双方(包括欧洲各国和日本)重兵对峙。特别西欧是美国设防重点,北约并以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来威慑华约。在这里若发生战争,双方均难以取胜,必然两败俱伤。在东北亚,双方兵力不似在欧洲那样集中,苏联后勤运输线长而不可靠,难以支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在这里进攻的可能亦很小,因为距苏联要害地区很远。在其他地区,美苏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小。双方相处总是小心翼翼,以免发生武装冲突,如一方因涉及其重大利益而强硬起来,另一方就会让步以免事态扩大。如前面讲的古巴危机就是这样。美苏极力避免兵戎相见就是怕升级为核战争。小规模核交火发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双方都知道,核门槛一经跨过就很可能不断升级而无法收拾,所以不会轻易跨过的。虽然双方都制定了核作战计划,但这只是军方在履行其职责,而且兼起增加核威慑可信度的作用,至于会不会真打核战争,则是另一回事。近来双方,特别是美国,很注意危机处理(Crisis Management),就是尽力避免危机升级为战争。双方都意识到不能打仗。

3.由于意外事件或偶然错误引起核战争。过去人们曾担心计算机或通信、指挥、控制系统的差错,雷达的差错,人为的差错,甚至未经授权者的擅自操作,可能引起核武器的错误发射。的确,这类差错是出现过,但从未造成事故。因为武器系统的控制很复杂,局部差错并不能使整个系统动作。多年来由于怕出事故,已逐步在系统的各关键部位设计了多重保险装置,并不断加以改善。所以因差错而误发导弹实际上不会发生。况且轰炸机出发后还可召回,导弹发射后仍可用指令自毁,因而安全程度更为提高。

由此可见这些可能性都不会成为现实。

美苏双方虽然在不断备战,在各个方面不断地争霸,在核武器上也不断竞赛,力图压倒对方。另一方面它们又都明白,既然谁都压不倒谁,就必须有所节制,以免酿成战争灾难。目前,稳定(Stability)这个字眼经常在文件、演说和谈判中出现。从大的方面来说,是稳定国际局势,不使紧张情况升级,最好是降级。从武器控制的谈判方面看,过去的协议规定了战略进攻武器的数量限制,虽然没有减少,但双方都有了底,在竞赛中就不会胡来,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当前的核裁军谈判更是要降低核武器的数量,试图使局势更为稳定。甚至在武器装备上也涉及稳

定问题;因为有的武器容易引起更大的竞赛,或令对方觉得先发制人有利。例如多弹头分导式洲际弹道导弹就被人说成是不稳定的。它如有 10 个弹头,命中精度又很高,那么当然是有力的进攻武器。但是它又能引诱对手去先发制人,因为只要用一个弹头就可以打掉你 10 个弹头,尽管导弹藏在坚固的地下井中无济于事,因为现代的导弹已精确到能命中地下井了。美国曾为其 10 弹头的 MX 导弹设想一种机动方案,就是为每个 MX 建造 20 多个地面掩体和其间的道路,让导弹在掩体间经常游动,使进攻的弹头无所适从。但由于系统问题太复杂,造价过高,所以无法实现。结果 MX 仍放在地下井里。现在美国正在研制一种小型单弹头的“侏儒”型导弹,可以用车辆在地面机动。敌方用一个弹头只能打掉美国一个弹头,而且还难于准确地瞄准目标。它被上述斯考克罗夫特委员会认为是稳定的武器,就大力发展。苏联也在搞类似的导弹,其研制速度似乎比美国快。反导弹武器也曾被认为是不稳定的。因为它若不能有效地拦截弹头,就反而会促使对方增加进攻武器以抵销其作用。

美国有人提出过“最低威慑”(Minimum Deterrence)的战略理论。就是说美苏现有核武器已成“超杀”(Overkill)状态,即可互相毁灭不止一次,这实在没有必要。如果把数量减少到仍能打击得对方受不了(有人说 200 个弹头就够了),并把武器保藏得好好的,那么既能使核武器大量裁减,又能继续保持核威慑。因此这种方案是稳定的。它的问题是双方能否同意这样做,以及多少数量算是足够(Sufficiency)。最近苏联官方已在公开谈论足够的问题,他们也同意“超杀”是不好的。

国际形势正在走向缓和与裁军。美苏已签署销毁中程导弹的条约,裁减战略进攻武器 50% 的谈判和限制战略防御武器的谈判也会逐步有所进展。核武器可以裁减,但在美苏相互对峙和争霸的局面改变之前,核武器不可能完全消除。由于核威慑的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核战争打不起来,然而只要战争仍是解决冲突的手段之一,核武器仍然存在,就不能完全免除核战争的危险。

究竟战争的危险能否消除?只有想发动战争的国家明白战争只能造成损失而不能产生收益时,它们才不会去打仗。过去帝国主义所以要发动战争是为了占领土地,掠夺资源,垄断市场,通过奴役性劳动进行剥削,以积累自己的资本。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条件下,占领地盘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成为包袱。现代的生产中技术比重愈来愈多,所需原料愈来愈少,因此国际市场上的原料价格不断下跌,很容易买到。现在资本家能够通过跨国公司找到适当的劳动力和有利的市场。占有市场主要靠产品的竞争力,而产品的竞争力则靠高超的技术和有效的经营。劳动力不能只求便宜,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和技术,否则也生产不出有竞争力的商品。所有这些都非占领地盘所能解决的。因此在这个新条件下,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老牌殖民主义国家逐步把殖民地甩掉,自己反而一身轻了。当然对一些落后的国家来说,争夺地盘和资源仍有某种意义,所以局部战争仍然存在。

资本主义国家间打仗,现在也不时兴了。以欧洲为例,法、德、英三国之间在历史上不知发生过多少场战争。现在它们共存于欧洲共同体中,相互都有巨大的投资,经济上的交流和相互依赖甚多,且不论苏联这个大敌当前的因素,单从经济上看,如果发生战争,它们都只会损失而不会得益,因为早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对日本、美国等其他资本主义大国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目前战争的危险主要存在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和制度的根本差别,它们彼此十分不信任,势不两立。苏联一直依靠自身力量建设,是个比较封闭的国家,现在也意识到关起门来搞不行了,多年来愈赶愈超,差距愈大,它已明白必须在政治体制上和经济上进行改革,必须实行开放,吸取外来资金和技术,必须多参加国际市场,进行国际交流,为此必须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于是提出了外交上的“新思维”。戈尔巴乔夫多次讲了世界相互依存的道理。笔者相信苏联的态度是真诚的,否则它改革不了,国力只会相对衰退下去。?如果它的改革能取得成功,那么苏联同西方之间也会逐渐多少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样一来,

美苏之间就会稳定地缓和下去,战争就愈来愈不可能发生了。

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 1950 年向联合国写了一封公开信, 提釐出开放的世界是和平的前提。他的理想也许终于会实现吧!

艺术·历史·社会

——论《美国》三部曲的艺术特色

朱世达

美国 20 年代“迷惘的一代”的重要成员、现代美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从 1927 年到 1936 年用近 10 年的时间创作了《北纬四十二度》(*The 42nd Parallel*)、《一九一九年》(1919)和《赚大钱》(*The Big Money*)三部巨著,1937 年 1 月结集出版,名为《美国》(*U.S.A.*)三部曲。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阿尔弗莱特·卡静(Alfred Kazin)评论说,“从技巧上来说,《美国》是现代小说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之一。”(1)可以说,《美国》是一部美国民族的史诗,美国现代小说中第一部伟大的民族史诗。《美国》三部曲以其广阔的社会图画、历史的深度景观和艺术上的刻意创新,在美国文学史上享有其独特的地位。当人们从现在 80 年代后期的历史高度,再回顾这世纪美国文学的发展,当人们怀着特有的兴趣再审视从葛屈露德·斯泰因、舍伍德·安德森、薇拉·凯塞、海明威、多斯·帕索斯、菲兹杰拉德、福克纳到今天的索尔·贝娄和诺曼·梅勒这一条艺术的轨迹,人们不难发现帕索斯对这一发展(哈佛大学文学教授瓦纳·贝托夫[Warner Berthoff]把 1909-1939 这段时期称之为“美国文学的复兴”[*American Risorgimento*])的贡献是巨大的,他在小说领域中开拓性的技巧试验也许比他小说本身的价值更令人注目而重要。《美国》三部曲可以说是 20 世纪美国文学的里程碑之一。法国哲学家、文学家萨特在评论帕索斯时说,他“只发明了一样东西,那便是讲故事的艺术。……我认为,多斯·帕索斯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作家。”(2)虽然今天综观这世纪的美国文学,人们会觉得萨特对帕索斯的评价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但不管怎么样,帕索斯作为美国二三十年代重要的“激进”作家的地位,《美国》三部曲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庸置疑的。

帕索斯发明的讲故事的艺术是什么呢?他运用“新闻短片”(The Newsreel)、“摄影机眼”(The Camera Eye)、“人物小传”(The Biography)和“小说叙述”(The Narrative),采用将人物命运和历史或平行或对比的手法,蓄意给读者一种艺术、历史、社会交融的动态的充满活力的印象。

帕索斯在创作这部三部曲时,在叙事方式上明显地受到乔依斯、费尔丁、笛福、T·S·爱略特的影响,在幽默和讽谕方面受惠于拉布雷和斯威夫脱,在历史的视野方面则受到吉本思想的熏陶。(3)从他的散文诗般的“摄影机眼”可以发现在哈佛唯美气氛中受到熏染的他,从未来主义、意象主义和立体主义的诗歌以及后印象派的绘画中汲取了营养。他说,“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兰波派的法国人,那些和立体主义一起应运而生的诗人们,都在竭力创作一种跃然于纸面之外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把一切都放进去。”(4)人们还发现象征主义的俄国

芭蕾舞和电影手法对作家的影响。帕索斯在小说创作中运用了“化入”“化出”“溶入”“溶出”“特写”“全景”“蒙太奇”等剪辑方法。文艺批评家克-埃·玛格尼(Claude-Edmonde Magney)在《美国小说的时代》(*The Age of American Novel*)中专门论述了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电影美学观。

惠特曼的影响可以说贯穿了全部作品。他对于美国社会的批评和惠特曼的抨击十分相似。置于三部曲前的素描(Sketch)“美国”使人联想起惠特曼的《自我之歌》。作家自己说：“我年轻时读了许多惠特曼的作品,我认为,我作品中许多富有独创性的倾向来源于美国传统这一血脉。”(5)

帕索斯十分赞誉约翰·里德的作品——一半像报纸新闻,一半像个人经历的叙述,他称这为美国接近文学样式(Near-Literature)的最显明、最完美的形式,他就是要把集现代艺术所提供的手段为一体,使他有可能摆脱传统小说的框框,致力于完善这种接近文学样式,将它提高到新的艺术的高度。

作家所撰写的“新闻短片”大部分是报纸的新闻标题,断断续续(像人们读报时,眼睛随意在报上溜一般)的新闻报道;不连贯的流行歌曲片断;社论、文章、广告的断片。它们一方面旨在揭示小说部分和“摄影机眼”中人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背景,赋与读者一种历史感,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在全部作品的行文中具有极其辛辣的讽刺意味。这些反映这世纪最初30年人类生活风云的、富有历史气息的“新闻短片”极其有力地渲染了三部曲所要表述的人类生存的悲剧性与喜剧性。于是,公众的社会生活与小说人物的私人生活就这样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个人的命运——乔·威廉斯的颠沛流浪,摩尔豪斯的发迹,赛凡琪的钻营升迁,伊惠琳的悲剧——都是这公众生活所反映出来的文化情绪的一部分。我们发现,“新闻短片I”所摘引的罗塞福骑士团在墨西哥冲锋陷阵的小调和世界工联成员麦克的命运是有关联的;“新闻短片XXIV”所列举的关于凡尔赛和会对美国南方市场的影响,和水手乔·威廉斯的生活是休戚相关的;“新闻短片XLII”中所引述的关于美国警方在西雅图对工人的镇压,和赛凡琪在巴黎社交界与交际妇女调情恰成强烈的对比。作家在“新闻短片”中多次重复引用法国小调以渲染当时自我流放异国的气氛。除了运用各类新闻标题来造成一种时代气息之外,他还像魔术师一样,将新闻的内容加以对比,利用新闻价值的内涵来达到讽喻、批判美国社会的目的,使人们感觉到那样的社会只是人类的一个阴错阳差的悲喜剧。特别要指出的是,作家由于受到欧洲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他试图从结构上——也即将“新闻短片”割裂成若干断片,用大小不等的字体印刷——来造成一种时代的怪异感,惶惑感和迷惘感。

作家所使用的“摄影机眼”非常明显地表露了这位哈佛毕业生的唯美主义倾向(虽然他对哈佛的唯美主义者时有揶揄)。“摄影机眼”是印象主义的,有的评论家认为是表现主义的。作家用一种极为朦胧的意识流来回忆他(一位艺术家)在异国飘泊不定的私生子生活,他的充满唯美主义影响的“钟罩下的”哈佛岁月,他的思想开明、雄辩、事业上雄心勃勃的父亲和南方名门闺秀、作为情妇辗转在欧洲旅店的母亲,以及他投入激进运动的一些片断和情景。

“摄影机眼”写得极为精美,但是,如果读者对于作家生平不甚了然的话,那么,对大部分“摄影机眼”的内涵是无法谙晓的。“摄影机眼(1)”描写了作家童年南非战争时,在比利时被人误认为英国人,遭人追打的情景。在他拉着母亲的衣襟、惊慌逃跑之中,居然还留心别踩了嫩嫩的草叶,显示作家早年心灵深处一种细腻的艺术气质。作家在这样稚嫩的年龄已经开始对自己“一个没有祖国的人”的归属产生疑问,开始了一生的探求,以寻求这样一个归属。在《北纬四十二度》的“摄影机眼”中,作家写了他寄养在伦敦郊区“姨妈”处的生活,写了他童年时代不断变动住址的旅途生活,其中有对喜欢朗诵莎士比亚诗句的律师父亲的依稀的回忆。他父亲在逗弄具有南方保守思想的母亲:“要是我请他们(黑人)中一个人到我们餐桌上来你会怎么样露茜?”(原文行文中基本不用标点符号,以表示意识的流动不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摄影机眼(25)”中描写他在哈佛对文化像对一杯业已被遗忘的咖啡一般变得冷漠了,他没有勇气

去打破笼罩在哈佛之上的“钟罩”。《一九一九年》的“摄影机眼(28)”描述作家在父、母亲相继过世之后的痛苦和悲哀,他希冀开始一种新生活,希望“明天是新年新月的旦日”。在“摄影机眼(43)”中,作家战后从欧洲返回美国,他似乎怀有一种惠特曼式的热情。他在“摄影机眼(46)”中写他在纽约一次激进分子的聚会上作为作家和记者所面临的困惑。在著名的“摄影机眼(50)”中,他描绘了他在波士顿抢救萨柯—凡塞蒂中的感受,提出了有名的“是啊我们是两个民族”的论断:

他们在街头用棍棒驱散我们 他们更强大 他们有钱 他们雇佣并解雇政客报纸编辑老迈的法官有点儿声誉的小人物大学校长政客的走卒们

.....

美国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异邦人镇服他们把我们的语言翻了一个个儿他们剔除了干干净净的语汇我们祖先使用的语汇将它们变得污秽而下流。

.....

是啊我们是两个民族。

在《一九一九年》中,作家把主人公之一赛凡琪描绘成一个哈佛的诗人和唯美主义者,和作家本人一样是《哈佛月刊》的编辑。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1916年因威尔逊当选总统而欢欣鼓舞,他也像作家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诺顿哈杰斯志愿救护车队。围绕赛凡琪的叙事部分,作家安插了“摄影机眼(29)(30)(32)(33)(34)(37)(38)”,描述作家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两人的遭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赛凡琪缺乏作家的智慧、想像力和才能,赛凡琪不是帕索斯的“活人的鬼魂”(doppelgaenger);由于赛凡琪和作家分享了许多相似的人生的踪迹,如果说作家在赛凡琪身上创造了一个“阉割的自我”(alter ego)也不为过的。

我们还注意到,作家在散文诗般的意识流中,运用结构上的断裂、延宕,来表现一种压抑的痛苦,一种无可奈何的愤懑,一种控诉。“摄影机眼(30)”描写作家与两个朋友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被遗弃的法国花园里的感受。喷泉。棕色与雪白色条饰相间的蜗牛。忍冬草的枝蔓。空中炮弹在唿哨,却使人缅怀起在林间的漫步。惊起山鹑。在这样的氛围中,作家在其间穿插了意念的流动:

不 总该有办法 他们这样教导我们的 自由的人们的土地 良知 要
么给我以自由要么给我 是啊他们给我们以死亡

.....

.....要么给我

.....

要么给我以死亡

作家两次申说“要么给我”,欲吐而未能吐出,到“摄影机眼”结束时,方才道出:“要么给我以死亡”,达到了高潮。

帕索斯在“新闻短片”和“摄影机眼(49)(50)(51)”的安置中表达了他的一些意图。人们发现,当作者正在“摄影机眼”中沉吟“美国我们的国家已经被异邦人镇服”“我们惨败地站立在那儿美国”时,他在前后的“新闻短片”中,除了使用《国际歌》、塞柯和凡塞蒂给家人的信的片断以烘托时代气氛和文化环境外,还选用了“爱情哦爱情哦无忧无虑的爱情啊”流行小调和关于如何使用水泥的广告,这一切给敏感的读者一种极为冷酷的印象:一边是电刑、死亡、愤怒和示威,另一边却是无动于衷、赚钱、投机和凶杀,这是一个多么冰冷、令人失望的工业社会。这就是作家想告诉人们的信息。

我们可以看出,“摄影机眼”是作家在上世纪末和这世纪最初30年的心灵历程的轨迹。在“摄影机眼(1)”中,他在提到自己时用“你”和“我们”,在第二篇中,他使用了“我们”和“杰克(即约翰的昵称)”,在第三篇中,他用了“他”和“小孩儿”,最后,他使用了“我”,他终于用第一人称单数来称谓“自己”,挖掘“自己”的爱默生式的美学良知(aesthetic conscience)。

如果说“新闻短片”代表一种外在的人的存在表露,那么“摄影机眼”则是一种时代的人的内心心理存在的分析。这种外在的存在和内心的探求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一种极为罕见的艺术的力量。正如美国文艺评论家马尔科姆·科利(Malcolm Cowley)说的,“多斯·帕索斯运用‘摄影机眼’是为了提供一般叙事中所缺乏的‘内在性’。”〔6〕

三部曲有28篇“人物小传”(如果包括《流浪汉》[*The Vag*],记录了当时美国著名的各类代表人物的经历和生活。文学批评家认为,“人物小传”部分是帕索斯写得最为精彩、动人的部分。人物中有七人属于商界、金融界或工业界,五人来自政界,四位是应用科学家或发明家,三人是工运领袖,三人出自艺术界,二人是记者出身。他们代表美国社会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思想、行为和理想。有的小传蕴含了作家的爱和同情,有的则充满了他的憎恨和厌恶。作家自己说,这些传记“是作为显示性的窗户而存在的,描述当代典型的或者重要人物的肖像,以打断本书的主要部分——小说叙述,或借以对比给它以新的视野,犹如早期宗教祭台后高架上的圣徒像,以阐明、渲染小说部分。”〔7〕“人物小传”使帕索斯有可能描述小说部分所没有的美国统治阶级中的重要成员,同时给小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多层次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心态。比如,在《花花公子》中,作家描写了约翰·里德由哈佛的唯美主义者、格林威治村放浪不羁的艺术家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的过程,其目的至少有两点:一、给读者提供一个当时美国知识分子转向激进的心路历程;二、将从哈佛气氛中熏陶出来的约翰·里德和小说人物、同样是从哈佛诗学传统中培养出来的赛凡琪上尉作对比。在亨利·福特的传记后面,紧接着是关于查利·安德逊的小说部分,其中描写查利·安德逊的弟弟正面临福特公司的解雇。在描述女演员玛戈·多琳的小说部分的前面,是一部关于艺术家伊莎多拉·邓肯的小传。其后是艺术家鲁道夫·凡伦蒂诺的传记。对作家思想影响极深的、《有闲阶级理论》的作者凡勃伦的传记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三部曲所描述的美国资产阶级的心理和社会现象。

《美国》三部曲要结集出版时,帕索斯写了一篇名为《流浪汉》的传记,置于篇末。流浪汉被剥夺了生活中的一切幸福和乐趣,没有钱,没有居住的场所,更没有希望和人间的温暖,在车水马龙的大路上毫无目的地跋涉,他是属于另一个民族的人。这篇无名的传记使《美国》三部曲对美国社会的失望之感达到了高潮。

作家在“人物小传”中同样大量运用了意识流和现代派诗歌的一些手法。他除了为了加快句式的节奏感而不用标点之外,有时还使用断句,让读者通过心灵去填补,阅读这样的文字,要求读者有极高的文学、历史和语言修养。我遇到好几位很有学问的美国知识界人士,碰到这样的段落,他们也只能摇头说,“那是谜。”帕索斯在玩弄文字游戏吗?并不是。作家以极其渊博而深厚的文学与历史知识,试图在某些篇章用特殊的行文结构造成一种适合被描述的历史人物的氛围。例如,《一九一九年》中的描写当炮灰在欧洲战场牺牲、连姓名也无法考证的《美国之躯》,第一段文字诸多连写,英文的单词淹没在一大块黑压压的段落里,给人一种怆凉、悲愤和荒诞之感。又如,在《花花公子》中,作家使用了连句式,有时不用标点加以断开,以烘托当时里德所生活的哈佛的唯美气氛:

里德是一个人;他喜欢男人他喜爱女人他耽于饮食之乐写作雾霭缥缈的夜晚饮酒雾霭缥缈的夜晚游泳橄榄球押韵的诗句当啦啦队长名牌大学演说家组织俱乐部(并不是最高贵的俱乐部,要加入最高贵的俱乐部他的血统还不够显贵)

和科匹〔8〕的声音诵读《将为王的人》〔9〕,消逝的肃杀之秋《瓮葬》〔10〕,优雅的英国散文哈佛园的灯亮了,暮霭中在榆树之下

在这篇小传中,他用了这样一个留下悬念的断句:

洛威尔家只跟卡博家人说话而卡博家

和牛津诗选。

洛威尔和卡博家是波士顿地区的名门望族。作家在这里借用了一首诗,是J·C·勃西第(J·C·Bossidy)1905年在波士顿朗诵的:“这是美好而古老的波士顿,蚕豆与鳕鱼的故乡,在那

里洛威尔家只跟卡博家人说话,而卡博家只跟上帝讲话。”他在文中只选用半句,其余半句让读者自己在意念中去补充。

人们注意到,帕索斯在“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的标题之间运用平列(juxtaposition)的手法,以通过序列使作品各部分之间达到一定的艺术效果。如批评家最常提到的例子,描写作家参加哈兰县矿工罢工斗争体验的“摄影机眼(51)”和关于金融寡头英索尔小传《政权超级权力》之间的衔接:

他抬起手伸向电话
工贼们挤在门口
我们只有用话反对
政权超级权力

三部曲各部分内在的结合和外在的结构上的吻合,使作品达到较高的美学境界。

三部曲的小说部分分别描写了12个主要人物,其中有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成员范尼·麦克瑞里,空军英雄查利·安德逊,公共关系寡头摩尔豪斯,流浪水手乔·威廉斯,诗人、唯美主义者、嗣后成为摩尔豪斯助手的赛凡琪,格林威治村交际花伊惠琳·哈钦斯,激进的工人领袖康普顿,激进分子玛丽·弗兰奇;人物的展开有一种内在的节奏感。作家描写了如此众多的人物形象,如果他没有高超的编织故事和驾驭技巧的功底,是难以胜任的。小说不是围绕一个中心情节或戏剧性遭遇来展开,描写各个人物命运的篇章被“新闻短片”和“摄影机眼”割开,分别被安置在不同章节。人物之间很少有关联。他们之间外在的关系极为松散而随意,除了在业务或“爱情”中时有来往外,别无其他更为深层的纠缠。小说没有冲突的高潮,人物——大部分都是些生物人——他们出没于酒吧间和妓院,在城市中寻欢作乐,在琐碎的、微不足道的事件中展开他们与人生的搏斗。作家在叙述每一个人物时,几乎无不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的童年、家庭背景、教育、职业、婚姻状况、环境以至死亡,每一个人物本身就是这世纪初30年美国社会中一个阶层代表人物的历史(case history)。在叙事过程中,作家很少描写对话,使用了大量的间接引语,句子每每很长。在语言上,他运用了即时的意识流手法(summary stream of consciousness),恰到好处地使用俚语或文雅词汇来描写不同的人物性格,使读者闻声即如见人。正如德尔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指出的,三部曲的叙事部分“可以在读者的心灵中无限展拓,以包括经验的全部内容。”〔11〕小说叙述部分无疑是自然主义的。卡静认为,三部曲是第一部伟大的主要以风格取胜的自然主义的小说。〔12〕

作家的这种自然主义的叙事方式其实是一种极其高超的艺术处理,他的文体从来不企求一鸣惊人,却自有它自己的美,他不像菲兹杰拉德那样五光十色、灿烂辉煌,也不像海明威那样刻意追求编织故事的效果,表面上看来,他的风格总是非常机械的。然而,在帕索斯看来,正是这种报道式的自然主义的文体能最恰当地描述他笔下的人物的人生。这种写作风格对于身兼作家和历史学家两职的帕索斯再合适不过了。作家强烈的历史感是他选择这种记录性、报道性文体的出发点,因为这种文体能最有效地概括、表述、影射、暗示作家作为“历史的建筑师”和艺术家的意愿和观点。他不仅要重建昨天以作为今天的基础,而且为了明天要将今天的基础建得坚实而可靠。他的历史感比他同时代的任何作家——包括海明威和菲兹杰拉德——都更深刻、更广泛、更自觉。他说,“依我看来,一个小说家的任务首先就是塑造人物,然后将他们放进他所处的时代的人的洪流的咆哮之中,以作出历史的一个侧面精确的、永恒的记录。”

〔13〕他认为,小说家因为塑造想像中的人物而忽略“现实”,但小说家却因为比一个纯然的历史学家或传记学家更能从他自己实在的经验出发创造一个现实而有所收益。所以,他想,最好的叙事应该将这两种人结合在一起。〔14〕萨特认识了帕索斯“用向报界发表声明的风格”写作的真正用意。他写道,正是通过这种手法——即描述平凡无奇的行为的手法,帕索斯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个别人物的经验与人们的集体的经验联系在一起,使他的读者痛恨这种社会制度。〔15〕美国文艺批评家约瑟夫·华伦·比奇(Joseph Warren Beach)在《1920-1940

年的美国小说》(*American Fiction 1920-1940*)中说,帕索斯“找到了一组新的、具有令人惊异不已的独创性的技巧以达到这一目的(表述更广泛的内涵。——作者注)——象征性和诗意让位于事务性的叙述,这样的安排也许能使批评的态度得到记录性叙事方式最大的支撑。”

(16) 帕索斯在写作这部“集体小说”(Collectivistic Novel)中试图提供社会结构和社会机制的一个横剖面;将“个人”的生活融化于“社会”总的图景之中,对“个人”生活作一个全景式的透视。正因为此,他不能将他的小说囿于传统的框架之中,他要冲出这个牢笼,于是他不得不探求新的手法,以达到他的美学目的。

帕索斯一直将“新闻短片”“摄影机眼”“人物小传”和“小说叙述”看成是三部曲有机的一部分,缺一不可。1930年,当美国公司刚将《北纬四十二度》出版,英国康士坦勃尔公司希望出英国版,但英国公司考虑到“新闻短片”和“摄影机眼”可能会使英国读者迷惑不解,从而影响销售,建议删掉,而帕索斯回电答道:“绝对不行。”对于作家试验的新手法,批评界褒贬不一。一些注重传统的文学批评家颇不以为然。如伯尔纳德·德·渥托(Bernard De Voto)在《约翰·多斯·帕索斯:我们时代的解剖学家》(*John Dos Passos: Anatomist of Our Time*)一文中说,三部曲中,美国生活的生气与欢乐被忽略了,他对于作家在作品中似乎很少能够孕育出——或者至少说传递出——一个完整的虚构人物而感到失望(17)。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在《纽约时报读书评论》中写道,“新闻短片”“摄影机眼”和“人物小传”的参差安置是一种吸引读者的“诀窍”而已,他认为,小说拔俗非竺姥夙康亩缘盟缙i薄:嘴邑サW壤昱?Henry Hazlitt)认为小说的风格“杂乱无章”,主题“枯燥乏味”。厄普顿·辛克莱认为,作品的技巧一无是处。(18)卡静也认为作品技巧有“机械、呆板”之嫌,他说,“虽然(三部曲)相当富有独创性,但小说的布局过于明显,很快就变得非常机械了。”(19)文学评论家约翰·H·莱恩(John H·Wrenn)认识到帕索斯的历史意识,他的艺术形式是为他的历史意识服务的。莱恩说,“为了追求他的作为艺术家的‘创作的欲望’,他选择了小说的形式;但是为了追求他的‘究根问底的欲望’,他选择了记录性形式。他发展了一种历史意识很强的艺术形式而达到两者的统一。”(20)著名文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新共和》上著文说,《北纬四十二度》是自从大战结束之后他迄今为止读到的最卓越、最令人鼓舞的美国小说,虽然它并没有达到海明威的技巧高度,但它的文学独创性是十分有意义的。他认为,《赚大钱》是一个“高尚的成就”,小说叙述部分是“富有独创性的和杰出的。”(21)法国诗人勃莱士·桑德拉(Blaise Cendrars)在1930年7月18日给作家的信中说,“新闻短片”给他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摄影机眼”是一种“化学反应,神秘的、试验性的化学反应。i.@i应。”(22)

然而,我认为,在今天,在《美国》三部曲已经结集出版50年之后,在帕索斯已经逝世17年之后,在美国文学潮流的大背景下来审度作家在《美国》三部曲中一些技巧试验的得失,我们应该公正地肯定他在20年代和30年代前期的历史贡献:

帕索斯在《美国》三部曲中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在于他找到了一个较为适合他的社会观的艺术形式或一种艺术结构,这种艺术形式或结构最适宜于表述社会的强大的非人格力量的主题,最能表述社会的至高无上的意义,使社会的行为成为小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为了在小说中展示一幅宏伟的、壮阔的社会与人生的图画,继承与发展了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斯梯芬·克莱恩、德莱塞的传统,试图用新闻的手段(Journalism)写出了被马尔科姆·科利称之为“新闻小说”(News Novel)和被约翰·H·莱恩称之为“记录性小说”(Documentary Novel)(23)的作品。他试图用现实的新闻材料——一种混成曲(pastiche)与小说叙述部分相平行,以表达美国日常生活的喧嚣与纷纭,给小说创造一种背景,一种气氛,一种时代感。这是他的成功之处。

他可以说是第一位在小说中试验“摄影机眼”“新闻短片”与“人物小传”手法的美国作家。《美国》三部曲由于这些大胆的文学试验而增加了其历史的视野、深度与广度,因而加

强了其艺术的力量。综观二十世纪的美文学,人们可以看到《美国》三部曲对诸如诺曼·梅勒,埃·劳·道格多罗等后继作家的影响。在我看来,他的文学试验实际上给60年代新新闻报道(New Journalism)的兴起提供了历史的源流和借鉴。同时,他的这种寓非小说于小说之中的试验对嗣后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fiction)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我们只要读一下埃·劳·道格多罗的《雷格泰姆音乐》(Ragtime 1975)这部被美国文学批评家称之为小《美国》的作品,就不难发现,埃·劳·道格多罗承继了帕索斯的文学传统,把历史事实与虚构情节揉合在一起,并有所发展。

帕索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印象主义画派兴起的基础上,试图在小说中应用印象主义的手法来表达直接的感受,达到了较高的艺术境界。读过《美国》三部曲的人们不能不被作家对于声音和色彩独有的敏感所感动。这种手法可以认为是印象主义的,也有批评家认为是表现主义的,超自然主义的,新现实主义的或结构主义的(24);他的小说笔调的节奏,从一个印象跳到另一个印象,犹如一首急促的神经质的爵士乐,表达了现代生活那种闹哄哄的癫狂;他的描写风格正适合他作为一个“外人”(outsider),一个“私生子”(illegitimacy)的朦胧意识,给读者一种美感。最近,在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文艺批评家丹尼尔·阿伦(Daniel Aaron)认为,他最喜欢《美国》三部曲中的小说叙事部分,那是写得最好的部分,那种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与语言同人物的处境和命运有一种少有的艺术上的和谐。

然而,帕索斯在三部曲中的文学试验终究给人一种权宜的为了追求表现题材而表现题材的外加的感觉,也就是一种机械的、呆板的感觉。“摄影机眼”语言晦涩,“新闻短片”对于20世纪后半期成长起来的读者已成遥远的过去,不是历史的专门家,已很难体会某些“新闻短片”的内涵,正是这些部分给现代读者造成了阅读上和理解上的困难,这也是帕索斯拥有不多的现代读者的原因。

拿《美国》三部曲与帕索斯崇拜的艺术偶像乔依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相比,人们可以看出,在艺术上,帕索斯注重于记录个人对社会的反应,而乔伊斯则更多地注意存在的比拟性。两部作品在将古代与现代平行的手法上表现了一种不同的历史感和力量。在这方面,《美国》显然比《尤利西斯》逊色不少。再将《美国》与《菲尼根守夜》(Finnegans Wake)相比,两部作品都是一样的浩繁,但乔伊斯在《菲尼根守夜》中挖掘了一切表现手段的可能性,在艺术上达到很高的水平,而《美国》却始终给人一种集成曲(medley)之感,仿佛一个手指在敲打五个琴键似的。

比帕索斯后起的作家意识到他的某些文学试验的局限性,在他们的创作中舍弃了他的一些被证明不太成功的手法,承继了他的精华,发展了美国文学——这也证明了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的艺术力量和价值。

注释:

(1) 阿尔弗莱特·卡静:《在本土上》(On Nation Ground),纽约哈科特与勃拉斯出版社1942年版,第353页。

(2) 萨特:《约翰·多斯·帕索斯和一九一九》(John Dos Passos and 1919),由安德罗·霍克(Andrew Hook)编入《评论多斯·帕索斯文集》(Dos Passos,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新泽西帕莱蒂斯-霍尔公司1974年版,第62-69页。

(3) 多斯·帕索斯在1957年9月23日给麦尔文·兰德斯伯格(Melvin Landsberg)的信中谈及《美国》文学根源时说,“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是一部充斥外加材料的小说的典范”,“在叙事方面,也许受到笛福和菲尔丁的影响。”他在1956年6月26日的信中说,“拉伯雷仍然是我喜爱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北纬四十二度》“摄影机眼(19)”表明吉本对作家的影响。

(4) 见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约写于1958-1964年间的题为《当代编年史》(The Modern

Chronicle)的讲话稿。

(5) 见作家 1938 年 3 月 26 日给威廉·亨利·彭德(William Henry Bond)的信,信存于哈佛大学豪顿图书馆。

(6) 马尔科姆·科利:《约翰·多斯·帕索斯:诗人与世界》(*John Dos Passos: the Poet and the World*),见安德罗·霍克编:《评论多斯·帕索斯文集》,第 84 页。

(7) 见威特·伯涅特(Whit Burnett)所编《一百零五位当代最伟大作者奉献世界最佳作品》(*105 Greatest Living Authors Present the World's Best*),纽约日晷出版社 1950 年版,第 124 页。

(8) 即查尔斯·科帕兰(Charles Copeland),哈佛大学文学教授,对约翰·里德和约翰·多斯·帕索斯走上文学道路影响颇大。

(9) 英国作家吉卜林(Rudyard Kipling)1898 年出版的作品。

(10) 这是 T·布朗爵士(Sir T·Browne)写的由考古而诱发的对许多民族葬礼思考的散文。该文于 1658 年出版。

(11) (12) 参看阿尔弗莱特·卡静所著《在本土上》,第 355 页。

(13) 多斯·帕索斯著:《读小威廉·罗林斯所著<以前的影子>》(*Review of "The Shadow Before" by William Rollins, Jr.*),刊于 1934 年 4 月 4 日第 LXXIII 期《新共和》,第 220 页。

(14) 参见多斯·帕索斯文章《信念的声明》(*Statement of Belief*),刊于《学者》(*Bookman*)杂志 1928 年 9 月第 LXVIII 期,第 26 页。

(15) 参看萨特著《文学与哲学随笔》(*Essays on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阿尼特·麦克尔逊(Annette Michelson)译,纽约考利尔出版社 1962 年版,第 94-103 页。

(16) 约瑟夫·华伦·比奇:《1920-1940 年的美国小说》,纽约拉塞尔与拉塞尔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57 页。

(17) 参见 1936 年 8 月 8 日第 XIV 期《文学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

(18) 参见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Virginia Spencer Carr)所著:《约翰·多斯·帕索斯一生》(*John Dos Passos, a Life*),纽约双日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72 页。

(19) 阿尔弗莱特·卡静:《在本土上》,第 353 页。

(20) 约翰·H·莱恩:《约翰·多斯·帕索斯》,纽约吐温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47 页。

(21) 参见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约翰·多斯·帕索斯一生》,第 272 页和第 349 页。

(22) 同上,第 273 页。

(23) 见马尔科姆·科利:《约翰·多斯·帕索斯:诗人与世界》,第 80 页;约翰·H·莱恩:《约翰·多斯·帕索斯》,第 145 页。

(24) 同[18],第 214 页。

美国人口的分布、流动和地区经济发展

(兼评杰克逊等著《地区差别:美国 1960-1990 年的经济增长》)

茅于軾

美国 50 个州习惯上被分成九个地区。这些地区由于历史的原因及自然资源结构的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历来相差很远。最早的欧洲移民集中在美国东北部,这一地区现仍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重心。在工业发展的初期,需要形成制造业和商业相对集中的地点——城市,而在铁路大量修筑以前,城市只能靠水运来支持,所以那时的经济发展和水运的方便有关。到 19 世纪末叶,工业的积累使美国有能力大造铁路,同时人口增加造成了对于新土地和新资源的需求。所以发生了人口和资金西移的大趋势,使西部经济迅速发展。本世纪初,汽车制造业的大发展,进一步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布局。铁路只能将繁荣带到沿线,而公路则能普惠到整个平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投入大量兵力到太平洋战区,以后又发生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都对美国太平洋沿岸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70 年代初能源危机之后,美国南方各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州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推动力,同时由于国际竞争,美国的传统工业——钢铁、汽车等,失去了发展的势头,资金和人才流向了电子、通讯、国防、飞机、医药、办公室用具等高新技术领域,而且服务、金融等部门的产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使得地区经济发展发生相应的变化。它的基本规律是各种自然资源较充足的地方,工会力量较薄弱工资较低的地方,人口密度较稀地价较低的地方,自然景色美吸引人们居住的地方,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结果是人口再一次地大规模西移。图 1 说明了这一变迁的历史比较。(1) 美国百多年来人口和经济西移的趋势还在继续。

(图略)

美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速度的差别,无论就宏观上或微观上,都有很重要的意义。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看,经济发展程度是税收的基础,而人口的分布又和社会保险经费支出直接相关,更不必说许多公共设施的建设都需要以当地经济的预测为依据。从企业界的角度看,市场在什么地方,何处的劳动力供应充足,工资比较低,原料从哪里取得,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需要参考各地区经济发展的预测。正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美国有六个单位从事地区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并发布研究的结果,其中三个是官方的,即人口普查局(Bureau of Census),经济分析局(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和橡树岭国家试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三个是私人的,即国家计划协会(National Planning Association),大通计量经济所(Chase Econometrics)和资料资源公司(Data Resources Inc.)。其中主要的是经济分析局,它于 1972,1974,1977,1980 都发布了对地区经济的预测。除以上六个机构之外,特别有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两大著名学府主办的城市研究联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Urban Studies),主要从事人口、家庭、地区发展的研究。该联合中心初建于 1959 年,至今已有近 30 年的历史。1981 年该中心发表了由五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地区差别:美国 1960-1990 年的经济增长》一书。这个研究成果不但由于作为主持单位的两大学府的声望,由于参加人员的实力雄厚而显得重要,而且由于他们的研究大量利用了前述六个单位的已有成就,所以可以看作是 80 年代最有权威的代表美国水平的在地区经济发展问题上总结性的意见。

一、人口和经济分布的静态模型

杰克逊等五人的著作,从人口和经济结构两方面回顾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规律,并据此作出每个地区 80 年代内经济发展的预测。在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中,分析了人口的年龄结构,生育率,人口流动,以及工资水平,非工资收入,人均收入等指标和人口的关系。以人口为主要环节来研究地区经济是一个聪明的办法。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而劳动又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人口又是消费的主体,消费在美国这样一个经常困于消费不足的经济中,对促进经济发展常处于关键地位。同时人口统计(家庭结构,年龄结构,迁移率,生育率,收入水平,就业情况)是各类统计中最完善且比较可靠的,因此从人口出发来研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又得有资料上的便利。但是在这种研究方法中需要突破的一点是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具体关系。对此有不同的假定便会对过去的发展作出不同的解释,进而对将来的发展作出不同的预测。

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了他们对将来的预测不同于前人的研究结论。包括经济分析局在内,前人的预测认为全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将趋于缩小,但并未明确说出什么因素导致差别缩小。杰克逊等人则预测将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仍将存在甚至扩大。至于他们的理由,虽然作了一些解释,但并不是逻辑上的必然结果。例如理由之一是因为过去这种差别一直在发展(2),然而将来的发展未必继续过去的趋势;另一个理由是认为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地区的增长常以另一些地区的衰退为代价(3),然而事实上美国并未进入到没有增长的零和对局的经济形势。本文拟对于上述两种不同预测的逻辑基础加以推测和剖析。

我们首先讨论导致经济发展差别缩小的前提,我们将发现它可以用一个简洁的静态模型来表示。

美国是一个富有流动性的社会,这不仅是由于美国民族是好动的,而且由于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由于各个州政府的开放态度,以及法律上对于流动的保护。(4)作为生产力三要素的劳动、资本、自然资源中,只有自然资源是无法流动的。它不但包括各种矿藏、土地、森林、淡水等,也包括气候,地形,江河位置,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在美国私有制的体制下,很大一部分资源都资本化了,例如土地有其价格,这个价格不仅决定于面积的大小,它上面植物生长的潜力,也决定于它的位置,它周围的经济状态。在资源资本化的情况下,它虽然在表面上和厂房、设备等资本一样,都可以用钱来表示,但和这些人造的资本仍有本质的不同,例如它永远不会完全报废;它的价值变化规律和机器的折旧完全不同;而且它不能移动,因此有别于人造的资本。在给定的自然资源条件下,当存在着市场上用价格表现的需求时,资本和劳动就会集结在自然资源的周围,利用当时所达到的技术,最有效地生产产品。只要这种产品在市场上出售能够获得经济利润,资本和劳动就会继续不断地投入。同时因为收益递减规律的普遍作用,一方面产品增多,使效用评价降低,价格随之降低;另一方面因资源的有限,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减少。最后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此时资金的边际产出等于市场上的利率,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市场上的工资。在达到均衡状态之前,可以流动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到不同的地区时始终存在着边际产出的差别,这个差别就成为推动它们流动的动力。但均衡状态一经达到,差别消失,它们失去了流动的动力,资本和劳动在全国各个地区间形成了稳定的分布。在逐步达到均衡的过程中,我们将看到各地区工资水平差别的缩小,以及各地区资金利润率差别的缩小。这种分析就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等单位预测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别将减小的逻辑依据。

根据上面的推理,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劳动和资本的高度简化了的分布模型。在图 2 中用 (x,y) 表示全美任一个地点的地理坐标,在该地点固定存在某种自然资源,其数量以 R 表示。

(图略)

由于 R 的存在,即有劳动 L 和资本 K 的投入,并经过一定时间的运作得到产出,设单位时间产出的价值以 g 表示,于是 g 是 R,L,K 的函数,即

$$g=g(L,K,R) \quad (1)$$

在达到劳动和资本分布的均衡状态时,在全美国各地的劳动和资本边际产出将达于均一化,即:

(公式 2 略)

此处 λ [$*v_L*$]和 λ [$*v_K*$]为均衡的工资水平和利率水平。

事实上,R,L,K 都是在(x,y)点上的资源、劳动和资本,而点是没有大小的,因此 R,L,K 都是密度函数。所以全美国的劳动总量 L、资金总量 K 和单位时间内的总产出 G 分别为:

$$L = \int \int L(x,y) dx dy \quad (4)$$

$$K = \int \int K(x,y) dx dy \quad (5)$$

$$G = \int \int g(x,y) dx dy \quad (6)$$

此处 L(x,y)和 K(x,y)和 g(x,y)分别是劳动、资本和产出在美国各地的分布密度。根据(1)式产出原为 L,K,R 的函数,但因 L,K,R 又都是(x,y)的函数,所以 g 最后也是(x,y)的函数。

已如前述,R(x,y)为已知的,而资本往何处投,劳动往何处流,即 K 和 L 的分布 K(x,y)和 L(x,y)为未知。但只要(1)式为已知,则满足(2)和(3)式的 K 和 L 的分布就是资金和劳动的分布规律。或者说,从(2)和(3)可以解出资本和劳动的分布情况。但此二式中有常数 λL 和 λK ,给定不同的常数会解出不同的 L(x,y)和 K(x,y)。我们要选择满足(4)及(5)式的解,它们是最后的关于劳动和资本的分布情况。

特别有意义的是(2)和(3)关于 L 和 K 的分布的解恰好是下列数学规划问题的解:

$$\text{Max} \quad \int \int g(L,K,R) dx dy \quad (7)$$

$$\text{s. t.} \quad \int \int L(x,y) dx dy = L \quad (8)$$

$$\int \int K(x,y) dx dy = K \quad (9)$$

$$R = R(x,y) \quad (10)$$

此处 $g(L,K,R)$,R(x,y)为已知函数,L(x,y)和 K(x,y)为待求函数。在分配 L 和 K 时,不断减少边际产出低的分配,增大边际产出大的分配,会使总产出(7)增大。由于 $g(L,K,R)$ 对于 L 和 K 的二阶导数为负(因收益递减),故不断调整的结果会达到边际产出的均一化,即(2)和(3)式所要求的,此时已无改进的余地,故目标函数达到极大值。详细论证可参考有关数学专著。(5)这一结论所揭示的经济学的意义是让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以寻求它们和资源的最优结合,可使全国的总产出为极大。

这是一个简化了的模型。首先忽视了劳动质量的差别,认为他是均质的。其次忽视了劳动和资本流动所发生的费用。人们在搬家时不但有旅费,有安置费,还有寻求职业的代价,重签房租或买卖住房的费用。只有当未来若干时期内预期的工资收入的差别足够抵消搬迁的全部费用而有余时,才会引起劳动力的流动。类似地,资本的流动也有信息费用和 risk 费用。?这个简化的模型还说明减少劳动和资本的流动费用,可以增加社会的总产出。

二、人口和经济分布的动态模型

根据上述的静态模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的利润水平、工资水平将趋于一致,最后人均收入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各地区的差别将缩小,这正是美国经济分析局等单位所预测的。但事实上这一情况并未发生。从 1970 到 1985 的 15 年内,美国各州的人均收入水平的排列顺序虽然经常变化,但基本形势没有改变。1970 年最富的州康涅狄格人均收入为 11759 美元(以 1982 年美元值折算,下同),最穷的州密西西比人均收入仅 6038 美元,为最富州的 51%,人均收入相差 5721 美元。到 1985 年康涅狄格州的人均收入排列第二,为 16163 美元(阿拉斯加州第一,为 16254 美元);密西西比仍是最穷的州,人均收入为 8210 美元,为最富州的 51%,二者相差 7953 美元。(6) 这些事实促使了杰克逊等人预测各地区的差别将继续存在。但是他们并未

得出任何规律,足以解释造成发展差别的原因以及这些差别的特点。

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 50 个州人均收入的分布和当人均收入完全因随机原因造成时应该服从的正态分布。图 3 表示这个比较的结果,它清楚地说明各州人均收入的分布显著地不同于正态分布。 χ^2 检验也支持这一印象。1981 年 50 个州人均收入的平均值为 8379 美元,方差为 1129 美元, χ^2 的值为 7.63。而概率为 0.05 的 χ^2 的值应为 7.82;概率为 0.10 的 χ^2 值为 6.25。现实际 χ^2 的值介乎二者之间,说明如果人均收入确系正态分布, χ^2 值达到 7.82 的机会小于 10% 大于 5%。用 1984 年的人均收入的数据作同样的计算,结果大同小异。人的体力智力都服从正态分布,而个人的经济收入显著地偏离正态,这是经济学中熟知的现象。(7) 现在我们发现,即使在具有充分流动性的美国经济内,各州的人均收入同样显著地不同于正态分布。

我们比较了康涅狄格州和密西西比州 15 年前后人均收入的变化,发现了它们的相对关系完全没有变化:最富的仍是最富,最穷的仍是最穷,后者一直是前者的 51%。非但这两个州具有这种关系,其他各州的相对贫富大体上也如此。15 年内全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增加了 35%,但各州的相对贫富却很少变化,这一现象确实是值得注意的。当然,如果各个州是被隔离的,正如当今世界上许多贫富不同的国家被隔离一样,从穷国到富国的移民被严格限制,则这种差别长时期地继续保持是可以理解的。但美国国内人口的流动并无任何限制,而且事实上各州之间人口的流动非常活跃,因此贫富关系的如此稳定就不得不使人感到惊讶。

(图 3 略)

美国国内各州之间人口流动的活跃可以从以下几点事实得到证明:从 1975 到 1980 的五年内全美国有 46.4% 的人搬了家。70 年代的 10 年内美国九大地区人口增长率最低的是 MA 区,为负的 1.1%,虽然 10 年内自然增长率为 3.8%,但人口净迁出了 4.9%。增长率最高的是 M 区,10 年内净增 37.2%,其中自然增长率为 12.1%,迁入为 25.1%。如果以州为单位,增长最低的是纽约州,为负 3.7%,增长最高的为内华达州,增加了 63.8%。此种巨大的差别不可能单纯由于自然增长率的不同,主要还是居民的迁移。10 年内迁出人口最多的是 MA 和 ENC 区,各净迁出 264 万人和 222 万人,净迁入最多的是 SA 和 P 区,各为 344 万人和 239 万人。而全美国九大区一年内人口增加的总数才约 240 万人,包括了大约 50 万人的外国移民。图 1 也从宏观上说明,抵消了人口对流迁移之后,10 年内人口重心往西净移动了约 100 公里。这一切都说明美国国内人口的流动非但没有静止,反而比 40 和 50 年代更活跃了。无怪乎杰克逊等人在研究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中,将人口的流动看作是一个主要因素,而且这一看法也为美国研究经济地理的学者所普遍接受。

那么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各地区的相对贫富关系不变的现象究竟是什么规律在起作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杰克逊等人所著该书第 118 页图 4.4_1960-1978 人均收入的变化图中找到。该图绘出了 18 年中美国九大地区平均人均收入的变化曲线。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曲线大体上保持平行。这一现象显然很难用巧合来解释,而且如果将 1978 年以后的数据加上,可以看到这种平行发展的趋势仍然在发生。请看图 4。

(图 4 略)

现在我们来分析这一现象说明了什么规律。

各地区的人均收入 PCI 是当地一年的总收入 Y 被当年的人口 P 除。对于第 i 地区,有:

(公式 11 略)

现 Y_i 和 P_i 都随时间而变,都是时间 t 的函数。故可对时间求导,以了解人均收入的变化如何依赖于收入及人口的变化。

(公式 12、13 略)

(13)式说明人均收入的变化由两部分构成:在人口不变的条件下因总收入变化引起的人均收入的变化,和在总收入不变的条件下因人口变化引起的人均收入变化。(13)式对于任一地

区任一时间都是适用的。现根据图 4,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变化率近乎相同,即

(公式 14 略)

(14)式说明,各个地区总收入的增加分摊到每个人头上,总是超过该地区因人口增加使人均收入减少的量,而且超过的量对于每个地区都是相等的,因为我们知道(14)式中的常数为正。

在(14)式牵涉到的变量 Y 和 P 中,人口的变化是一切变化的原因。一个地区收入的增减与该地区人口的流入流出有关,当然也和资本的增减有关,但资金的增减一般也伴随着人口的增减。设某一年内人口从 i 地区流向 j 地区。如果这两个地区的总收入不变,则 i 地区的人均收入将由于人口的减少而增加,而 j 地区则相反。但(14)式告诉我们,此时两地区的总收入相应变化,且恰能抵消人口变动的的影响,结果使两地人均收入的变化率相同。

对(14)式的解释揭示了一个人口流动的重要规律,即人口流动的结果倾向于消除各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差别,使它们趋于一致,而不是像上节的静态模型那样,假定人口流动的结果是消除人均收入的绝对差别。或者说,事实证明了人们不是从收入低的地方迁往收入高的地方,而是从收入增加慢的地方迁往收入增加快的地方。尽管迁入地的人均收入可能还低于迁出地的人均收入。只有这样,才会使各地区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趋于一致。

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是人是根据什么信息来决定自己的经济行为的?地区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别表现为一些地区的人穷一些,一些地区的人富一些,它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可是它并未成为人们迁移的信息依据。我们需要解释,何以人们不是根据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穷富差别决定自己的去留,而是根据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的差别来行动?以及这个增长速度是如何被观察的?

人的眼前的经济行为是由价格直接决定的,例如人们对商品的选购,对于闲暇时间的利用等。但涉及到有远期后果的行为,人们并不是按照眼前的价格信息,而是按照未来预期的信息行动,例如人们对储蓄、投资的选择。人们的迁移显然是有长期后果的一种行动,因此迁移并不是按人均收入这种相当于价格的信息来采取行动,而是人们比较了两地预期的收入水平变化,也就是预期的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之后作出的决定。这就说明了何以上节中的静态模型不符合历史事实。(14)式的经济学意义是从宏观上说明了人的流动是由预期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决定的。人们不断地从增长速度低的地方迁往增长速度高的地方。但由于投入劳动的边际产出递减,所以迁入地由于劳动供给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出减少,使人均收入的增长减缓,而迁出地则相反。所以增长速度高的地方因人口流入而减速,增长速度低的地方则因人口流出而加速,不断调整的结果是全国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趋于一致。

人们是如何观察各地区预期的收入增长率的呢?我想下列现象都反映预期收入增长率:招人的广告,新的建筑施工工地,房地产价格的变化。

对于(14)式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式中右端常数项一方面表示第 i 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同时它应该等于全国平均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因为既然各个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率都大体上相同,则全国增长率等于各个地区的增长率。而全国人均收入增长率是一个比较容易估计的数,根据历史记录可以设它为已知,并以 α_i 表示。此外,人口变化 dP_i 可以分解为自然增长 dP_{ni} 及迁入增长 dP_{mi} 。于是从(14)式可得:

(公式 15 略)

(15)式给出了一个地区人口净迁入率与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当地的经济增长率越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越低,人均收入水平越高,则将导致较高的人口迁入率。一个地区的自然增长率是比较稳定的,它可以从历史资料估计得出,又因 α_i, P_i, Y_i 均为已知,故(15)式给出了与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假定了一个,就可算出另一个。这样,使预测问题减少了一个自由度。

又全美各地区人口流入的代数和等于外国移民,故:

(公式 16 略)

外国移民的净迁入数,它也可以认为是已知的。因此(16)式的约束进一步减少了预测中的不确定性。

最后,我们将论证,这种使各州人均收入增长率一致的人口流动模式,在一定条件下,能导致全美一年的经济增长为极大。当然,我们忽略了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而仅仅从人口流动的影响来考察它对全美经济增长的作用。

为此,我们提出一个数学规划问题。目标是使全美一年内经济增长 ΔY_T 为极大,它的约束条件是全美人口总数 P_T 为一定,试问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应遵循什么规律,亦即:

(公式 17、18 略)

式中 ΔY_i 为 i 地区的经济增长,是该地区人口 P_i 的函数。求解时先作一 Lagrange 函数 L ,

(公式 19 略)

式中 λ 为拉氏乘数。当人口分布为最佳时,应有

(公式 20 略)

此式说明,欲使全美的总增长为极大,应使每个州再增加一些人口时他们的边际产出趋于一致,都等于 λ 。但如果迁入的人口与当地人口处于同样平等的竞争地位,最后迁入的人的边际产出应该等于该地区人的平均产出增量,即

(公式 21 略)

式中的 $\Delta Y_i/P_i$ 就是 i 地区人均年收入的增加,即:

(公式 22 略)

此处我们假设了一年内增长速度等于瞬间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将(22),(21)代入(20),并比较(14)式可知(20)式中的 λ 就是(14)式中的 $const$,而且证明了符合(14)式的人口流动模式同时也符合使全美总增长达到极大的必要条件。此处引入的一个前提是迁入的人们应有和原来居民相同的竞争地位。它的更一般的含义是自由流动和平等竞争可导致最大的经济增长。

注释:

(1)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87*. p10.

(2) Jackson et al, *Regional Diversity, Growth in the U. S. 1960-1990*, p. 9.

(3) Ibid, p. 2.

(4) 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第十款禁止各州对进出口货课税。

(5) 斯米尔诺夫:《高等数学教程》,第四卷第一分册,第 221、211 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 年版。

(6) 同(1),第 425 页。

(7)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11th Edition p. 86.

试析美国加速实现工业化时期的经济发展

樊亢、贺力平

美国是当今超级经济大国,在世界资本主义舞台上后来居上。它自 1776 年独立后约 120 年,到 1880 年代后期,工业跃居世界第一位,把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甩在了后面。到 1913 年,美国经济实力更为增强,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 1/3 以上,钢铁、煤产量分别接近于英、法、德三国产量的总和。1865 年内战结束至 1913 年这段时期,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美国资本主义解除了南部种植园奴隶制的束缚,工农业迅速发展,实现了工业化。这个时期也是美国发展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时期。探讨这段时期美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很有意义。

下面先考察上述美国经济的增长情况并进行分解分析,然后再考察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探寻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经验。

一、1866—1913 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首先看一下美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经济增长速度的情况。从表 1 可以看出,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在 1870 年代到 1910 年代是比较高的;而 1895—1905 年的 10 年增长水平是非常高的,超过了南北战争前工业革命蓬勃开展时的纪录。

表 1. 美国历史上几个时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

1839-49	4.24	1883/87-1893/97	3.10
1849-59	4.95	1893/97-1903/07	5.03
1859-69	1.99	1898/1902-1908/12	3.71
1869-79	4.95	1903/07-1913/17	2.60
1878/82-1888/92	3.73	1920-60	3.15

资料来源:西蒙·库兹涅茨“论美国经济增长形式”,重印于《美国经济史的再解释》,R·W·福格尔和 S·L·英格尔曼编,哈泼·罗出版社,1971 年,第 17 页。

从表 2 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每一雇员产值年均增长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三个指标,都超过了其余国家的水平(对日本,仅就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而言)。1870—1913 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世界上最高的。

美国经济持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势必大大提高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根据表 3,美国工业占世界工业的份额,内战前低于英、法、德三国,内战后首先超过法国和德国,1890 年代又超过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从而跃居世界第一。在这段时期,美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基本上也是上升的,不过上升速度相对来说慢得多,这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在这个时期是以国内市场开发为特征的。

表 2. 若干国家几种增长率比较(1870-1913 年,%)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加拿大	日本
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4.3	2.1	1.6	2.8	1.4	3.8	3.3
每一雇员产值年均增长率	1.9	1.0	1.4	1.6	0.8	1.7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	2.2	1.2	1.4	1.7	0.7	2.0	-
---------------	-----	-----	-----	-----	-----	-----	---

资料来源和说明:《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225页;美国和德国数据开始计算时间是1871年。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在1866年曾说:“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1)这段话指的是,从美国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看,它是欧洲国家的粮食、原料供应者、资本的投放地和移民场所。然而随着美国经济的增长和工业化进步,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日趋消失。表4说明了美国外贸商品结构。在内战结束前的几十年中,美国原料和未加工食品的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在进口结构中,各类商品比重没有明显变化;但内战后到本世纪初,原料和未加工食品出口比重的总趋势是下降的,原料进口比重大大上升,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在进口中的比重趋于下降。这些趋势,反映了美国工业化的成就及其影响。换句话说,美国作为制成品提供者较之于作为原料提供者更为突出了,而且,它本身也越来越成为国外原料的需求者或加工者。可以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日益减少,乃至最后消失。

表3. 若干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1820-1913年)

	世界工业生产	世界贸易总额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其余欧洲国家	
			工业	贸易	工业	贸易	工业	贸易	工业	贸易	工业	贸易
1820	100	101	4	6	24	27	20	9	15	11	37	29
1840	99	101	5	7	21	25	18	11	17	8	38	30
1860	100	99	14	9	21	25	16	11	15	9	34	24
1870	99	101	23	8	32	25	10	10	13	10	-	27
1889	100	100	30	9	20	22	7	9	17	11	-	27
1913	100	101	36	11	27	16	6	7	16	12	-	29

资料来源和说明:W·W·罗斯托《世界经济:历史和展望》,得克萨斯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52—53和70—73页;倒数第二行工业生产数字系1896—1900年数字;1820—1860年数字,罗斯托引自M·马尔霍尔《各国的工业和财富》(伦敦,1896年);1870—1913年数字,罗斯托引自F·希尔格特《工业化与对外贸易》(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45年)，“工业”仅指制造业1913年贸易数字引自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

二、1866—191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1866—1913年期间美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的成就,已是十分明白的事情。下面,我们试对这种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初步分析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增长要素的分析,二是对增长部门结构的分析,三是对增长地区结构的分析。这三个方面互有联系。

表4. 美国进出口商品的经济分类(1820-1913年,%)

	出口额 (百万美元)	进口额 (百万美元)	原料		未加工食品		加工食品		半制品		制成品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820	52	-	59.6	-	3.8	-	19.2	-	9.2	-	5.8	-
1840	112.	98	67.8	12.2	4.5	15.3	14.3	15.3	4.5	11.2	9.8	44.9
1866	338	435	67.5	11.0	5.0	14.0	12.1	16.6	3.6	12.9	11.5	45.5
1880	842	668	29.5	21.3	32.3	15.0	23.4	17.7	3.5	16.6	11.3	29.5
1890	845	789	36.6	22.8	15.6	16.2	26.6	16.9	5.4	14.8	15.7	29.3
1900	1371	850	24.8	33.2	16.5	11.5	23.3	15.6	11.2	15.8	24.2	23.9

1913	2429	1813	30.5	35.8	7.5	11.7	13.2	10.7	16.8	19.2	31.9	22.5
------	------	------	------	------	-----	------	------	------	------	------	------	------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889—890页数字计算;因小数省略,各项分类数之和与总数不尽一致;出口不包括复出口和贵金属。

(一)增长要素分析

经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靠劳动者的努力实现的。劳动者或其劳动是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或首要要素。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创造过程必须在资本或资本积累的条件下进行,资本是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此外,技术,即影响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生产效率的因素,也是与劳动、资本并列的生产增长要素。这三大要素结合在一起,共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根据下述简单模型(2),我们可以求出劳动、资本和技术对一国经济增长的“各自”贡献:

$$\Delta Y/Y = \alpha \cdot \Delta K/K + \beta \cdot \Delta L/L + \gamma$$

(式中 $\alpha + \beta = 1$,即假定生产具有不变规模报酬。)

式中, Y ——国民收入, K ——资本, L ——劳动, α ——资本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β ——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γ ——技术进步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 Δ ——增量。这个模型的基本含义是:国民收入增长(即 $\Delta Y/Y$)等于资本增长的贡献幅度(即 $\alpha \cdot \Delta K/K$)加劳动增长的贡献幅度(即 $\beta \cdot \Delta L/L$)再加上生产效率变化的贡献(即 γ)。 α 和 β 是资本和劳动贡献幅度的“权数”,估算时假定两者之和等于1单位,表示生产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这是一个抽象的假定)。 γ 是“余数”,根据 $\gamma = \Delta Y/Y - (\alpha \cdot \Delta K/K + \beta \cdot \Delta L/L)$ 计算出来,因此,可能为负。

表5列出了计算所需资料(因为各数字时间不统一,我们尽可能采用接近年份的数字)。有了表5的数据,便可分别计算 $\Delta Y/Y$ 、 $\Delta K/K$ 和 $\Delta L/L$,并在此基础上求出 γ 值。我们将计算结果及采用的 α 、 β 值列入表6。可以看出,1869—1889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来维持,这期间 γ 值为负数,表明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效率反而下降了(这并不意味着这段时期美国经济中没有任何技术进步,但却说明技术进步的效应被其他一些更强的反效应抵消了)。从1890年代起,情况有了显著变化:不仅资本积累量增长的贡献大于劳动投入量增长的贡献,而且,技术进步即生产效率提高的贡献超过了其他单一要素投入量增长的贡献。在1899—1913年期间,资本投入量增加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幅度为35.0%,劳动投入量的贡献幅度为17.0%,技术进步的贡献幅度为48.0%;在整个1869—1913年时期,这三者的贡献幅度分别为47.9%,25.3%和26.8%。

表5. 1869—1913年美国国民收入及有关数据

	国民收入 (百万美元)	其中:工资 %	利润、利息 和地租(%)	劳动力人数 (千人)	总资本形成 (百万美元)
1869年	6827	50.0	50.0	12506	1340
		1870-80年		(1870年)	(1869-73年)
1889年	10701	52.0	48.0	23318	2690
		(1880-1900年)		(1890年)	(1887-91年)
1899- 1903年	17313	50.4	49.6	29073	3890
		(1890-1900年)		(1900年)	(1897-1901年)
1913- 1918年	38613	59.4	40.6	39202	8050
		(1904-13年)		(1913年)	(1912-16年)

资料来源和说明:所有数据均取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国民收入见第240页,构成比例见第238页,劳动力人数见第127页,总资本形成见第231页;国民收入和资本形成均系当年价格数;时期数为期内年平均数;1913年的劳动力人数是根据1910年和1920年劳动力人数内推出来的。

资本投入对1870—191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突出贡献,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中美国的资本

积累比例较高。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速度。在 1840 年代和 1850 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15% 作为资本形成用于再投资;在 1865—1914 年的每 10 年中,资本形成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惊人地达到 22—25%。(3) 在 19 世纪最后 35 年中资本货物以每 10 年增加 45—60% 的速度递增,其速度相当于人口增长率的三倍;人均资本总值,按 1929 年固定价格计算,1869 年为 1190 美元,1899 年达到 3250 美元。在这一时期中,美国的净国民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净值的比例,是八个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美国为 13.1—13.9%,其余国家在 -0.4% 与 11.0% 之间。(4)

表 6. 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1869—1913 年)

	$\Delta Y/Y$	α	β	$\Delta K/K$	$\Delta L/L$	$\alpha \cdot \Delta K/K$	$\beta \cdot \Delta L/L$	γ
1869-89 年	0.57	0.480	0.520	1.01	0.86	0.48	0.45	-0.36
1889-1899 /1903 年	0.62	0.496	0.504	0.45	0.25	0.22	0.13	0.27
1899/1903- 1913/18 年	1.23	0.406	0.594	1.07	0.35	0.43	0.21	0.59
1869- 1913/18 年	4.66	0.445	0.555	5.01	2.13	2.23	1.18	1.25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表 5 数据计算并参见正文说明;1869—1913/18 年的 α 、 β 值系作者自行调整数。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资本积累的部门投向。从库兹涅茨教授给出的 1880—1912 年资本存量构成资料(表 7)可以看出,1880 年代,铁路资本增加最多(41 亿美元),占整个耐用生产资料总值增长量(85 亿美元)的近一半,其次是制造业(26 亿美元);1890 年代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农业和制造业,铁路资本的增长量比前 10 年要少,但与制造业的增长量不相上下;1900—1912 年,在铁路部门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制造业、农业、电力和照明部门的耐久生产资料资本额都有更高速度的增加,制造业的增加量(81 亿)已超过铁路部门的增加量(69 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美国经济中确有铁路先行、带动其他工业部门发展的趋势。

表 7. 美国资本存量的增长及部门投向(1880—1912 年)

(10 亿美元,1929 年固定价格)

部门	1880-1890	1890-1900	1900-1912
1. 农业	0.7	1.5	4.7
2. 矿业	0.5	0.7	1.9
3. 制造业	2.6	3.2	8.1
4. 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	4.7	4.5	12.0
铁路	4.1	3.1	6.9
电力和照明	0.1	0.5	2.3
耐用生产资料总值(1 至 4 相加)	8.5	9.9	26.7
公私非农业住宅建筑物	14.0	15.5	22.2
总资本形成	22.5	25.4	48.9

资料来源:S·库兹涅茨《美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和筹措》,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1 年,第 610-611 页。

在这段时期的美国资本形成中,外国资本(主要是英国资本)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外国对美投资,1843 年为 2 亿美元,1869 年 15 亿,1897 年 34 亿,1908 年 64 亿,1914 年 6 月 30 日达到 72 亿;外国在美国的净资产占美国可再生有形资产总额的比重,1850 年为 18.2%,1880 年 7.6%,1890 年 16.7%,1900 年 23.0%。(5) 可见,外国资本曾是美国经济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因素。利用外国资本加速国家工业化建设,美国的经验是成功的。

技术进步也是美国经济在这段时期中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一时期正是美国从单纯引进技术向引进与独创相结合转化的时代。美国经济中的技术进步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由于国内市场的广大,适于大规模生产的机械技术、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十分突出;其次,由于同行业竞争比较激烈,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是比较迅速的;第三,生产组织和劳动操作方面的技术进步在美国具有突出意义,诸如泰勒的“科学管理”和装配生产线的组织方法等。美国的轻重工业以及交通、通讯等部门在这一时期中都分别应用了大量的新技术;随着技术发明,一些新型工业部门陆续在美国诞生并蓬勃发展。如果说南北战争后一段时期美国经济增长完全依靠劳动力和资本形成量的增加,那么,在那以后,美国经济便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进步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工业的许多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与英、德等国并驾齐驱,同时,美国仍不遗余力地从这些国家大量引进先进技术。

美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这是它的劳动力供应比较丰富的一个原因。另外,移民更是美国劳动力大军源源不断地得到壮大的重要原因。1870—1910年期间,移民占美国总人口数比重一直在1/7左右,移民中工人比例在一半左右,他们占美国就业人口的比例在1/5以上。(6)联系到上述新增劳动力对1869—191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幅度为25.3%,便可以说移民劳动者的贡献比例约为5%。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数字。

(二)部门结构分析

从表8可以看出,1869—1913年美国经济各部门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是采矿业,其次是制造业、政府产业和交通运输与公用事业;农业曾是物质产业中最大的部门,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从19世纪中期起便不断下降,约在1880年代被制造业超过;第三产业一直比重最大,表明在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有一个较为发达的服务部门存在。下面我们看一下物质产业部门结构。

表8. 美国国民收入和附加价值的部门构成(1839—1913年,%)

	国民收入 (百万美元)	农业	矿业	建筑业	制造业	交通和公 共设施	第三 产业	政府
1869	6827	22.2	1.5	5.7	14.6	10.9	40.9	4.2
1879	7227	19.0	2.1	5.0	3.3	12.9	43.3	4.5
1889	10701	14.2	2.2	5.9	18.9	11.2	42.4	5.2
1899-1903	17313	18.2	2.9	4.3	18.6	10.3	39.6	6.0
1910-1913	29111	18.9	3.5	4.1	19.9	11.1	37.1	5.5
	附加价值 (百万美元)							
1839	1040	68.3	1.0	7.7	23.1			
1849	1400	59.3	1.4	7.9	32.1			
1859	2570	58.4	1.2	8.9	31.9			
1869	4830	52.6	2.7	11.2	33.7			
1879	5300	49.1	2.8	11.0	37.0			
1889	7870	35.2	3.6	14.0	47.4			
1899	10200	33.3	4.6	12.6	49.4			

资料来源和说明:表中数字均引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国民收入”见第240页,“附加价值”见第239页;“第三产业”包括贸易、金融保险、房地产等服务业;“附加价值”仅为这四大部门的附加价值之和;国民收入和附加价值均系当年价格。

表8“附加价值”表明,在南北战争前,美国农业提供了物质产业附加价值的一半多;美国那时尚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虽然从19世纪上半期起,制造业的发展速度就超过了农业,

但农业部门直到19世纪末仍提供了国民收入的近1/5和物质产业部门附加价值的1/3,而且农产品出口还是美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从1866到1913年,美国农业除在中间的20年里遇到出口衰退的困难外,基本上是稳步发展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农业中种植业与畜牧业的发展基本上同步并彼此协调(参见表9)。

表9. 美国农业产值(1800—1900年)
(百万美元)

	产值总额		种植业		畜牧业	
	当年价格	固定价格指数	当年价格	固定价格指数	当年价格	固定价格指数
1800	220	100	93	100	127	100
1810	311	135	125	137	186	134
1820	308	181	130	186	178	178
1830	427	248	176	267	251	238
1840	699	359	268	400	431	336
1850	837	449	423	489	414	426
1860	1469	647	769	794	700	561
1870	2553	793	1160	885	1393	740
1880	3021	1233	1523	1573	1498	1034
1890	3106	1500	1591	1763	1515	1346
1900	3912	1923	1865	2481	2047	1598

资料来源和说明:《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482页;“产值”不包括存栏牲畜变动数和农场房屋租金;“固定价格产值指数”系按1910-1914年固定价格编制。

制造业在这一时期中发展迅速,特点是:新兴部门日益增多,现代化技术迅速扩散;市场竞争激烈,生产日益集中,垄断大企业开始在国民经济中具有支配性影响;在消费品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生产资料工业有了更为迅速的发展。从表10可看出,消费品行业在制造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从1880年的68.9%降至1914年的57.8%,同期内生产资料行业的比重由31.1%上升到42.2%。还可看出,这一时期增长较快的部门主要是那些大量采用新技术的行业,如石油炼制、化学品工业、汽车、电力设备、金属建筑材料等等。38个行业里,按1914年的纪录,美国最大的制造业行业依次是:牲畜加工业、钢铁业、服装业、木材加工业、杂类机械业、食品加工业、印刷业、非金属制品等。这个顺序表明,美国的制造业结构既与它的初级产品供给结构有关,也适应了美国国内市场的需求结构。从轻、重工业关系说,它在从轻工业为主的类型转变为重轻工业型,而轻工业长期保持着一定的地位。

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期,美国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的发展是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从表11可以看出,1870—1913年期间,美国交通运输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一直快于工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至1913年已超过33%。美国幅员广袤,交通和通讯事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意义尤其重要。建国初期,美国交通发展重点是以五大湖为中心连接各运河并普及马车道路和扩充沿海船队。从19世纪3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铁路建设。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建设在1880—1890年达到高潮,其间平均每年建成73500英里铁路线。到19世纪末,美国已建成连接东西海岸的四条铁路干线。铁路运输的普及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远不是铁路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所能表明的。首先,铁路运费低,而铁路运费本身也在不断下降(1868—1900年期间,美国铁路运输吨英里和人英里平均收费标准减少了62%),从而促进了地区间人员和物资的流动;其次,铁路运输为美国各地区间的生产,尤其是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创造了必要的流通条件,推动了中西部以及中西部以远地区农产品的出口;第三,铁路建设相应地带来了钢铁、煤炭、机器制造等的巨大需求,促进了它们的增长。19世纪末,随着汽车、电话技术的出现,美国公路交通和通讯事业也迅速发展。1876年每万人才有一

门电话,1913年几乎每百人就有一门电话;私人拥有小汽车数量由1900年的0.8万辆猛增到1913年的119万辆,增长了近1500倍。美国经济增长得到交通和通讯事业发展的助力,值得重视。

表10. 美国制造业各部门所占制造业总产值的份额(1880—1914年,%)

消费品类			生产资料类		
	1880	1914		1880	1914
罐头食品	0.4	1.0	橡胶产品	0.2	0.5
丝及人造丝织品	0.3	0.8	化肥	0.2	0.5
针织品	0.3	1.0	基本化工产品、酸、化合物等	0.4	0.8
面包及糖果产品	2.1	3.5	石油炼制	0.3	1.2
其他食品	1.6	4.4	金属建筑材料及原料	0.3	2.1
纸产品	1.1	2.3	电力机器及设备、无线电等	0.1	1.8
印刷、出版等	2.7	5.3	办公设备(金属制品)	0.1	0.4
制糖	1.1	1.2	机动车辆	0.0	1.5
烟草制品	2.4	2.2	机车	0.6	1.4
棉织品	5.2	4.2	石料、粘土及玻璃	2.2	3.7
服装	5.8	6.7	钢铁	4.1	7.5
贵重金属制品、珠宝等	0.5	0.6	其他非铁金属产品	1.5	4.3
碾磨产品(食品)	6.0	3.4	与化学有联系的漆产品	2.8	3.7
牲畜加工品	12.4	8.4	金属器具	1.1	1.1
羊毛及毛线制品	3.5	2.0	农业机械(金属制)	0.6	0.5
地毯、挂毯等	0.9	0.6	其他机械	5.3	5.7
未归类的纺织品	2.5	1.6	锯木厂及板材厂产品	11.3	5.7
鞋、靴	4.2	2.8			
其他皮革产品	7.9	2.9	生产资料类合计	31.1	42.2
其他木材产品	8.0	2.9			
消费品类合计	68.9	57.8			

资料来源和说明:S·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37-338页;表中有些行业同时生产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例如“其他木材产品”包括生产单位用的木制品,“机动车辆”包括私人小汽车,等等;总的说来,按表中分类,对“消费品类”比重的估计可能偏低,对“生产资料类”比重的估计可能偏高。

(三)地区结构分析

美国大陆在经济地理上可分为东北部、中北部、南部和西部四大地区。东北部包括新英格兰区和中大西洋区9个州,中北部包括东北中央区和西北中央区12个州,南部包括南大西洋区、东南中央区和西南中央区16个州,西部包括落基山区和太平洋区11个州。美国经济发展是从东部开始的;在整个19世纪,各地区间经济差别非常显著,从表12可以看出,1860年东北部的个人收入就占了全国个人收入的一半,1900年东北部和中北部的个人收入占了全国个人收入的2/3。另一方面,在全国个人收入的比重中,东北部趋于下降,中北部在19世纪中趋于上升,西部更是不断提高,其增长速度最快;南部在19世纪中趋于下降。在本世纪初,南部的比重有所提高,中北部的比重有所下降。这些情况表明,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有地区转移或地区扩散的趋势。美国经济发展逐渐西移,首先是中北部发展起来,然后向西推进,进展速度是相当快的。1860年时,中北部的比重尚不及东北部的一半,到19世纪末,已接近东北部的水平了。在铁路建设大规模开展后,中北部地区是北美大陆交通运输网的中心地带,往北倚靠五大湖

区,东南西各方均有发达的铁路、公路和水路与其他地区相联结。中北部地区既是美国的粮仓,又是新兴工业的诞生地,例如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业。中北部地区的发展是美国经济中地区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形式取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典型事例。

表 11. 美国交通运输、通讯指数与工业生产指数(1870—1913 年)
(1870 年=100)

	交通运输、 通讯指数	工业生产 指数		交通运输、 通讯指数	工业生产 指数
1870	100	100	1896	381	312
1875	129	112	1900	507	399
1882	210	196	1904	659	484
1886	243	228	1909	895	665
1892	371	316	1913	1086	811

资料来源:《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工业”与“交通”两章。

表 12. 美国个人收入的地区分布(1840—1920 年,%)

	全国	东北部	中北部	西部	南部
1840	100	58	13		29
1860	100	50	20	4	26
1880	100	44	34	7	15
1900	100	41	36	8	15
1920	100	39	32	10	18

资料来源:R·A·伊斯特林“地区收入趋势,1840-1950年”,载《美国经济史的再解释》,第44页;又见《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242页。

新开发地区,到本世纪初,以农业为主,也发展了采掘业等部门。它在全国经济中虽然还不占重要地位,但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西部在全国个人收入中的比重1900年比1860年提高1倍,1920年又比1900年提高25%;它与东北部的差距大大缩小了,从1860年的1/12升为1920年的1/4。

南部情况在内战后有些特别之处。其内部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时期,由过去的单一种植业型向多样化发展。19世纪末,南部开发出新油田,刺激了本地区的经济增长,经济地位有所恢复。

三、美国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本节考察一下美国政府政策对1866—191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在这里提出的看法是初步的。分五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美国政府比较重视社会基础设施。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投资的一些特点,例如建设周期长,投资量多而且有不可分性,受益者比较分散,等等。私人资本不太愿意在这方面投资,但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却十分重要。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早在19世纪初,纽约州议会立案决定开拓当时最重要的交通线路伊利运河。据估计,1860年以前,美国运河投资总额的3/4来自各级政府。(7)在铁路建设方面,虽然资金主要来自私营铁路公司,各级政府仍给予了支持。例如,政府出面购买或担保铁路公司发行的债券,对铁路公司豁免赋税,提供中转设施,等等。美国联邦政府特别以赠送土地的办法来支持或刺激铁路公司的筑路计划,为此总共补贴出13100万英亩土地(此外,得克萨斯州政府也捐赠了2700万英亩)。内战前铁路资金约1/4,内战后约1/10来自州和地方政府。(8)当然,美国政府对铁路建设的慷慨赞助及其实施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铁路公司的舞弊行为。许多铁路公司为

多得到政府赠与土地,谎报项目,把线路作不必要的弯曲,并进行土地投机买卖。总的说来,由于得到了政府的赞助和担保,这一时期中铁路资金的筹措未遇到严重障碍。在政府的资助下,美国铁路建设有利可图,私人资本争相建立铁路公司,同时也吸引了外国资本。据统计,19世纪末,欧洲在美国铁路的投资达到30亿美元,约占美国全部铁路投资的21—22%。铁路部门的外国私人资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才被美国全部收回。美国政府利用西部广阔的土地资源,资助私营公司,调动了私人资本投资于铁路的积极性,加速了中部和西部的开发。

19世纪末公路交通出现后,美国政府在公路建设和保养等方面也发挥了一些类似的作用,促进了公路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

前已论及,美国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比较合理的产业部门结构,这是美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因素。

第二,美国政府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政策,支持了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国土辽阔,移民和人口自然增长迅速,有着广大的国内市场。在19世纪末确立起工业统治地位以前,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发展工业。美国工业从一开始就因英国工业品倾销的巨大威胁而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从1860年代起,代表制造业集团利益的共和党取得统治地位,直到1913年,美国接连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时美国的进口关税率为20%,1863年达33%,1870年达47%,1892年达49%。(9)这段时期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典型的保护主义时代。美国是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关税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行高保护政策的目的是非常明确,即保护国内工业,支持新兴的制造业部门,促进美国经济由轻工业型向轻重型并重型转变。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仍对进口钢铁及其制品、化学产品和染料课以高额关税,纺织品和农产品的关税也保持较高水平。当时的美国,年年都有大量外贸顺差,是首屈一指的工业和农业大国。此时,美国工业大概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不需要保护,然而美国政府顽固地坚持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以津贴的形式支持和加强其工业的发展。19世纪末以来的美国高关税政策,已不同于一般的贸易保护,是一种超贸易保护。它不仅仅是为了保护国内工业,而且是为了保护已经高度发展并已形成垄断的行业,使这些行业在对外扩张中无后顾之忧。正如列宁指出的:“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保护关税,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已经指出来了)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商品。”(10)

第三,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和措施,推动了农业的发展。联邦政府中的农业部是在这一时期中设立的(1862年成立农业局,1869年升级为农业部),该部着力进行农牧业优良品种的搜集和推广,建立农业统计制度。国会在1862年立法设立专门基金资助各州发展农业科学和教育事业,因而农业院校是美国教育体系中较早发展起来的专业教育机构,各州的农业院校形成本地区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的中心;联邦政府还积极为西部干旱地区的灌溉工程寻求资金来源。最重要的是,1862年通过的“宅地法”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人民移居西部、从事农业生产的热情,为农业发展的“美国式”道路奠定了基础。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在支持农业发展上比联邦政府更加积极。一些以农业为主的州和地方政府甚至直接为农场主的生产和销售活动提供资金援助。州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加上其决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补充了联邦政府对农业问题的关注,也使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更能大力促进制造业发展。美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在这个时期中,农业形成了地区分工,农业的技术进步超过了其他国家。美国农业尽管在1873—1897年期间遇到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大萧条的影响,长期陷入困境,仍然顽强地生存并发展着,在19世纪最后几年中恢复活力,重新繁荣起来,为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贡献。

第四,美国政府的市场秩序政策有助于国内工商业中的竞争。19世纪30年代后,美国政府时常标榜放任主义政策,对私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基本不加干涉。大铁路公司兴起后,垄断公司与顾客利益、地方利益的矛盾日益突出,公众舆论纷纷要求政府出面限制大公司的垄断行为。1870年代,格兰其运动(11)促使几个州政府规定铁路和一些公用事业的最高收

费率,开了政府管制市场秩序的先声。1886年,美国最高法院在一个判决案中宣布各州不能干预跨州商业事务,又限制了州政府的权力。接着国会便通过“州际贸易法”,设立州际贸易委员会以限制和监督铁路公司的垄断行为。1890年国会又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进一步限制了私营大公司垄断行为。当然,“州际贸易法”和“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当时均未很好贯彻,它们只是表明美国社会和政府中有着限制大企业垄断行为的意图,但也使大企业巧取豪夺的、独霸天下的行径不得不有所收敛。在像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大国中,政府对商业行为管制过紧或撒手不管都是不适当的。总的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段大企业兴旺时期中,竞争因素在美国经济中仍然保存着,经济增长的活力没有完全被垄断资本摧毁。

第五,美国政府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加速本国经济发展,鼓励移民和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南北战争后,美国西部各州设立专门招徕移民定居的机构,在欧洲和其他美国地区广泛进行广告宣传活动。联邦政府在1880年代开始实行有甄别地接受外国移民的政策,虽然其中包含一些民族歧视性的规定,但是客观上使美国接受的移入人口素质有所提高。移民不仅是劳动力大军的重要来源,而且充实了技术人才,带来了资金和技术。新技术发明有许多是由移民或移民的第一代后裔作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12〕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还是输入资本超过输出资本的国家。这是由于美国有广大的国土有待开发,而且正以全力开展工业化,需要大量资金。此外,美国政府极为重视吸取外国先进技术、借鉴欧美国家的先进教育方法,积极鼓励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美国的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国际资源的颇多。

美国利用国际资源,还包括对外侵略扩张和掠夺。当时美国掠夺的对象主要是西印度群岛、菲律宾、远东和中南美洲地区。

美国上升为第一工业强国,是靠了在国内外的剥削和掠夺而发家的。这一点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毫无二致。其资本带着血腥,其经济发展伴随着危机。但从经济的因素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注意的东西。美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连年保持着相当高的资本积累率,交通运输业超前发展,农业发达且持续增长,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产业部门结构,各部门在整个经济运行中比较协调,互相促进,并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等。这些经济因素,为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大力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也加速了美国经济发展。美国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也值得注意。它利用丰富的土地资源,吸引私人资本迅速在西部修筑铁路,使落后地区的自然资源得以迅速开发,从而较快克服了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悬殊状态;各地区经济增长趋于平衡,相互融为一体,使整个国民经济形成按地区优势的分工形式,发挥出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95页。

(2)这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发展的简单模型,其理论基础尚有不完善之处。借用这个模型,旨在获得对1866—1913年美国经济增长要素贡献的概括映象。有关这一模型及其在经济史上的应用,可参阅:R·E·加尔曼《经济增长》,载《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查理·斯耐伯纳出版社,1980年,第1卷;N·C·R·克拉夫斯《18世纪概览》,载《1700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史》,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卷。

(3)《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57年)》,第144页。

(4)参见S·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248—250页。

(5)《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869、255页。

(6)参见S·库兹涅茨:“移民对劳动力增长的贡献”,载《美国经济史的再解释》,第397

页。

(7)〔8〕参见P·D·麦克利兰德为《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写的辞条“交通”。

(9)参见J·J·宾可斯为《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写的辞条“关税”。

(10)《列宁选集》第2卷,第832页。

(11)格兰其(Grange)即全国性组织“保护农业社”,成立于1867年,宗旨是通过宣传教育、合作化和社会改革来帮助农民摆脱困境,其活动在70年代达到高潮。

(12)《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

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

——从历史角度进行的分析

张小青

现代国家的经济与世界市场紧密相联。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几百年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政策虽多次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的交替,但是就整体而论,它却经历了从贸易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的发展过程。但当前的问题是,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外贸政策中的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加剧。

本文论述的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力图从美国外贸政策的历史发展和演化的角度对它进行规范性的分析。

一、历史的回顾

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制造业由于战时英国制成品进口的困难而受到了意外的保护。战争后,尽管在舆论上有帕特里克·亨利那样的政治家在鼓吹“贸易应当像空气那样自由”的观点,但外国商人在美国市场的竞争却激起了美国商人对重商主义的重视。历史记载称,1784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就大约收到了300多件呼吁实行保护的信件或呼吁书。(1)面对国内这种要求贸易保护的呼声,当时的州政府即作出响应。1784年纽约州政府规定,进口货由外国船运来比用美国船运来的关税要高一倍。同时,对外国船只征收的吨位税也比美国船只为高。1782年,马萨诸塞州首次为了保护本州内的国内生产者和抵制英国货而提高了关税率,以后该政府又于1784年再次把关税率提高。宾州在1784年通过的关税法令更是明确声称其目的在于“对某些妨碍本州制造业的制造商征收附加关税以鼓励和保护本州的制造商”。其他九个州中共有六个州为达到同样目的也采取了类似措施。(2)

著名美国经济史学家罗·福格尔指出,由于各州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来自英国而不是来自其他州,因此,这些措施的影响主要施加在英国输美商品上。(3)

尽管在18世纪晚期,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稍许显示出一些各自的特点,但起码在1820年以前这些特点还未变成明确的地域经济特征,因而在此之前还没有形成以地区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不同贸易政策派别。在1789年修改《邦联条例》的立宪斗争中,以汉密尔顿为代

表的联邦党人所积极鼓吹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未受到明显的挑战。美国立国一开始实行的外贸政策就是对国内市场采取尽可能保护的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贸易政策。

约翰·杰伊这样写道：“由于我们和英法是……竞争者，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竞争者，由于我们发展着和俄国与中国的贸易，由于我们发展着自己的经济，因而我们需要一个政府，它能按全国一致的政策原则行事，对这些活动进行保护。”〔4〕

美国宪法中的有关条款全面体现了杰伊和汉密尔顿的主张。该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规定“国会有权课征直接税、关税、输入税和货物税”，目的是“以偿付国债，提供合众国的共同防务和公共福利”，并且“一切关税、输入税、货物税应全国统一”，“任何一州，未经国会同意，不得对进口货或出口货源课征任何输入税和关税”，但国会“对于任何一州输出的货物，不得课税或征收关税。”〔5〕宪法的这些文字表明：第一，联邦政府排他性地掌握了体现着外贸政策的关税决定权，由此美国的外贸政策可以获得统一；第二，关于国会和州都不得对出口货征税而只对进口货征收关税的规定，使得政府推行的扩大对外贸易、实行贸易保护的政策成为基本国策。

从1789年到1820年，美国政府的外贸政策基本贯彻着美国宪法所体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在汉密尔顿的支持下，1789年国会通过了具有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和保护美国工业双重目的的关税法。1791年，汉密尔顿又向国会提交了著名的贸易保护主义文献《制造业报告》，他建议政府通过保护性关税法令以保护新兴工业，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对美国极需的原料进口实行免税等等。1801年杰佛逊领导民主共和党人执政，但他并未改变前任的外贸政策。1807年，他使国会通过了保护美国商业的中立权法案。1816年，麦迪逊总统又使国会通过了进一步提高关税的法令。〔6〕

然而在1815年前后，美国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日益显示出差异，南北方不同的经济势力逐步发展出强烈的地区情绪，双方矛盾的焦点很大程度集中在外贸政策，尤其是关税税率上。

19世纪20年代，美国中、西部各州又掀起一次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1824年和1828年国会先后两次通过了提高关税的法案。其中1828年的法令是美国南北内战之前的最高税率，被南部奴隶主称为“可憎的关税”。在南方的竭力反对之下，国会又于1830年和1832年两度修改了关税率，把税率降到1824年的水平。然而南部各州仍对此关税采取断然反对的立场。南卡罗来纳州议会竟废除了联邦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令，使联邦政体一度出现分裂的危机。为了打破僵局，国会于1833年通过了一个折衷的关税法，规定在其后的九年内逐步降低关税。1842年，在代表工商业利益的辉格党人的努力之下，关税再度提高。但为时不久，民主党人于1846年提出了沃克关税法案，使税率重又降低。1857年，国会又通过新的法案进一步降低了关税，该法案所规定的税率一直延续到1861年南北战争的爆发。

〔7〕

美国自建国到南北战争爆发这70年的外贸政策历史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在建国之初的20年中，外贸政策以贸易保护主义为基本宗旨；在此后的50年中，由于南北社会制度矛盾的加剧，致使外贸政策在促进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满足南部奴隶种植园经济的自由贸易政策之间摇摆，而且日益偏向后者。

从南北战争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的外贸政策又全面地恢复到贸易保护主义。

1861年，国会根据莫里尔法令提高了关税率。此后国会又于1862年、1864年将关税从原来的平均税率37%提高到47%。内战后，由于物价的普遍上涨，社会广泛呼吁降低关税，因此关税率在1870年和1872年暂时稍有降低。但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1883年通过的关税法虽然降低了某些商品的税率，但关税率得到降低的商品并未和美国重要的工业部门形成竞争。相反，对那些与美国主要工业存在着明显竞争或潜在竞争的商品该法案却提高了税率。

1889年,共和党重又上台执政,国会在1890年10月通过了麦金利关税法,全面提高了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使之达到平均49%的创纪录水平,而且个别项目的税率比此平均数还要高得多。

1890年,民主党人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掀起一个反对麦金利关税法的运动,但是在它控制了众议院和重新掌握总统位置后,关税却并未得到真正的修订。1894年,国会通过了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这个法案虽然使关税略有降低,但无力扭转外贸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1897年,共和党人麦金莱当选总统,国会即于当年通过了丁力关税法,使关税率恢复到1890年的水平。随后,在1909年,国会通过的佩因-奥德里奇关税法又再次肯定了这一税率。该法被公认是“对工业的一次明目张胆的资助”。(8)

南北战争后美国外贸政策的指导思想是贸易保护主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两党对关税的争论不过是保护范围大小和保护税率高低的争论,对是否应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不予讨论。

在一、二次世界大战间的30年中,美国的外贸政策是处在由全面贸易保护向自由贸易过渡的阶段。

1912年4月,民主党人威尔逊总统发表了一份关税咨文,它被看作是美国政府外贸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威尔逊指出:“我们建起了一套特权和免除竞争的权利,……任何哪怕带有一点类似特权或任何人为利益的事物都必须废除,……我们最好而且也必须从关税着手。”(9)国会随即通过了安得伍德-西蒙斯关税法。这项关税法所规定的平均关税率比以前降低了25%。但是,“关税率得以减低的项目都是能够证明是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领先地位的项目。”

(10) 这些项目共达900余种,而另外86种商品的关税率得到提高。减低关税最多的商品是毛织物和棉织物。全部免税的商品有钢铁、农业机械、制鞋器、缝纫机等。上述减税最多和免税的商品的确是“在世界贸易中占有领先地位的项目”。安得伍德关税法还授权财政部长对外国在津贴下生产的、出口到美国的货物征收更多的关税,它成为以后日益重要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反倾销的法律依据。同时,它还赋予总统以谈判互惠协定的权力,虽然这种协定须经国会批准方能生效。这种权力在30年代末期发挥了有力的作用,成为美国政府干预和管理外贸的重要手段之一。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威尔逊企图推行的那种有自由贸易倾向的政策和关税法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战后,全然代表工业垄断势力利益的哈定政府打着恢复“常态”的旗号,改变了威尔逊的关税政策,恢复了全面的高额保护关税。1921年,国会通过了一项紧急关税法,提高了几种工业品和农业品的进口关税率,随后国会又在1922年9月通过了福德尼-麦坎伯关税法,把关税在1909年的佩因-奥德里奇法所规定的税率基础上又提高了25%,成为到此时为止的美国历史上税率最高的关税法。此后,福德尼关税法代表的维护大垄断集团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从哈丁经柯立芝到胡佛政府直至1929年经济危机的前夕,作为共和党的外贸政策的核心思想得到坚决的贯彻。

1929年4月,众议员霍利和斯穆特联名提出了新的关税法议案,它对农产品和若干种工业品的进口税率又做了新的提高。在它修订的1225种商品的进口税率中,提高税率的进口商品有890种。该法案于1930年6月17日在全世界各国和美国近1000名经济学家的抗议中经胡佛签署成为法律(11)。

在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中所包含的外贸政策延续了威尔逊的贸易自由化进程,改变了联邦政府在他执政前贯彻了20年的贸易保护主义方针。1932年初,罗斯福明确表示,“以高关税率为代表的对外经济政策中的经济民族主义,是造成全世界经济萧条旷日持久的原因之一。只有排除这一障碍,国际贸易才能恢复,我国的经济才可能从中获益”。(12)同年4月,他又说:“过去政府采取的重商主义贸易政策与美国的世界地位相悖。100年前符合我国利益的政策现在已不能为这种利益服务。”罗斯福的上述看法表明了他对美国的经济地位与对外贸易政策之间关系的明晰认识,然而,罗斯福在新政中并未要求国会通过一项全面降低关税的法案,

而是由国会在1934年6月通过了一项贸易协定法,重新肯定威尔逊时期的安得伍德关税法中所赋予总统的互惠协定的谈判权力。也就是说,罗斯福首先把他调整外贸政策的重点放在提高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灵活性上,即通过法律对总统的授权,使政府充分掌握了管理、控制外贸政策的权力,从而削弱立法机构的决策地位,进而使特殊利益集团的院外影响力受到制约。

到1937年,美国已同22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关税率平均降低了13%左右。美国开始了完全自由贸易的时期。(13)

战后,美国一手创办了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以美国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体系。与战前比较,战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美国的外贸政策在理论意义上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把对外贸易作为在全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的一个手段,与以反共为基调的对外政策相呼应,使美国外贸政策以及整个对外经济政策具有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把外贸作为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政策手段之一,从而使对外贸易和国内经济有了比以前更为紧密的政策联系。这两个特点,也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战后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广度与深度。

1948年7月国会通过“欧洲复兴法案”(即“马歇尔计划”)。法案在宣布给予欧洲经济援助的同时,要求受援国降低原有的关税并取消关税配额。它规定,受援国“必须接受自由贸易的原则”。(14)1948年底,在美国的倡导下,西欧成立了“国际贸易组织”,参加国均在美国压力下签署了减让关税的协定。

从1947年到1962年,美国分别同西欧、拉美、东南亚各国签署减让关税协定157项,并于1949年起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多边贸易谈判,以求多边互减关税。

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962年扩大贸易法》,该法除继续授予美国总统以谈判及签订国际关税减让协定的权力之外,重要的是明确规定,“扩大国际贸易,增加美国的进出口商品量,以符合政府力求达到的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发展之目的。”

自60年代中期起,美国从30年代末起奉行的以全面自由贸易为特点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改变。1967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向国会关税委员会提供的一份报告表明了政策的变化。报告称,“自由贸易符合全世界的利益,也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然而,美国的外贸政策的标志是自由贸易哲学,它有别于具体的各项政策措施。”(15)这里,报告把自由贸易作了政策与哲学的区分,它的意义在于表明,美国奉行的是自由贸易的哲学,这并不意味着它在各项贸易领域中的每项政策和作法都是自由贸易的。

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国将对进口物品一律征收10%的附加关税。这一行动表明了美国外贸政策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1974年,美国国会对1962年的贸易法(于1967年6月失效)作了大幅度修订。该法案在第一编中授权总统在五年中办理若干事宜,其中规定“采取额外关税或配额等措施以维持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这项规定使尼克松1971年的行动成为合法。它还规定“总统在与外国谈判时应依一定程序向产业及民间团体听取有关意见”。同时设立“贸易谈判特别代表处”,并将关税委员会改为国际贸易委员会,以加强贸易政策执行机构的职能。同时,该法案在表述对受到外国竞争危害工业的补助时,创造了一个新颖的概念,即来自国外的竞争有“公平而有害”和“不公平”一说。所谓“公平而有害”的竞争指的是外国对美国的出口商品在价格、出口补贴上都合乎公平竞争的原则,但在非经济因素上对美国产生损害,如外国产品不符合美国的卫生、安全标准等。这一概念为实施保护主义措施,例如以卫生、安全为由阻碍进口提供法律依据;而“不公平”竞争包括的范围更大,仅该法就列举了四项:(1)(对美国的出口征收)不正当与不合理的关税或其他限制,(2)(对美国市场)倾销,(3)补贴,(4)侵害专利权。该法第301条授权总统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下“可采取停止贸易互惠、提高关税或课征其他费用的措施加以对抗”。该法第321条和331条则分别修正了1921年反倾销法和1930年关税法中的有关规定,使之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另外,1974年贸易法还就共产党国家和美国的贸易关系作了新的规定,在相当程度上削

弱了战后初期的强烈反共色彩,以图扩大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改变或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

从60年代中期起,以1971年尼克松新经济政策为标志,在1974年得到贸易法的法律承认,美国的外贸政策从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变为在自由贸易旗号下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自1974到1979年的五年中,美国国会共通过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70多项,涉及钢铁、汽车、纺织品、机床、机械加工产品、多种农产品等等。与此形成对照,从1951年到1969年的18年中,国会通过的此类性质的法案仅50多项,而且多与农产品有关。仅此足见保护主义浪潮的猛烈。(16)

1979年,美国国会又通过了新的贸易法案。该法案除批准政府在“东京回合”谈判中的协定和就若干技术问题作出修订外,引人注目的是,该法案将反倾销的内容辟成专章,并且加强了程序上的规定。另外,它声称美国坚持的是“自由而公正”的贸易原则。(17)

二、历史的分析

如果我们对以上不同阶段的保护主义作进一步的探讨,我们会对这200余年的美国外贸政策史作出更明晰的认识。

首先,不同时期的保护主义政策和与此相对的自由贸易政策产生的背景极不相同,因而其政治、经济含义也有极大差别。

美国从建国初期到19世纪20年代的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是一个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保护民族工业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必要手段,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在确立过程中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措施。

独立战争时期,由于美国对战争物资的需要和国外贸易的受阻,国内工业一度繁荣发展,但在革命后,美英贸易得到恢复,战时的幼弱工业抵挡不住英国商品的进攻,纷纷破产。1789年的关税法规定的关税率只有15%,不足以保护国内工业,使资本流向土地投机和商业投机活动。1793年的英法战争和随后的拿破仑战争,刺激的只是美国航运业的发展。

1807年美英关系恶化,美国通过禁运令,断绝与英贸易,这种状态持续到1814年。此后美国数次提高关税率,形成了全面的贸易保护。这两项措施给美国经济带来两个极其重要的影响:第一,美国无法在工业品方面继续依赖欧洲,以前全部靠进口的商品转而必须自己制造,于是制造棉毛纺织品、铁器、玻璃、五金器具及其他日用轻工业品的工厂,在全国(主要是东北地区)建立起来,造成了在开放经济体制下大国实行工业化的第一阶段——进口代替阶段的开始。第二,同英国的贸易受到限制,特别是进口贸易受到限制,遏制了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金外流,促使资本大部分转入工业,从而为工业化造成了必要的资本储备,形成资本积累。可以认为,建国初期至19世纪20年代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促使和推动美国开始它的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正是从这一时期起,美国开始了工业革命。这种说法正与上述论点吻合。

美国当时的对外经济状况表现为初级外向和次级内向的混合。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与英国的贸易关系中,出口大多是农产品、原料等初级产品。建国后,这种状况许久未得改变。同时,政府的工业政策是次级内向,即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国内制造业,以国内的制成品去替代进口品。将初级外向的对外贸易发展阶段和次级内向的工业化政策相结合,正是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开放经济体制下完成工业化的一种政策措施。就美国而言,初级外向的外贸状态是由它和英国的历史关系及其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而次级内向的政策却是它符合自身利益的发展战略,以高关税为代表的全面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就是这项发展战略的集中体现。

前述第二个时期中所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的争论,是美国国内两种社会制度斗争的外在经济表现。

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它排斥了自由雇佣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因而具有奴隶占

有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与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根本的矛盾。南部奴隶制经济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它片面发展棉花种植业的结果,使其经济严重依赖外国市场。因之,南北经济的冲突首先就集中表现在关税的问题上。南部对 1824、1828、1832 年的几次保护关税法均持反对态度。1833 年以后,南部开始在国会取得不断扩大的影响,遂极力推行它的自由贸易政策。南部这种自由贸易方针和美国后来所鼓吹并实行的自由贸易是全然有别的。美国经济学家 R·W·汤姆逊在《关税史》中说:“这种政策与其说是美国的,不如说是英国政策在美国南部殖民地的延伸,因而它是殖民地的政策。”

1847 年至 1860 年,美国棉花的出口量有极大增加;同时,棉纺制成品的进口量也增加得相当惊人。棉花基本全部由南方生产,棉花出口额占南部出口总额的 93%,因而棉花出口反映了南部生产和出口原料的出口状态;在 1847 年至 1860 年的棉花制成品的进口增加量中,北方的进口增加幅度远不及南方,这充分反映了南方出口棉花(原料)、进口棉制成品(成品)的殖民地贸易模式。在南部鼓吹的自由贸易政策下,这种出口原料和进口制成品的贸易获得了极大的增长,它显示了南方自由贸易政策的殖民地性。

南北战争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又进入了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的时期。这一时期开始于 1860 年 3 月 12 日国会通过的莫里尔关税法。内战期间,代表北方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国会就先后于 1862 年、1863 年、1864 年和 1865 年数次通过了提高关税率的保护主义关税法。战后,国会又于 1866 年两次,于 1867、1869、1870、1872、1874、1875、1879 年通过了各种提高关税的法案。此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国会共通过各种关税法 27 项〔18〕。这些保护主义的关税立法对美国工业品的贸易和生产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 1860 年至 1890 年间颁布的各次关税法案中,表现出一种趋势,即对重工业的保护愈益加强。这种趋势亦与美国工业史表现的现象相吻合。

到 1890 年左右,美国工业赶上并超过了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然而从内战起实行的保护关税政策却一直保持不变,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年代,其中的原因是需要探讨的。

按古典贸易主义的理论,实行贸易保护的基本理由中最重要的是“婴儿工业”论。但是,当美国工业在 90 年代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后,仍实行保护贸易的政策,就难以用“婴儿工业论”作为理由了。当美国经济从内战后开始高速发展的时候,工业的集中就与之伴随。美国在此后 30 年内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发展过程,也是它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在这种资本主义不同阶段的交替中,虽然始终实行着表面上相同的贸易保护主义,但对于不同的阶段来说,其保护对象及其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以钢铁工业为例。〔19〕内战后美国的钢铁工业从技术落后、规模狭小的基础上开始发展,直到 1887 年基本呈不断成长的趋势。自 1880 年后,美国的钢铁生产,无论从人均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与品种、生产技术、设备先进程度等方面都超过英国而居世界首位。在同一时期内,由于美国国内对钢铁制品、特别是铁道的需求量极大,从英国进口的钢铁制品量在 1872 年以前也呈增加状态。由于市场广大,而且美国保护关税使英国钢铁制品的价格优势受到削弱,美国钢铁工业在英国的竞争面前并未垮台,而是迅速发展,最终几乎完全占领了本国市场,完成了进口替代的过程。

当美国钢铁业获得了充分的竞争能力之后,保护主义关税不再有存在的必要。1872 年,国会通过的关税中宣布对铁道的进口关税降低 10%;1883 年在另一关税法中,这一关税又有所下降。最后,在 1890 年的麦金利关税法中,钢铁制品的进口税率再次降低。保护关税的下降,在若干年份中使英国对美国的钢铁制品出口额有所增加,这无疑加剧了美国钢铁业和英国的竞争,但是这种局面却促进了美国钢铁业的技术进步。1870 年,每吨美国制造的铁道市场售价为 106 美元,到 1895 年,降至每吨 22 美元。

然而,在 1890 年至 20 世纪初这一时期内,美国钢铁业中的垄断势力不断增强。到 19 世纪

末,生产集中的结果使这一行业中只剩下了四个最有力量的集团。最后在1901年,这四家集团合并成了美国实力最强大、组织最完备的垄断组织——美国钢铁公司。这家公司自成立以后,每年动用大笔经费进行庞大而有力的院外活动,影响国会关于钢铁工业的关税立法。据《美国企业史》载,仅1903年至1908年的五年中,美国钢铁公司为阻止国会制订降低有关钢铁产品保护关税率的立法,就花费近400万美元从事各种院外活动。它有效地阻止了钢铁产品进口税率的下降,促使国会继续对美国钢铁工业实行保护主义的贸易始末?维护自己对美国钢铁市场的垄断地位。1908年,国会通过一项有关钢铁产品进口关税的新立法。该法案不仅未降低原有的税率,反而使其有所提高。钢铁垄断势力在垄断地位加强后,提高了30种产品的价格,其中有9项远远高于英国同类产品的价格,而后者却由于美国的保护关税被隔阻于美国市场之外。仅铁道一项产品,只要市场价格提高一美元,美国钢铁公司一年的利润就可增加240万美元。(20)美国在1890年之后继续实行的保护主义贸易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和相当大的范围内起到的正是保护垄断的作用。因此,自1890年之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和在此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有了本质的不同,一个是为保护发展中的工业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另一个则是为保护垄断资本的垄断利益,它窒息了竞争,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发展。

在保护政策之下,美国的工业得到发展,而发展导致生产集中,形成垄断,垄断又加强保护政策,从而阻碍工业的发展。贸易保护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自我否定的过程,反映了这一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

从内战至本世纪30年代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可以从1890年划分为两大阶段。此两大阶段中同一种政策的性质和目的及效果的差异,正是上述自我否定过程的表现。

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外贸政策中重又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和上述两个阶段的贸易保护主义又有所不同,差别主要表现在保护目的、保护手段和保护范围等方面,而最根本的不同在于贸易政策的基本前提与历史上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大相径庭。

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前提包括,第一,政策制订国对自身经济地位的理解;第二,外贸政策在整个国际经济政策中的地位及其与外交政策的关系,这决定于政策制订国企图通过外贸政策达到何种目标。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60年代中期的国际经济地位决定了它采取全面自由贸易的外贸政策,这反映了它的经济实力。然而,它的外贸政策又具有强烈的反共色彩,这表现了它的外贸政策及其国际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服从于它的外交政策。因此,这一时期的自由贸易政策只是相对于美国的同盟国而言的。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受到挑战,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这种对美国地位的挑战结合在一起,使美国外贸政策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模式有所改变,引起了政策基本倾向的改变,即从全面的自由贸易转而成为以自由贸易为基调的有限贸易保护政策。这种政策和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的区别在于:第一,就保护的而言,所包括的不再是所谓的“婴儿工业”,也不单纯是具有竞争实力的工业中的垄断状态,而是保护处于垄断状态而竞争能力低下的传统工业;其次,就保护手段而言,关税已不是主要的、甚至不是重要的保护主义措施了;第三,就保护的而言,是有选择地对某些工业,如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工业,采取保护措施,同时这些保护措施对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类型产品有比19世纪严格得多的针对性;第四,保护主义的社会基础也有重要变化。这主要表现在,19世纪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主要来自各种处在发展中而需要保护的工业资本家,或者来自自己形成垄断而企图通过保护以获得垄断利润的垄断资本家,工会大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攻击贸易保护主义。而70年代后在呼吁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业中,工会站在进口竞争受害者方面,同资本家一起采取相同的立场,并大力进行院外活动以达到目的。以美国钢铁工人工会为例,仅1974年就花费21万美元进行院外活动,其中17万元直接与贸易保护主义立法活动有关。(21)贸易保护主义社会基础的这一变化,加剧了美国政府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所受到的压力。

三、80年代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

80年代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中“处于衰落”的部门和失业人数都在增加,以及美国国际经济地位下降,其表现形式是进口大幅度增加,贸易逆差猛增。

1985年2月,美国劳工部发表了名为《美国与世界经济》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处于衰落之中的工业部门有“钢铁、造船、制鞋、成衣”,而受到外国竞争严重威胁的工业部门有“半导体、汽车、家用电器、电机、微型计算机、塑料及其制品”等行业。“处于衰落”之中的工业的平均失业率比1984年平均失业率高近一倍,其中钢铁工业的失业率比平均失业率高近三倍,开工率比西欧共同体、日本、巴西、南朝鲜的平均开工率低15%。制鞋、纺织、成衣等行业的失业率和开工率与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和外国主要生产国的开工率相比,也表现了与钢铁工业类似的态势。同时,上述工业部门的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也低于“受外国竞争严重威胁的部门”,而后者本来就低于美国商品对本国市场的平均占有率。

将这份研究报告表明的情況与美国国会定期出版的《国会记录与分析》相对照,可以使我们对80年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业分布、各行业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呼声日益强烈的原因有进一步的认识。

《国会记录与分析》1985年第4期刊载的美国国会于1985年讨论、表决的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法案说明,1985年中,共有54名众议员提出与对外贸易有关的提案共241件(不包括农业),交送众议院表决的有187件,其中带有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有152件,占有提案的81%。这152件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提案,共涉及15个工业部门,但分布极不均匀,仅与钢铁、制鞋、纺织、成衣四个行业有关的提案就达92件,占总数的60%以上。这表明,失业率高、开工率低、外国产品占市场份额大的行业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地。换句话说,衰落行业正是最强烈呼吁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行业。由于判断一个行业是否为“处于衰落”之中或“受到外国竞争严重威胁”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外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占有额,因此所谓“处于衰落”之中的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于外国此类行业的发展程度和竞争水平而言的。至于那些“受到外国竞争严重威胁”的行业,更是如此。这一点,对于理解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及其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因为“处于衰落”之中的行业最着力鼓吹贸易保护主义,而“衰落”本身又是在很大程度上相对于外国同类行业的竞争而言,因此,随着美国有更多的行业受到外国的竞争,它就会有更多的行业被认为是处于衰落之中,而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就会愈大。

面对国内若干部门要求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美国政府自1982年起明确制订了“贸易政策行动计划”。此项计划包括的具体行动每年有所不同,但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做法却表现出连续性,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和态度:

首先,对国内进行自由贸易的宣传、教育,对外主要竞争者施加压力。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主要官员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有关言论,无一不对听众进行自由贸易的宣传和教育,阐述自由贸易对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利益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同时,在各具体行业的进口竞争和外国竞争者的谈判中,竭尽可能地对手施加压力,以求达到限制进口或迫使对方开放市场的目的。

其次,对处于衰退之中的国内工业部门给予保护,同时大力倡导、组织新一轮的多边国际贸易谈判。

第三,加速对传统工业的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争能力。自1983年,美国政府通过特殊的政策法规,大力鼓励和引导对传统工业的投资,加速其技术改造。美国政府在这方面的努力还包括,增加研究与发展投资,修改《反托拉斯法》以减少对企业兼并的限制,发展新兴部门,鼓励劳动力从传统工业部门转移等等。

可以认为,倘若美国政府成功地完成了上述计划,使美国外贸情况有所改善,从而使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得到缓解,它就可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否则,它的外贸政策中就会有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注释:

(1) 西蒙·杜克:《保护主义与民族主义》,英文本,第42页,纽约20世纪基金出版公司1960年版。

(2) 参见吉·菲特和吉·里斯著:《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 罗伯特·福格尔:《美国经济史的重新解释》,英文本,第78—82页,纽约哈泼和汇出版公司,1971年版。

(4) 均参见《联邦党人文集》,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5) 参见《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6) (7) 以上内容均参阅乔·科蒂斯《保护与繁荣》第2卷,吉·菲特《美国经济史》,陶西格《美国关税史》第1卷和樊亢编《外国经济史》第1卷第5章。

(8) J·拉芬格:《美国关税的政治经济学》,英文本,第43页,加拿大科学出版公司1977年版。

(9) 拉·费里斯编:《美国历史文献集》,第7卷,第54页,纽约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2年版。

(10) J·拉芬格:《美国关税的政治经济学》,第71页。

(11) 查·金德伯格:《1929—1933年世界经济萧条》,中译本,第1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12) 费里斯《美国历史文献集》,第7卷,第271页。

(13) 威廉·刘易斯:《经济综览1919—1933》,英文本,第70—74页,布莱克斯顿公司,费城,1975年版。

(14) 参阅黄庆源《美国贸易法》,第2卷。

(15) 《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文件汇编》(外贸),第149页。

(16) G·K·海兰尼编:《保护主义或工业调整》,英文本,第142页,巴黎大西洋国际事务研究所版,1985年。

(17) 参阅黄庆源《美国贸易法》,第2卷。

(18) 参见乔·科蒂斯:《保护与繁荣》,第2卷。

(19) 参阅E·劳伦斯:《重组美国的工业》,英文本,第134—178页。

(20) 参阅弗·开普尔:《保护主义与工业的衰落》,第244页,伦敦古德与斯托顿公司1983年版。

(21) 劳伦斯:《重组美国的工业》,第234页。

八十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发展

孙海顺

进入80年代,国际投资领域出现一个新现象,即在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停滞、发展缓慢的同时,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却以空前的高速度发展。巨额外资流入美国,使世界国际投资的地理格局发生变化,并改变了美国传统的国际投资地位,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分析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迅速发展原因,阐述其发展特点和它对美国经济的作用。

一、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及其特点

80年代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发展非常迅速,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1979年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为544.6亿美元,到1986年底猛增到2093.3亿美元,七年增加近三倍,平均增长率高达21.2%。而同期内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由1878.6亿美元增加到259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仅为4.74%。尽管从累计额看,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大于外国对美直接投资,但是,从增加额看,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已超过美国对外直接投资。1980-1986年外国对美直接投资增加额为1548.7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221.24亿美元,而美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额仅为720.32亿美元,平均每年增加102.9亿美元,不足前者的一半。

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是战后最快的。1950-1979年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9.7%,其中50年代7.37%,60年代11.37%,70年代15.17%。

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具有若干重要特点。了解这些特点对于研究外国投资策略,分析外资对美国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一)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的分布变化。

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中西欧占总额的2/3以上。发展中国家所占份额甚小。

1.最大投资国易位。自1982年英国超过荷兰成为对美投资最多的国家。1986年英国对美直接投资达到513.97亿美元,比1980年初增加4.25倍,年平均增长率高达26.72%。它在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16.9%升至24.4%。到1986年底荷兰对美直接投资达428.52亿美元,六年中年平均增长率19.21%。

2.日本作为新兴投资大国迅速崛起。1979年底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累计额仅29亿多美元,1986年底猛增到234.33亿美元,比七年前增长了七倍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4.77%,是对美投资增长最快的国家。它先后超过加拿大和西德成为对美国的第三大投资国,在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5.7%升至11.2%。西德对美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不足日本的一半,1980-1986年平均增长14.77%。到1986年西德对美直接投资达173.56亿美元。加拿大曾是第三大投资国,因其对美投资增长缓慢,1984年后退居第四位。到1986年底其对美直接投资额为183.12亿美元。

3.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80年代迅速增加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投资国主要集中于拉美和中东石油输出国。80年代中东石油输出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增长率大大超过拉美国家。1980—1986年中东地区对美直接投资平均增长率高达31.5%,它在发展中国家对美直接投资

中的比重由 8.3% 升至 19.8%。拉美地区对美国直接投资非常缓慢,同期内平均增长 6.59%,在发展中国家对美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 87.6% 降到 67.6%。另外,少数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快了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步伐。

(二)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

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行业构成,可分为五大部门:石油业、制造业、贸易、广义服务业、农矿及建筑业。广义服务业包括银行、保险、不动产、金融、普通服务业、运输业、通讯与公用事业。80年代外国对美国各部门的直接投资,依各部门所占份额的大小依次为:制造业、广义服务业、贸易、石油、农矿及建筑业,1985年它们所占比重为 32.4%、27.9%、19.4%、15.3%、4.2%。

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行业结构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1.制造业始终是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最大部门,但其比重在不断下降。1980年外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额为 330 亿美元,1986年增加到 680.6 亿美元,平均增长率为 12.8%。尽管增幅可观,但是,与其他部门相比,它的增长速度是最慢的,致使其在美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由 1980年的 39.8% 降到 1986年的 32.5%。外国对美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以化学、食品和机械三大行业为主。其中,对化学工业的投资占制造业中外国投资总额的 1/3。1981-1985年平均增长 13.3%,1985年底投资额达 195 亿美元。食品业是外国对美国制造业投资的第二大行业,而且是整个制造业内外国投资增长最快的行业。1981-1985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18.1%。1985年投资额达 111.7 亿美元。机械工业是外国投资增长最慢的行业,1981-1985年平均增长 6.1%(其中电子设备为 6.25%),1985年投资为 94.5 亿美元。外国对以钢铁为主的基本金属加工业的投资增长较快,同期内平均增长 15.9%,1985年投资额达 74.62 亿美元。可见,外国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主要投向那些在美国失去生产技术优势、缺乏竞争力的行业。这些行业恰恰是外国投资者的比较优势行业。

2.以银行、保险、不动产为主的广义服务业,是外国对美国的第二大投资部门,其投资增长速度远高于制造业。1981-1985年平均每年递增 20.9%,1985年底投资达 516.1 亿美元。该部门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由 24.2% 升至 27.9%。不动产一直是该部门内外国投资最大的行业,占 1/3 以上,1981-1986年平均增长率达 23.4%,1986年底直接投资额达 212.23 亿美元。保险业是该部门中外国投资的第二大行业,同期内外国直接投资平均增长率为 14.35%,1986年底投资额达到 136.23 亿美元。银行业在广义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居第三位,同期内平均增长率为 17.88%,1986年底投资额达到 123.88 亿美元。外国对美国银行、保险、不动产投资的迅速发展,主要是受 80年代美国有利的金融市场条件和高利率的吸引。利率的升高和不动产购置成本的降低,使得投资于这些行业非常有利可图。

3.以占领美国市场、提高投资国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目的的贸易部门投资发展很快。1980年外国对美国贸易部门直接投资 152.1 亿美元,1986年底增加到 416.8 亿美元,平均每年增长 18.3%,占外国直接投资 1/5 左右,是外国对美国的第三大投资行业。外国对美国贸易部门投资的特点是以批发贸易为主、零售贸易为辅,以帮助投资国在美国市场推销产品为目的。

4.外国对美国石油及矿业的投资有了长足的发展。外国对美国石油业的直接投资 1980年为 122 亿美元,1986年底增加到 296.3 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 15.9%。石油业在外国直接投资中的比重保持在 14% 以上。外国对美国矿业投资虽然份额甚小,但 80年代的平均增长速度高达 25.3%。石油和矿业一直是美国不景气的行业。国内开采公司缺乏优势,而英国和荷兰等国则有胜过美国公司的优势,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80年代在美国的外国子公司利润率以石油业最高,其次是批发贸易,最低是制造业。1985年三个行业的利润率依次为 12.8%、11.6%、4.9%。利润率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资的部门投向。

上述特点表明,生产技术上的比较优势和利润率的差别是决定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行业分布及其变化的两个基本因素。投资的行业结构的特点反映出外国对美国投资的战略目的是

凭借自身的某些生产技术优势打入美国相对薄弱的生产部门,降低成本,获取高额利润;并通过对外贸易部门的投资开拓和占有美国市场。

各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行业构成,这种行业构成的差别体现着各国对美国不同的投资战略和目的。根据各主要投资国对美国投资的行业重婚愕牟煌?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英荷型”,特点是对美直接投资并列地投向石油和制造业。英国和荷兰属于这种类型。1985年英国对美国石油业投资占其总额的28%,制造业占27.1%;荷兰对石油业投资占其总额的31.3%,制造业占35.9%。二是“日本型”,即“贸易主导型”,特点是对美国直接投资主要投向贸易部门,尤其是批发贸易。1985年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62%是投向贸易部门,其中批发贸易占60.5%,而对制造业的投资仅占13.7%。三是“西德瑞士型”,即“制造业主导型”。它包括西德、瑞士、加拿大、拉美等。1985年西德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占其投资总额的43%,贸易部门占32.7%;瑞士对美国制造业投资占其投资总额的67.3%。

(三)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方式的特点。

1.以收购兼并当地企业为主,以新建企业为辅。1980-1986年由外国跨国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在美国投资总额为1240.7亿美元,其中收购兼并企业的投资为959.2亿美元,占总额的77.3%;用于新建企业的投资额为281.5亿美元,占总额的22.7%。从发展情况看,前者的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80年73.7%升至1986年的80.2%,而后者的比重下降。

2.从投资者看,以外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投资为主,外国母公司投资为辅。1980-1986年,外国母公司用于收购兼并和新建企业的投资支出共计314.8亿美元,占投资总额的25.37%,而外国子公司的此项投资为925.86亿美元,占总额的74.63%。

3.投资规模日益扩大,投资项目在减少。1981年外国公司在美国收购兼并和新建企业的投资项目共1332个,投资额为232.19亿美元。此后,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呈现日益集中的趋势,投资规模扩大,而投资项目减少。1986年外国在美国收购兼并与新建企业的投资项目共659个,投资额为314.2亿美元。项目减少一半,而金额增加一半。

4.从直接投资的资金构成看,80年代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以股权投资为主,以跨国公司内部资金流动和子公司利润再投资为辅。这与8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构成呈相反对照。1980-1985年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增加额(不含价值调整)为1111.12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689.9亿美元,占62.1%;外国跨国公司体系内资金流入净额为320.41亿美元,占28.8%;外国子公司利润再投资为98.34亿美元,占总额的8.9%。而同期内美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股权投资比重甚小,公司内部资金流动净额为负值(即国外子公司资金流向美国母公司),国外子公司的利润再投资占90%左右,是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流。

二、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迅速发展的原因

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是美国国内经济环境、经济政策及各投资国的资本技术条件共同决定的,是国际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双行道对流趋势不断加强的表现。导致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原因,可从两个方面分析。

(一)美国方面的原因。

1. 80年代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环境吸引着外国资本。

1981年里根执政后即开始实行“经济复兴计划”,把削减税收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一方面,在财政政策上大幅度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并给企业以加速折旧减免税收的优待。减税刺激了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另一方面,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定物价,压低通货膨胀率。尽管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高利率的作用,对投资和生产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它的确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1983年起美国经济复苏很快,走在西方其他国家的前面。到现

在为止,美国经济已经持续增长五年。相对于西欧和加拿大等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经济增长是最突出的。企业利润率也高于别国。同时,美国国内物价几年来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通货膨胀一直在4%以下,这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提供了重要条件。这些有利条件的存在,使得在美国投资成为有利可图的事情,前景也较为乐观。另外,高利率也是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得投资于美国的银行、保险、不动产等行业能获较高的利润。

美国的对外税收制度是比较优惠的。由联邦政府提供给外国投资者的税收优待主要包括:(1)对外国投资的资本利得实行减税,把长期资本利得(利息、股息等)的60%看成非纳税收入,即只对其40%课税,税率低于普通所得税。(2)由于公司改组,资产从一个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纳税人手中是免税的。(3)实行投资税减免制度,即对在美国购置资本货物的投资实行减税,减税额为资本货物购价的10%。(4)常驻美国的外国公司从美国公司所得红利的85%是免税的。(1)此外,各州为了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也纷纷采取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

1987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美国新税法,大幅度降低税率并减少档次。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原来的50%降到28%,税率档次由原来的11%-50%的14个档次减至15%和28%两个。公司所得税的最高税率由原来的46%降到33%。美国税率已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低的,外国投资者争相在美国投资。

另外,自1985年美元对西方其他主要货币贬值40%以上,造成美国资产相对贬值,使得在美国收购房地产、兼并当地企业变得非常有利。

2. 80年代美国的微观经济条件也有利于外资的流入。

(1)制造业的“空心化”和企业竞争力的削弱,给外国资本造成有利可图的缝隙。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功能日益趋向于服务性,以本国为基地直接进行产品生产的比重下降,而设计和销售在企业整体功能中的比重大大增加。许多公司缺乏自己的生产基地,专门从事产品设计或批发而成为“空心公司”。制造业的空心化是美国制造业竞争力每况愈下的结果和表现,这在传统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突出。化学、食品、机械、纺织、钢铁、汽车等行业长期以来在走下坡路,受到来自日本和西德等国的强烈竞争。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美国许多公司在进入80年代以后,重新制定发展战略,实行公司改组,着重发展有竞争潜力、技术先进的企业和产品,对缺乏效率、经营不善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并大批出售给外国公司。这就给外国投资者一个很有利的投资机会。近几年来,西德、日本和英国等国以收购为主大量增加在美国化学、食品、机械、汽车等行业的投资就是明证。

(2)80年代美国工资成本增长缓慢,在国际生产成本对比中拥有明显优势。

1979年美国非农业部门平均每小时工资率为6.16美元,1986年为8.76美元,平均每年增长5.4%。如按1977年不变美元计算,平均年增长率为-0.59%,也就是说,80年代美国的实际工资率在下降。这在西方主要国家中是仅有的现象。从国际生产成本对比的变化趋势看,美国与西欧、日本之间生产成本的差距,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日益接近而逐渐拉平,甚至出现了逆转趋势。从而导致国际资本甚至包括美国海外资本流向美国。

3.巨大的美国市场是吸引外国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市场。80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率高于西欧和加拿大,两次大幅度减税以及政府开支的扩大,导致国内投资和消费支出较快增长,社会需求旺盛,市场条件良好。而西欧和加拿大的经济复苏迟缓、增长率低,国内市场需求疲弱,投资前景暗淡。日本由于国内市场相对狭小,市场问题也很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加拿大和日本的垄断资本把美国市场作为目标,通过跨国公司迅速增加旨在开拓和占领美国市场的投资,以谋求基于美国市场的发展。值得强调的是,美国与西方其他主要国家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对于外国资本绕过关税、直接投资于美国国内产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市场导向型投资在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中始终占主要地位。?西欧、日本和加拿大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是贸易摩擦不断加深的结果,是贸易领域的斗争在新形式下的继续和发

展。

(二)投资国方面的原因。

1.日益增强的相对优势,是西欧、日本跨国公司加紧向美国扩张的重要条件。

经过战后 30 年的经济复兴与发展,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它们的国际垄断组织——跨国公司也迅速兴起。跨国公司的本性就是对外扩张。70 年代中期以前,西欧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对外扩张的目标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邻近的发达国家。但是,70 年代中期以后,伴随它们与美国的生产技术差距逐渐拉平,并在某些方面形成自己的优势,它们将海外投资的重点逐渐转向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80 年代西欧、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这一趋势的继续和加深。

支撑西欧、日本跨国公司对美国迅速扩张的基础是与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的一定优势相联系的企业竞争力。这集中表现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上。1977-1983 年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日本 3.9%、法国 3.5%、英国 3.3%、意大利 3.1%、西德 2.5%、美国 1.2%、加拿大 0.9%。(2)可见,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几乎是西方主要国家中最低的。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停滞使其绝对水平先后被西德、法国和日本超过。

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西欧和日本的制造业在不少领域已经赶上和超过了美国。80 年代日本的汽车、钢铁、家用电器、石油化工、造船、纺织等行业的竞争力已明显超过了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同美国的差距也明显缩小。西德、法国和英国在一些行业尤其是普通加工制造业的技术和生产率方面也超过了美国。此外,在企业经营管理上,西欧和日本也有胜过美国的一定优势。企业的竞争力日益增强,促使它们增加对美国的生产投资,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就地销售,扩大市场占有率。

2.西欧和日本过剩资本的膨胀,是它们增加对美国投资的物质基础。

过剩资本的大量存在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的基础。战后初期,遭受严重破坏的西欧和日本正处于经济恢复阶段,急需资金重建工业化经济。那时,它们不仅无力向外输出资本,而且吸收了大量美国资本。但是,到 70 年代中后期,随着商品出口增加和贸易盈余的扩大,它们已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资本净输出国。80 年代,日本和西德的国际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大,国际储备逐年上升,国内过剩资本膨胀。1986 年日本的对外贸易顺差高达 897 亿美元,其中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 580 亿美元(3)国内市场相对狭小,而过剩资本大量存在,要求垄断组织将资本输出国外,寻求更为有利的投资场所。80 年代初,日本提出由“贸易立国”转向“海外投资立国”、使经济国际化的发展战略,推动对外投资迅猛发展。它的海外投资重点已由发展中国家转向美国,对美直接投资几乎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一半。西德情况与日本类似,巨额贸易顺差和国际储备是它近几年来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基础。英国、荷兰作为老牌资本输出大国,在 80 年代依靠其金融资本的庞大势力,配合石油和制造业公司大量增加对美国的投资。

总之,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从根本上说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是日本、西欧与美国在经济实力、技术优势和企业竞争力方面发生不利于美国的相对变化的产物。而各国政府政策的变化只不过是反映这种变化了的客观现实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而已。

三、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对美国的影响

80 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美国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外国资本潮水般地涌入,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日益重要的影响。如何评价这种影响,的确是个复杂的问题。笔者根据现有资料认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对美国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影响要大于消极影响。有些影响在现阶段只是潜在的,还有待观察。

(一)外国直接投资增长的积极作用。

1.外国投资增长给美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 80 年代支撑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外国直接投资对资本输入国的经济作用主要有两方面:一、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资金,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有助于增加东道国的资本供给,弥补国内投资资金的不足,提高投资率。二、伴随资金的流入,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也输入到东道国,带动和促进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科学管理,提高生产率。

80 年代的美国也存在着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缺口。里根上台后,奉行大幅度的减税政策,个人和公司所得税都被大大削减,而政府开支、特别是军事开支增加,结果造成财政赤字逐年上升。1979 年联邦预算赤字曾经是 402 亿美元,1986 年猛增到 2207 亿美元,〔4〕七年时间增加了 4.5 倍。由于里根政府奉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使联邦财政赤字不能依靠扩大货币发行量来弥补,只有通过政府(财政部)向资金市场借款,利用发行债券、国库券等形式把资金从民间抽取过来。这样使民用资金大为减少,企业投资受到很大影响;同时,官民争夺资金所造成的资金供不应求的局面导致了高利率的后果。高利率一方面使一部分资金由生产领域流向金融领域;另一方面,使企业借款投资的代价提高。二者结合在一起大大抑制了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近几年来,美国的国民总储蓄总是小于国内私人总投资,二者的差距一直在扩大,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美国国内储蓄与投资的对比关系及外资的作用

项目	年份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国民生产总值(亿美元)	31924	31871	32488	31660	32791	35014	36075	37133
国内私人总投资(亿美元)	4548	4370	5155	4473	5023	6648	6416	6710
国民总储蓄(亿美元)	4583	4450	5220	4464	4636	5733	5515	5387
国内投资率 I(%)	14.25	13.70	15.87	14.13	15.32	18.97	17.79	18.07
国内储蓄率 S(%)	14.36	13.96	16.07	14.10	14.13	16.3	15.28	14.51
S—I	0.11	0.26	0.2	-0.03	-1.19	-2.60	-2.51	-3.56
外国直接投资额(亿美元)	545	830	1087	1247	1371	1646	1840	2093
外国投资占国内私人投资%		6.52	4.99	3.58	2.47	4.14	2.88	3.92

资料来源:(1)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0-1987 年各期;(2)Economic Indecator, 1987 年第 8 期;(3)Abstract of United States Statistic, 1980-1987 年。

从表 1 可以看出,1982 年美国储蓄率低于投资率 0.03 个百分点,1986 年扩大到 3.56 个百分点。这表明美国国内投资资金不足的情况日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项长期稳定的资金的大量流入,缓和了国内资金紧张状况,填补了投资缺口。并且通过平抑利率的作用,刺激企业投资,从而直接推动了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促进生产复苏和发展。

1983 年以来美国经济走出“滞胀”泥潭,迅速转向复苏,并持续保持较强的增长势头,是与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分不开的。可以说,迅速增加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支撑美国近几年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柱。这种作用还可从各行业中外资子公司厂房设备投资增加额与各行业厂房设备新增投资总额的对比中显示出来。如表 2 所示。

从表 2 得知,外国子公司每年用于新厂房设备的投资额大致占各行业当年厂房设备投资总额的 7-9%。在不同行业外国子公司投资所占比重及作用有一定差别。其中,制造业部门外国子公司的新厂房设备的投资大致占该行业新厂房设备投资的 7%。可见,外国子公司的新厂房设备投资已经成为美国各行业历年新厂房设备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不仅给美国注入了一股长期资本,而且通过企业管理、技术合作等途径向美国输入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这对美国经济也起了良好的作用。

2.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使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填补。

进入8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现象日益明显,“空心公司”在不断增加。它给拥有相对优势的日本和西欧制造业公司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机会,使它们几乎毫无阻挡地打入美国制造业,在美国人留下的“空洞”里进行投资设厂、加工制造,把自身的某些优势与当地较低的生产成本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新的竞争力量出现在美国市场。

表2: 外国非银行子公司新厂房、设备投资及其在各行业厂房设备新投资中的比重(1)
(单位:亿美元)

行业 \ 年份	1982 SIT	1982 FI	1982 FI/SIT	1983 SIT	1983 FI	1983 FI/SIT
总额	3105.8	280.68	9.04	3047.8	231.79	7.61
矿业(含石油)	200.5	70.93	35.38	151.9	50.84	33.47
制造业	1206.8	97.17	8.10	1162.0	82.17	7.07
贸易	303.5	34.27	11.29	370.3	28.08	7.58
金融、保险、不动产	272.2	59.78	21.96	283.9	55.2	19.44
服务业	259.3	6.44	2.48	249.9	7.60	3.04
行业 \ 年份	1984 SIT	1984 FI	1984 FI/SIT	1985 SIT	1985 FI	1985 FI/SIT
总额	3544.4	252.25	7.12	3864.1	284.29	7.36
矿业(含石油)	168.6	56.57	33.55	158.8	64.00	40.30
制造业	1388.2	97.40	7.02	1531.5	102.13	6.67
贸易	449.3	30.47	6.78	507.6	40.20	7.92
金融、保险、不动产	339.1	49.61	14.63	392.4	63.55	16.20
服务业	287.0	11.33	3.59	287.0	7.26	2.53

注:“SIT”表示特定行业厂房设备新投资总额;“FI”表示外国子公司用于新厂房设备的投资额;“FI/SIT”表示外国子公司新厂房设备投资占某行业厂房设备新投资总额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3-1987年第5、6、10期。

80年代前六年,外国对美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平均每年递增12.83%,远远高于美国国内整个制造业的投资平均增长率(1981-1985年为4.89%)。外国公司对美国制造业的投资主要投向它们的比较优势最强的行业,如化学(占1/3)、食品(占16%左右)、机械(占18%左右)、钢铁(占11%左右)。大量外国投资注入美国的制造业,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制造业的“空心化”,给它增添了复苏与发展的活力。尤其是化学、食品、汽车、钢铁、纺织等长期不景气的行业,得到外资的很大扶植和帮助。外国投资的增长还直接间接地把先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办法传到美国当地企业,带动和促进了当地企业的技术与管理的进步。

3.外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增加了美国的就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高失业状态。

外国公司在美国投资设厂,从事生产和服务,为美国创造了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使大批失业者被吸收就业。1981年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人数共有241.6万人,以后随着外资的增长而扩大,1986年底增加到318.4万人,比五年前增加76.8万人。外资企业的就业人数占美国全国民用就业总数的百分比,由1981年的2.41%提高到1986年的2.96%。外资企业吸收就业的增加,使美国的失业率不断下降,从而缓和了高失业问题。在1982年经济危机期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9.7%。伴随经济复苏和外资企业吸收就业的增加,1986年失业率降到7.0%。1981-1986年美国全国民用就业人数增加920万人,其中,外资企业所增加的就业人数占总增加数的8.35%。因此,外资企业在增加就业、降低美国的失业率方面是作出重要贡献的。

4.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带动了美国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各地区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开发较早的东北部地区工业化程度领先于其他地区。西部、西南部、东南部等边远地区则相对落后。为了加快地区经济的发展,这些相对落后的地区纷纷采取各种优惠措施,引进外国投资。

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主要集中于东南部、西南部、西部和大陆以外的阿拉斯拉、夏威夷等边远地区。从外国非银行子公司在美国资产的地区分布可明显看出这一点。1980-1985年四个边远地区的外国非银行子公司资产额由816.7亿美元增加到1896.8亿美元,增加了1.32倍,占外国非银行子公司全部资产的比重由63.4%升至64.6%。外国公司在这四个边远地区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矿业、石油、化工、电子等工业部门。外国投资的大量增加促进了当地这些行业及有关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并带来了几十万个就业机会。1980年这四个地区的外资企业吸收当地就业人员81.5万人,占全国外资企业就业总数的40.1%,1985年四地区外资企业吸收就业139.27万人,占全国总数48.8%。

从各州的情况看,外国对美国投资资产最多的五个州依次为: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纽约、阿拉斯加和路易斯安纳。除纽约外,其余四个州分别在西南部、西部、东南部以及阿拉斯加半岛等边远地区。外国对这些地区的大量投资,直接带动了当地工业的发展,增加就业,促进了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

(二)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对美国经济的消极影响。

1.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加剧了美国贸易逆差。

如前所述,外国对美国的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巨大市场的吸引。占领美国市场、提高本国产品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是各投资国的基本目的。无论是直接投资于贸易部门,还是投资于制造业部门,最终都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市场导向型”投资在外国对美国总投资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各国跨国公司母公司向美国子公司的出口必然要大于它们从美国子公司的进口。跨国公司内部这种不平衡的国际贸易是导致8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下面的表3向我们展现了近几年外国的美国子公司进出口差额及其对美国整个外贸逆差的加剧作用。

表3: 80年代外国子公司进出口差额的扩大及其对美国外贸逆差的作用

(单位:亿美元)

项目 \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美国进口总额	2408	2641	2473	2689	3340	3383
美国出口总额	2207	2363	2110	2017	2199	2140
美国外贸逆差	201	278	363	672	1141	1243
外国子公司进口额	758.03	815.99	848.31	814.64	1004.89	1117.35
外国子公司出口额	521.99	640.60	597.44	538.54	581.86	563.98
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	236.04	175.39	250.87	276.10	423.03	553.37
外国子公司进口所占%	31.48	30.89	34.30	30.29	30.10	33.03
外国子公司出口所占%	23.65	27.11	28.31	26.70	26.46	26.35
外国子公司逆差所占%	117.43	63.09	69.11	41.09	37.07	44.52

资料来源: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983年4月, 1986年5月;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1-1986年各期。

从表3可以看出,外国在美子公司的进口大于出口的差额在不断扩大,1980年进出口差额为236.4亿美元,出口为进口的68.9%;到1985年进出口差额扩大为553.37亿美元,出口对进口的比例降到50.5%。外国子公司国际贸易逆差的扩大,加剧了它对美国整个对外贸易逆差的作用。1980年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为美国当年外贸逆差总额的117%,1985年这个比例仍为44.5%。可见,外国子公司不断扩大的进出口差额是导致8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迅速

加大的一个重要因素。

2.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促进了外国银行对美国的渗透,使美国的国际金融地位显著下降。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垄断资本与银行垄断资本总是融合为一体的,二者互为依赖,互相促进,共同生长。工业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始终是同银行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这一基本规律在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依然起作用。80年代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外国银行资本对美国的渗透和扩张,特别是在美国高利率的背景下这种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在互相促进中共同加强了对美国经济的影响。1980年外国私人银行在美国的资产总额为1210.69亿美元,1986年猛增到4491.79亿美元,六年中增加了2.7倍,高于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外国在美国的银行资产额已超过外国在美国直接投资额的一倍多。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分支机构随着资本的渗透而不断增加,1980年为563家,1986年超过600家。在外国银行总资产中,日本所占的比重高达45%,并占美国整个银行资产的6%(5)。

外国银行资本的扩张,对美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它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为企业厂房设备投资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1985年外国银行机构为美国工商业提供贷款1100亿美元,占美国银行贷款总额的20%。从融资对象看,过去是以大公司为主要对象。近年来,日益向小型企业扩展业务。从贷款来源看,日本银行所占的比重超过40%;其次是英国银行,占13%,第三是加拿大银行,占10%(6)。其次,外国银行在美国的巨大发展促进了外国工商业公司对美国投资的增长,它使外国公司能够较容易地在美国金融市场筹集到资金。第三,外国银行在美国的急剧扩张,使美国的银行业日益受到外国银行的控制,国内金融市场受外国银行和金融公司的影响越来越大,经常受到不稳定的投机性强的国际游资的冲击,从而削弱了美国金融市场的自主性,有时会抵消货币当局的稳定货币和物价的努力。此外,外国银行的迅速发展还削弱了美国银行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使它进一步失去金融大国的形象。

综上所述,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是80年代世界经济中值得注意的新现象,是国际投资发展的新趋向。它标志着80年代以来国际“交叉性”直接投资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的发展。尽管引起和促进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具体原因很多,有许多中短期因素,但是,从根本上说,它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产物,是美国与西欧、日本相比,在经济实力、企业竞争力方面相对下降的结果。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作为生产要素的流入,它给美国输入了资金、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知识,并同当地的生产要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这种新的生产力是在新的国际分工条件下由生产和资本国际化所创造的。因此,外国投资的增长给美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但是,外国投资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输入,它扩大了美国经济中非本国化成份,形成一种排斥本国企业的一种力量;强化了外国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加深了美国经济的对外依赖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稳定性。然而,外资在美国整个经济中的地位仍是从属性的,在国民经济和各行业中的份额是很小的,远没有形成一种控制力,左右美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外资的投向和规模仍在美国政府政策的调控之下。只要政府政策调控适当,外资可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不至于使美国经济受控于外国资本。

注释:

(1) F.G.Opton & H. Feiler, *Doing Busi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2) *Wall Street Journal*, 1984年9月29日。

(3) (4) 引自《人民日报》,1987年4月4日。

(5) 引自《经济参考》,1987年5月2日。

(6) *Foreign Banking in America, The Bankers*, 1985年5-6月。

除加引注者外,其余资料主要引自下列刊物: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0-1987年各期。

Economic Indicators, 1985-1987年各期。

Abstract of United States Statistic, 1980-1987年各期。

美国政党制度缘起

师枫燕

美国的政治制度错综复杂,万变之宗是美国的宪法。除了政党制度以外,其他美国政治制度都是制宪人借鉴或移植了欧洲的经验在宪法中做了明文规定的,只有政党制度,不仅宪法里只字未提,而且从阐述制宪思想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中可以看出,宪法是反对结党的。宪法的宗旨之一,就是防止或消除党派对政府的影响。

美国制宪人都对党派持批评态度。他们对于政党或深恶痛绝,或鄙夷不屑,或心存疑惧,把政党看成政府“最险恶的敌人”(华盛顿语)、“最可怕的灾难”(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约翰·亚当斯语),把党派精神说成“施政者的最严重的堕落”(托马斯·杰斐逊语)。托马斯·杰斐逊为了同党派意识划清界限,甚至这样说:“如果非得同政党一起才能进天堂,我宁可不进天堂。”〔1〕

当时的舆论也普遍反对结党,连反对宪法的反联邦派也一致认为党派是邪恶的。

美国的政党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那些竭力反对政党精神的政治领袖,包括华盛顿在内,实际上都表现出很强的政党倾向。有的历史书讲述到杰斐逊由共和党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总统时,揶揄地说:杰斐逊虽然不肯同政党一起进天堂,倒并不拒绝同政党一起进白宫。〔2〕

美国第一代政治领袖在政党问题上言行不一,并不是有意混淆视听。实际上,这恰恰反映出他们的愿望与现实不符,反映出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发展政党,反映出政党的出现不可避免。此外,当时政党的概念也很含混,人们把党(*party*)与派(*faction*)混为一谈,他们所抨击的党与后来实际发展的党并不完全一致。

在这里,为了下文和今后叙述的方便,我想先明确一下什么是政党。现代政治学者认为,在给政党下定义时,必须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政党同时是选举组织、管理组织和心理机构〔3〕。

《新哥伦比亚百科全书》“政党”条目的解释是:“政党是这样一种组织,它通常是通过它所提出的候选人担任公职,以期达到控制政府之目的。”〔4〕

这就使政党有别于政治派别、利益集团以及其他各种组织和团体。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确,为什么说美国18世纪末出现的政党制是西方的第一个政党制。在此之前,18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是君主制政府议会中政见不同的两派,没有选民做基础,不以选举为上台手段,只能算作党派(*faction*)。同样,美国围绕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出现的联邦派与反联邦派,也不能算

政党。

二

美国举行第一次总统选举时没有政党。1789年2月,当时的全部69个选举人一致投票推选乔治·华盛顿担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得到34票,当选为副总统。另外35票零散地分投给另外10个候选人。第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也表现出这种没有政党参与选举的特点。

华盛顿总统任命的第一届内阁没有吸收反对宪法的人。第一届国会的议员中,只有少数是反对宪法的反联邦派成员。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与国会中很有影响的众议员詹姆斯·麦迪逊是最好的朋友。而麦迪逊又和内阁中另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曾经有过密切的合作。他们两人曾与联邦最高法院第一任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一起,在争取批准宪法的斗争中,共同写下了一系列充满战斗性、富有说服力的文章,就是后来汇编成册,成为美国政治经典的《联邦党人文集》。

看来制宪人的目标实现了,建立了没有派性的和谐政府。麦迪逊乐观地说:旧的派别斗争“随着联邦政府的建立而告终”。〔5〕

然而,新的政治机制刚刚开始运转,政党制度的幼芽就开始萌发了。

新政府建立以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国家在革命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债务已逾期。其中大部分是欠本国人的。财政部长汉密尔顿认为国家的信用极其重要,很快向国会提出了解决办法:1.联邦政府发行长期债券。全部借据不论谁持有,一律可以按票面价值兑换成长期债券;2.联邦政府承担各州的全部债务。1790年1月,就是在对这项财政计划进行立法时,国会中出现了第一次重大分歧(注意,这仅是第一届国会的第二次会议)。

分歧之一可归结为联邦权力与州权之争:该计划要求联邦政府以征收进口税及对美国酒征税增加新税源,以此偿还各州债务。由于联邦政府接管的税源增多,会使各州丧失很多权力。

分歧之二可归结为不同经济利益之争,或曰富人与穷人之争:“原债券持有者”多是普通农民、复员士兵、小业主,已在战后困难时期折价卖掉了债券。而北方那些精明的商人大量购进了这些债券。现在,政府的还债计划不考虑原债券持有者的利益,而有利于投机商人,在不太懂得财政的人看来,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

分歧之三可归结为地区之争:南方各州已经偿还了大部分州债,而北方各州的州债总额大大高于南方各州。联邦政府承担州债会使北方各州大大获益。

于是,中央政府几乎刚刚开始工作,美国社会诸方面重要矛盾只除了种族矛盾在美国政治生活中还隐而未露外,其他几方面矛盾——联邦权力与州权力的矛盾、不同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地区之间的矛盾——都在国会中反映出来。

此刻,反对这项计划的人是分散的,还没有聚合成派,首当其冲的麦迪逊的态度也不很坚决。经过杰斐逊的斡旋,双方都作出妥协〔6〕,这项还债法案得以通过。

这项计划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果:国家的信用得到恢复,美国的公债券不久后以高于面值的价格行销海内外。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病:投机家大发横财,政府内部腐败成风。许多曾经购买了大量旧债券的议员从自己的立法中获益,某些政府官员借机营私舞弊。这些都给反对这项计划的人提供了口实和依据。国会里的反对力量逐渐聚集成派。

某些州也对这项计划做出了强烈反应。如1790年12月23日弗吉尼亚州议会通过了一项反对联邦承受州债的抗议书,反对在美国这样的农业国家扶植和维持一个庞大而富有的商业集团。不过此时州议会的活动还没有同国会的活动联合起来。

1790年12月31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第二份重要报告,要求建立国家银行。他的目的很明确: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发行货币和信贷,可以刺激商业,为资本匮乏的国家提供投资资

本。这对于增加国家财富、促进工商业发展大有裨益。

以麦迪逊为首的反对派在国会激烈地抨击这项计划。他们对银行心怀疑惧,反对牺牲农业来发展工商业。但是他们没有直说,而是打出宪法的旗帜,说宪法里没有规定联邦政府可以建立国家银行,因此这样做是违反宪法的。尽管如此,国会还是通过了银行法案。华盛顿总统考虑再三,最终接受了汉密尔顿的“从宽解释宪法”说,签署了银行法案。

反对派在杰斐逊和麦迪逊的领导下,在政府内外进行活动。杰斐逊试图在行政部门扩大自己的影响,但收效甚微。麦迪逊在国会的成绩则好得多。虽然反对派在众议院屡遭失败,但是每次失败都使麦迪逊的追随者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他周围。最初,他们称自己为“共和利益派”(republican interest),后来干脆用“共和派”(republican),到1792年,甚至偶尔自称“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此时首字母还是小写)。(7)

汉密尔顿及其追随者也组织起来。他们沿袭了“联邦派”(federalist)这一名称,意在指责共和派与当年反对宪法的反联邦派如出一辙。

共和派有组织的反对活动对于遏制汉密尔顿起了很大作用。最显著的一次是,使国会搁置了汉密尔顿的第三个财政方案——1791年12月递交给国会的制造业报告。这个方案旨在利用保护性关税和补贴来吸引工业投资,要求政府扶助制造业的发展,以使美国获得经济上的真正独立。共和派认为,实行这项计划会使国家越发强大,个人自由会因此而进一步受到威胁。杰斐逊和麦迪逊说服了国会大部分议员,将这项计划束之高阁。

不过,此时两派的力量还不强大。随着美国内政、外交不断面临新问题,在把美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上,争论越来越深入,国会中的政派逐渐向全国性的政党过渡。

三

美国国会中的政派从什么时候成为全国性政党的呢?这一点连专门研究美国政党史的学者也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三种:(1)1793年底1794年初。根据是,此时国会中两党阵线已泾渭分明;(2)1796年。根据是,总统候选人由党派推举,国会中的反对派与某些州挂钩;(3)1798年。根据是,政党开始组织选民。从这一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起,很多州才开始在竞选中利用政党标志(party label,即候选人标明自己的政党倾向)拉选票。

出现这许多种说法不只是因为所把握的标准不同,更在于,政派向政党的过渡是随机的、逐步的:从纵向看,党派意识逐渐从国会扩散到各州,再逐渐渗透到选民,选民逐渐参与更多的政治活动;从横向看,选举以党派划线先从一两个州开始,然后逐州扩散,直至全国各州。究竟走到哪一步算是演变为政党,确实难下定论。

促成政派向政党转化的事件很多,可以说那几年几乎每一件内政外交大事都推动着这一进程。但是最主要的动力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因华盛顿拒绝连任第三届总统而使党派得以竞选总统。

1793年2月爆发的英法战争给党派分歧增加了新内容。由于汉密尔顿的经济制度有赖于对英贸易,他和他所代表的利益是亲英的;而杰斐逊把法国革命看成“人类历史上最神圣的事业”,因而当然是亲法的。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为了美国的利益,双方最后都同意美国保持中立。问题在于,英法战争给美国的党派斗争添加了意识形态这个催化剂。

无论何时,人们从不同角度看同一问题时,都会有不同看法。问题没有出现时,意识形态的分歧潜藏不露。一旦出现问题,就会有激烈的争论。建国初美国人对于自由的态度(牵涉到国家权力的大小)、对于良好社会的标准(牵涉到加速发展工商业还是保持农业社会)、对于多数人统治的看法(牵涉到对群众的态度)上,本来就有分歧。而英法战争使这些分歧暴露出来,相互交锋。

1793年4月,法国特使爱德蒙·热内来到美国,引起了关于法国革命的激烈争论(8)。赞

成法国革命的站到了共和派一边,反之则站到联邦派一边。意识形态的内容同本国的政策联系起来,煽动了人们的热情,增加了人们的偏见和盲目性,促使人们走极端,从而把党派对立迅速推向一个新阶段。

报纸在扩散党派意识上起了很大作用。联邦派成员约翰·芬诺(John Fenno)主办的《合众国报》(*the Gazette of the United States*)称共和派为法国雅各宾派的代理人,指责他们败坏国家,造成国家混乱。共和派成员菲利浦·弗莱纽(Philip Freneau)主办的《国民报》(*the National Gazette*)则谴责联邦派为地地道道的君主派,其政策是英国政策的翻版等等。两派领袖没有插手控制本派的报纸,并且经常因为它们过于偏激感到尴尬。不过,他们分别给予本派的报纸以相当大的赞助。这两份报纸对意识形态之争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推动了汉密尔顿和杰斐逊的支持者进一步组织起来,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

1793年底,杰斐逊看到自己违背本意,在政派斗争中越陷越深,无法排解内心的矛盾,遂辞去国务卿职,退出政界,以后有三年多不大过问政事。麦迪逊独自担任了共和派领袖。就在这几年,共和派迈出了从政派走向政党的关键性几步。

首先,他们逐渐从纯粹反对政府的某些政策走向提出某些替代性政策方案。1794年1月,麦迪逊提出了一系列决议案,试图制定一项反对英国商业歧视的政策。这些决议案虽然未通过,但从此开反对党拟定替代性政策以赢得民心之先河。

其后,共和派发动的围绕杰伊条约(9)进行的论战,对于吸引公众支持共和党、增强国会的党派领袖与州和地方的共和党人的联系起了很大作用。这场论战增加了全国的政党气氛,增加了国会投票以政党分野的现象,促进国会的政党领袖关心策略,发明了某些重要的政党活动程序。最突出的有,1796年4月,众院的共和党领导人首次召开议员党团会议(*the party caucus*),确定共和党对杰伊条约的政策(10)。

1796年,华盛顿宣布不打算参加下届总统选举,这导致首次政党竞选总统。

联邦党国会议员会议推举了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平克尼。共和党的国会议员会议推举了杰斐逊和艾伦·伯尔。由于当时的选举制度没有考虑党派因素,还由于当时政党的界限很模糊,所以两党第二候选人得到的选票都很分散。结果,亚当斯获71票,杰斐逊获68票,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造成历史上唯一一次正副总统分属两个不同政党的现象。

根据宪法建立的政府只运营了七八年,政党不仅产生并发展起来,而且开始在最重要的政治活动——总统大选中发挥作用。选举给反对党提供了上台的机会。他们在以后几年,除了在国会中继续从事反对性活动以外,开始切实注意发展组织,准备迎接下一届大选。

四

亚当斯任总统的四年,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联邦党内以汉密尔顿为首的强硬派,即所谓“上层联邦党人”(high-Federalists)同以亚当斯为首的温和派决裂。国会的联邦党议员不仅不支持总统,反而试图利用他们在国会的力量控制总统。“上层联邦党人”不注意争取群众,甚至敌视群众,在政策和策略上都犯了一些错误。最为严重的是,他们为了压制反对党,制定了《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11),结果大失人心。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联邦党人不容不同政见,无视美国人热爱自由的本性和当时美国向民主发展的大趋势,是导致自己没落的首要原因。

共和党作为在野党,除了反对联邦党政策,在国会提出替代性方案以外,为了赢得下届选举,特别注重发展政党组织,研究选举技巧。在许多州,共和党建立了各级委员会。为了多得到选票,弗吉尼亚州议会中占多数的共和党人通过立法改变了本州遴选总统选举人的方式(12)。此外,共和党人充分利用报纸批评政府,向选民提出一整套明确的替代性政策(相当于以后的政纲),通过政党的大小会议、报纸、小册子和竞选传单广为宣传。尽管联邦党在这些

方面亦步亦趋,但无论是组织还是宣传,都远远不如共和党。

终于,在1800年的总统大选中,得票数居首位的两个人都是共和党人:杰斐逊和伯尔。总统权力从联邦党手里交到共和党手里。

在政党从无到有,从派到党,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美国的第一代政治领袖一直在试图制止甚至消除党派斗争。不过,由于他们对党派的想法不同,采取的办法也有所不同。

华盛顿、汉密尔顿、亚当斯等始终认为党争是邪恶的,应当而且可以避免。他们几个人都不承认自己一方是党派,认为自己代表政府,共和派(党)才是党派,从事的是反政府活动。华盛顿竭力超脱于党派之上。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出现分歧起,到后来激烈对立,华盛顿一直在和稀泥。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二人携手合作,却眼睁睁地看着党争愈演愈烈,最后自己也卷了进去,不自觉地站到联邦党一边。汉密尔顿则试图以压制对方的办法消除党争。但是,尽管联邦党在行政部门和国会均占优势,不但没有压制住对方,反而促使对方抱团,更加团结。汉密尔顿派的联邦党人搞的《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汉密尔顿本人并不同意)以压制共和党为目的,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亚当斯在两党已经严重对立之时,还竭力想充当一个不受政党倾向左右的总统。做为政党领袖,他不领导发展政党组织,反而为了超脱于政党之上做了一些促成联邦党分裂的决定,加速了联邦党的下台和没落。

共和党的领导人杰斐逊和麦迪逊的态度则灵活得多。他们对党派的想法是逐渐发展的。最初他们认为,党派一方面是邪恶的,另一方面却是不可避免的(见《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及至党派在政府中发展起来,他们的想法也有发展。虽然仍然认为党派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他们认为:“既然出现政党是不可避免的,党派间观点之争是不可调和的,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建立一个党去遏制(check)另一个。”〔13〕这样,他们不仅承认了自己是政党?并为共和党的存在找到了合理依据。从此为了遏制“联邦党的邪恶影响”,理直气壮地发展共和党。所以,共和党1800年取得大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而是几年苦心经营的结果。

杰斐逊上台以后,并没有给成为在野党的联邦党以合法反对党的地位。只是他比较宽容大度,宣称“我们都是联邦党,我们都是共和党”,对反对党采取了一种怀柔政策。很多联邦党人的对立情绪因此大大减轻了。

两党对立情绪缓解的主要原因是,在内政方面,尽管共和党人在野时严厉批评联邦党政府的政策,但是上台后却很少加以改变〔14〕;在外交方面,由于欧战结束,英法缔结和约,对外政策分歧的依据消除了。联邦党人中有的加入了共和党的营垒,有的不再从政,还有的转向过去共和党的立场:赞成州权、主张从严解释宪法等。从此,联邦党越来越走下坡路。后来虽然也曾有所振兴,但再也没有重新赢得国家权力。1817年以后逐渐销声匿迹。

美国的第一次政党制度〔15〕从此结束。

1820年,在没有反对党的情况下,共和党总统门罗大获全胜,没有政党竞争的“和睦时代”(Era of Good Feelings)开始了,国家和谐一致的旧梦看来就要实现了。

然而,党外无党,党内就分派。对立党派的消失,使共和党内部产生了离心力。和睦时代刚开始不久,共和党就分裂成“老派共和党人”(the Old Republicans)和“青年共和党人”(the Young Republicans)。第二次政党制又在孕育之中。

1824年左右,老派共和党人改称“民主共和党”(the Democratic Republican),并在1828年正式称“民主党”(the Democratic Party),一直沿用到现在。而青年共和党人后来改称“国民共和党”(the National Republican),又于1836年改称为“辉格党”(the Whig Party),与民主党抗衡,从此开始了第二次政党制。以后,第二次政党制刚一结束,第三次政党制又开始了。

从此,美国的政党制度与政治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政治制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8世纪末在美国产生政党的原因是什么呢?分析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1. 美国从13个州组织成一个联邦制国家以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不同的利益集团(初期表现为很强的地区性)有不同的经济、政治目标和政策要求。

2. 美国代议制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少数人说了算的精英政治开始衰落。一些重要的利益集团有机会推举自己的代表,在政府事务中起作用。选民参与政治、影响决策的范围逐渐扩大。

3. 英美国家有容许政府内存在有组织的反对派的传统,根据宪法建立的美国政治制度,有利于这种传统进一步发扬。正因为如此,共和派才可能在联邦派占优势的政府中生存发展,与选民结合起来成为政党,直至最后上台执政。

4. 美国的政治领袖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从而使自己有机会实施自己的政策。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既是政党竞争的焦点,又成为推动全国性政党组织发展的强大力量。

美国初期的政党在当时名不正言不顺,与后来的政党制相比只是初具雏形,但是其历史作用却非常大。美国历史学家认为,美国建国后有一股把美国推向民主资本主义的强大推动力。两个党派的领袖汉密尔顿和杰斐逊、麦迪逊可以说是这一潮流的先锋。汉密尔顿主张发展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但他过于强调国家权力而在政治上有反民主的倾向;杰斐逊强调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但是他所提倡的民主与自由是以放弃财富和商业、建立农业共和国为前提的。两派势力相互矫正和补充,决定并促进了美国向民主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政党把选民也带入了这场争论:选民在政党的组织下通过选举表示自己在这场争论的态度;反过来,政党的政策和策略又根据选民的态度加以调节和修正。这样,政党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一种运营国家政治的新机制。

初期的政党把各州、各地区的选民和集团连结起来,促进了美国的国家统一和团结。由于联邦党和共和党都接受并服从宪法制度,因此,即使在冲突相当尖锐的情况下,还保持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特别是在1800年,保证了国家政权第一次从一个执政党手里交给了它的反对派。另外,由于两党都提供了表达意见和不满的渠道,因而从某种程度上疏导了很多不满情绪,从而减少了动乱因素,有助于新生国家的统一。

当然,尽管在18世纪90年代和19世纪初,政党的出现促使美国的选民投票率大大增加,但是,人民参与政治还是不普遍的。主要原因,一是因为传统的精英政治方式还有很大影响,广大人民参与政治的要求还不普遍、不强烈;一是因为法律对选民的资格仍然存在许多限制。因此,美国历史学家认为,当时的政治还不能称为民主政治,只能称为遵从性政治(*deferential politics*)。

群众广泛参与政治是在第二次政党制时期才实现的。

注释:

(1)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History of U. S. Political Parties*, Vol. I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1), p. xxxiv.

(2) 同上, p. xxxv.

(3) (4) 《政治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3月版,第145页。

(5) Noble E. Cunningham, Jr., "The Jeffersonian Republican Party", in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ed., *History of U.S. Political Parties*, Vol. I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 1981), p. 239.

(6) 经过杰斐逊调停,汉密尔顿同意国家首都建在南部:先把首都从纽约迁往费城,10年以后,再搬迁到位于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之间的波多马克河上的新城(即华盛顿 D.C.)。杰斐逊则说服麦迪逊及其他反对该计划的南方人投赞成票。

(7) 第一次政党制时期的共和党与现在的共和党不是一回事,也没有继承关系。为加以区别,人们常常称前者为“杰斐逊共和党”或根据它当时在少数州的称谓,称之为“民主共和党”。现在的共和党是内战时期形成的。

(8) 爱德蒙·热内: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雅各宾派政府——救国委员会派往美国的特使。汉密尔顿担心美国卷入欧洲战争,反对接纳他,杰斐逊则欢迎他。

(9) 杰伊条约(Jay Treaty)(1794年11月19日):英美间缓和英美对抗,并有利于美国建立健全的国民经济和保证其商业繁荣的协议。美方派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杰伊为特使去伦敦与英方谈判签署,因此称杰伊条约。由于美国方面为争取和平做出了一些妥协,因而引起共和党人的强烈不满,斥之为“亲英联邦党人的出卖行为”。

(10) 此时杰伊条约已获参院批准,麦迪逊领导众议院反对派,试图通过一项拒绝拨款的法案,以此阻挠杰伊条约生效。未果。

(11) 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Alien and Sedition Acts)(1798):联邦党为了在可能爆发的对法战争中确保国内安全、杜绝颠覆,作为战备措施而在国会通过的四项国内安全法,对外侨及新闻报道施加限制。三项客籍法(针对法国和爱尔兰的移民)将申请入籍的等候期自5年延长至14年,准许拘留敌国的臣民,并授予主管行政长官以驱逐他认为危险的外侨的权力。惩治叛乱法则禁止进行攻击政府的恶意宣传,禁止煽动反抗国会或总统的任何一个法令。这些法律实际上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共和党的势力。

(12) 当时美国各州遴选总统选举人的方式不同,有些州由州议会提名;有些州由各选区直接选,每选区选一人;有些州同时选出本州所有选举人。弗吉尼亚州原来采用第二种办法,致使亚当斯在1796年选举中从这个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州得到了一票。1800年1月,弗吉尼亚州议会(其中多数议员为共和党人)通过一项立法,改变了遴选总统选举人的方式,从原来每选区各选一人,改为全州同时选全州候选人。就是说,一个选民原来只选一名本区的候选人,现在要选全州的21名。这保证了在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能得到全部总统选举人票。

(13) Richard Hofstadter, *The Idea of A Party Syste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81.

(14) 共和党人上台后不但继续执行汉密尔顿的还债计划,保留国家银行,还扩大了银行的业务范围,增设了三个支行。

(15) 当代美国政治学者认为,美国的两党制迄今经历了五次政党制度(目前仍处于第五次政党制时期)。第一次政党制是建国初期联邦党与共和党对立的政党制。第二次政党制是19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初辉格党与民主党对峙时期。第三、四、五次政党制均为民主党与共和党对立,不同在于多数选民的党派倾向发生变化,从而造成两党力量对比的重大变更。目前也有人认为第五次政党制已经结束,但证据还不充分。